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6·3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张军利

副主任：车安宁　李振宇　李拾良

委　员：王建中　牛述林　毛存显　石为怀　米　琳
孙占鳌　李宽余　杨生宝　张正龙　张占社
张全生　何成才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　中　彭晓峰　谭得胜（按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李振宇

副主编：张占社

编　辑：汪举红　孔令奇

校　对：孔令奇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27期 2016·3

·特载·

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 努力开创全省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摘要） 张军利 ·4·

思路决定出路 有为才能有位 切实抓紧抓好全省二轮市县志编纂工作（摘要） 钱 旭 ·7·

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 推动全省年鉴和信息化工作迈上新台阶（摘要） 李振宇 ·10·

·陇原人物·

陇上女诗词大家江瑞芝 时下翁 ·12·

关西师表巩建丰 王 琪 ·17·

甘肃近代十大名中医 石战涛 ·23·

·志鉴编研·

试谈“篇”与“编”的含义及在志书编纂中的运用 张正龙 ·24·

县级综合年鉴编纂“三要三不要” 陈平军 ·26·

志鉴中行政区划图审图号的办理程序 滕 辉 ·28·

谷苞社会调查工作对地方志编纂的示范作用 邓 明 ·31·

·方志评论·

“述而有论”在古代地方志书中的绚丽绽放 张芹鹤 ·36·

古今崆峒山志书研究 张怀宁 ·40·

·理论研讨·

张维方志思想研究 陈尚敏 ·44·

论五凉文化繁荣的原因 孙占鳌 ·51·

GANSU SHIZHI

·史地考证·

千年黄河渡 张国藩 ·59·

甘南地区历代金石文献辑录综述 张俊立 ·64·

清水县五代后唐迁治旧上邽城说辨析 潘守正 ·66·

“昭武”考略 张立聪 ·69·

·志苑随笔·

回首西望“左公柳” 朱克雄 ·73·

江瑞芝解读 李世恩 ·77·

·转载·

书画上落款盖印36忌 汪斋 ·78·

朱熹：落落三百余文 千古“治家之经” ·80·

·工作动态·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全省第二轮省志编纂业务培训班 ·11·

《迭部县志（1991～2010）》通过终审 ·11·

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25·

甘南州召开全州地方志工作暨业务培训会 ·35·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通过终审 ·50·

天水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部署全市地方志工作 ·58·

《甘肃省志·测绘志（1991-2015）》编纂工作实施方案通过评审 ·65·

《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省志·卫生志》《兰州市志》通过复审 ·72·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召开《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编纂工作暨培训会 ·72·

甘肃省五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 ·79·

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
努力开创全省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摘要）

张军利

针对全省地方史志工作面临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重点强调六句话，就是**“推广一条经验、服务一个大局、制定一个规划、抓紧五项业务、建好两支队伍、夯实一个基础。”**

推广一条经验，就是持续推广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这条成功经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把“一纳入、八到位”作为搞好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一件一件、具具体体、扎扎实实地持续抓好“一纳入、八到位”这条经验的落实见效。推广一条经验，做到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任务之中，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需要我们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解决好三个问题：一个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一纳入、八到位”是党委、政府的事，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怨天尤人。应当认识到，各级史志部门在做好史志事业上是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要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各项精神和提出的要求，积极地、经常地向党委、政府提出工作建议，争取支持和重视。比如，史志工作“十三五”规划、二轮修志、年鉴编辑、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等重大问题和重要业务建设，我们都要积极主动地拿出意见建议，供党委、政府决策，从而争取支持，绝不可被动等待。最近省史志办抓“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出台、抓二轮省志编修进度以及方志馆论证就是这样，许多市县在工作中也是这样，要互相学习借鉴。再一个是，“一纳入、八到位”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理解和看待，比如真正做到了“一纳入、八到位”，其他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关键的问题解决到位了，就不能说未纳入。只要我们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工作，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就不难。另一个是，“一纳入、八到位”既是对党委、政府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我们史志部门提出的要求。是否落实了“一纳入、八到位”，从史志部门来说，一要看是否积极主动地争取了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二要看业务抓得是否过硬和出色，“有为才会有位”就是这个道理；三要看目标责任完成得好不好，对地方工作贡献大不大，平庸无为还要领导重视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服务一个大局，就是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史志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存史、资政、育人”是史志工作发挥其独特作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大局的基本职能，随着一、二轮志书编修的顺利进行，修志工作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繁荣的时期，也形成了发挥史志部门服务发展大局功能的浓厚社会氛围，各级史志部门要珍惜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好工作职能。在存史方面，一要按照中指组和省政府的安排，科学划分历史时段，顺利完成修编和续修志书的任务，以保证我省省、市、县志书修编与国家的整体安排相一致。这方面尤其不要走所谓的“捷径”，搞一、二轮合编、随意延长下限。二要科学认识和把握二轮志书编修的基本任务，也就是“续”和“修”的要求，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照顾到“补、正、续”三个方面，努力做到续修一部志书，对以前的内容加以提炼，删除价值不大的内容特别是空话、套话和大话，补充有价值的遗漏的内容，修订错误的内容，再把时间向后延伸，形成精品志书。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修志工作中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对历史负责，使志书真正成为“信史”。在这些方面，我们当前存在的诸如合并修志、随意延后下限甚至给在世者立传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在资政方面，要努力做好四件事，一是通过提高志书的内在质量，突出不同时期一个地方的历史特点，认真总结和彰现出历史经验，供人们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借鉴。二是通过写实记述的方法树立历史典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区域经济发展、扶贫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等方面的成功典型，涉及的人物要坚持以事系人、人随事出的原则，以典型启发人、感召人。三是客观记述历史教训，给人们提供反面教材和镜鉴，在推进事业发展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少走弯路。四是拓宽史志工作的渠道和方式，开展有关问题的专题研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建言献策，努力为大局服务。在育人方面，要努力解决好三个难题，一个是努力解决人们缺乏读书读志良好习惯问题，史志部门应主动参与到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工作中去，参与到倡导市民群众读书的组织发动工作中去，在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再一个是努力解决志书在阅读应用中“不活”的问题，编一本志书不能是编完就完了，让它沉睡在书库之中，而要考虑怎样让人们用起来，这方面除了满足写作和学术研究的资料查阅需要外，应努力开发一些人们喜欢看、能看懂的东西，包括简本、图文并茂的读物等，这样史志育人的方式方法就活了。另一个是努力解决传播手段传统落后的问题，这一问题当前相当突出。联系近年国家倡导史志工作信息化建设，之所以进展普遍缓慢，恐怕主要是一个对新事物认识跟不上的问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建设真正的数字方志馆，使提供读志条件的覆盖面通过互联网手段得到全面扩展。

制定一个规划，就是制定并实施好省、市、县三级政府《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省政府《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已经过研究草拟，分别征求市州和省直部门意见并经修改后报省政府，近期就要印发执行。制定政府地方志事业“十三五”规划，是一件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也是“一纳入”的基本要求，我们要给予足够重视。这里面要明确一下市（州）、县（市、区）制定实施规划的几点基本要求，即要明确制定和出台规划的时限。市（州）、县（市、区）的规划都要在8月底前制定出台，市（州）要尽量早一些，以便县（市、区）参照制定。2016年的工作考评，首先要看规划制定出台与否，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谈不上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要把“一纳入、八到位”作为规划中基本任务、基本保障、基本要求写进去。组织领导主要也就是做到“一纳入、八到位”，这是对制定和实施规划的基本要求。要明确基本业务的任务书、时间表。主要包括二轮志书编修、年鉴编辑、数字方志馆等内容，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规划好。以后工作考评就依据规划进行。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省上规划中把二轮志书编修完成时限调整到了2020年，以便与全国规划相一致，同时这也是最后时限，绝不能再延长，否则就会拖全国的后腿，请同志们务必重视。

抓紧五项业务，就是抓紧抓好志书编纂、年鉴编辑及信息化建设、地情资料编研、地方史编修工作。一是关于省、市、县二轮志书编纂。二轮省志编纂目前的情况是，共72卷编纂任务中，已完成并出版10部，已完成终审6部，已送审1部，已形成初稿7部，正在编写的38部，尚未启动的10部。针对二轮省志编纂相对缓慢的情况，省史志办按照省政府领导提出的要求，将班子成员和所有干部组成5个责任小组，启动开展了集中攻坚行动，目前督促、指导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开展，预计能够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时间表如期完成任务。二轮市（州）志编纂目前的情况是，已完成并出版5部（酒泉市志、白银市志、平凉地区志、庆阳市志、定西地区志），完成终审3部（嘉峪关市志、金昌市志、武威地区志），在编6部（兰州市志、张掖市志、天水市志、陇南市志、甘南州志、临夏州志）。二轮县（市、区）志编纂目前的情况是，已完成出版39部（兰州市的皋兰县志、西固区志、永登县志、城关区志，金昌市的永昌县志、金川区志，酒泉市的阿克塞县志、金塔县志、瓜州县志、肃州县志、玉门市志、敦煌市志、肃北县志，

武威市的天祝县志、古浪县志，白银市的景泰县志、会宁县志、白银区志、平川区志，平凉市的静宁县志、崆峒区志、崇信县志，庆阳市的华池县志、合水县志、正宁县志，定西市的临洮县志、通渭县志、渭源县志、陇西县志，陇南市的两当县志、宕昌县志、西和县志，甘南州的玛曲县志、临潭县志、合作市志、舟曲县志，临夏州的和政县志、临夏市志、永靖县志），已报送和完成终审11部（兰州市的安宁区志、七里河区志，张掖市的临泽县志、高台县志，武威市的凉州区志、民勤县志，庆阳市的镇原县志，陇南市的康县志，甘南州的迭部县志，临夏州的东乡县志、康乐县志），在编的35部（兰州市的榆中县志、红古区志，张掖市的肃南县志、民乐县志、山丹县志、甘州区志，白银市的靖远县志，天水市的清水县志、秦州区志、麦积区志、甘谷县志、秦安县志、张家川县志、武山县志，平凉市的庄浪县志、灵台县志、华亭县志、泾川县志，庆阳市的环县志、西峰区志、庆城县志、宁县志，定西市的安定区志、岷县志，陇南市的武都区志、礼县志、文县志、徽县志、成县志，甘南州的碌曲县志、夏河县志、卓尼县志，临夏州的临夏县志、广河县志、积石山县志），这些工作滞后的地方史志部门，一定要强化依法治志的意识，强化工作措施，加强业务调度，尽快赶上工作进程，特别是工作严重后进的市（州），要分析原因，采取非常措施，改变落后的局面。二是关于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省级年鉴的编辑出版基本是正常的，但印刷出版不够及时，要求2015年年鉴必须在6月底以前出版，今后年鉴一般应在来年第一季度完成编辑任务，尽早出版发行。市（州）止去年底有13个正常编辑出版年鉴，临夏州年鉴工作尚未开展。86个县（市、区）中，有54个开展年鉴编辑工作，其中天水、嘉峪关、酒泉、武威、张掖、金昌、庆阳、白银8个市所属县（市、区）实现了年鉴全覆盖；尚未启动年鉴工作的县（市、区）有32个（兰州市的西固区、七里河区、红古区、永登县，平凉市的灵台县、华亭县、静宁县、泾川县，定西市的安定区、通渭县、陇西县、漳县、渭源县，陇南市的宕昌县、武都区、两当县、徽县、西和县、礼县、康县、文县，临夏州的临夏县、广河县、东乡县、积石山县，甘南州的合作市、迭部县、夏河县、卓尼县、临潭县、碌曲县、玛曲县），年鉴是可以发挥适时资政作用的重要的资料性工具书。市（州）一定要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尽快让所有县（市、区）把年鉴业务开展起来，尽早实现县级年鉴工作全覆盖。三是关于史志部门信息化建设。全省的基本情况是，省史志办和6个市（州）、16个县（市、区）建立了网站，7个市（州）、33个县（市、区）建立了网页，其余1个州、37个县（市、区）尚未建立，已建立的大都属于政务公开性质、容量很小、业务单一，反映出我们发挥史志作用的手段还很传统落后，要尽快走出一条互联网+地方史志的现代信息宣传路子来。省史志办最近已研究确定建设省数字方志馆，逐步输入一、二轮全部省志及各市（州）、县（市、区）志书、省级年鉴等内容，使其成为一个后台支撑可靠、空间容量大、可读性强、可供学术研究资料检索的知识性、学术性网站。这项工作今年要初见成效。各市（州）和有关县（市、区）要借鉴这一思路，建设特色鲜明、知识性、学术性强的网站，促进传播手段现代化。这项工作做好了，是非常具有建设性和长远意义的。

建好两支队伍，就是适应新时期史志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努力建设好方志工作的专职队伍和兼职队伍。专职队伍建设要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个别市和少数县史志部门没有独立单设的问题，从实践看，地方史志办与党史办、档案局合署办公，对开展业务都有影响，也不利于《条例》的执行，这些地方要积极理顺关系，为专职队伍建设奠定基础。二是有些市、县史志部门人员编制过少，要积极争取，使部门业务人员有一个能满足基本业务需求的存量，能够胜任工作任务。三是要在提高进人门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现有干部的业务培训，整体提高业务素质，改变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或干也干不了、拿不下，机关人员“行政化”、修志工作靠外聘人员支撑的现象。这种现象当前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要靠大家努力解决。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知识互补、专兼结合的兼职业务队伍十分必要，要加强与社会各界

思路决定出路 有为才能有位
切实抓紧抓好全省二轮市县志编纂工作（摘要）

钱 旭

理清工作思路。一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在学习国务院《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下认识，与大家共同探讨。一是多领域拓展。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开展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地方志工作机构只有编修地方志书这一项任务，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一“志”独秀。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编辑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到地方志工作范畴，标志着地方志工作由“志”向“鉴”的拓展;《规划纲要》把地方史的编写、管理等项工作纳入到地方志工作范畴，标志着地方志工作由“志、鉴”向“史”的拓展。二是多方面覆盖。《规划纲要》要求，不仅要编修地方志书、编辑地方综合年鉴，还要编修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等，地方志工作要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三是多层次延伸。不仅省市县三级要编修地方志书，还提倡编修乡镇志、村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村子里需要留住活态风情，古村古树古建筑是乡愁，好山好水的美丽生态是乡愁，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是乡愁，传统的城乡文化、风土人情也是乡愁。守住了它们，就是守住了乡愁；守住了乡愁，也就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就目前情况看，想要编修乡镇志、村志的地方越来越多，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也越来越多，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必须纳入到各级地方志机构的工作范畴。四是多手段提升。修志为用，这是地方志工作的宗旨，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大力提升的空间。当前，最主要的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使我们的修志成果数字化、查阅应用网络化。二要突出重点，夯实基础。修志编鉴是地方志机构的基础性工作和首要任务，是事业发展的根基和活力所在，是衡量地方

经常性的联系，建立并掌握兼职业务人员名单，以弥补专职队伍的不足。要处理好专与兼的关系，努力使专职队伍成为业务工作的中坚力量。抓队伍建设关键在领导班子、最主要的因素在“班长”，要总结成功经验，抓好班子建设，充分发挥班子的带头和引领作用，使班子既成为行政领导核心、又成为专业班子，班子成员成为业务带头人。

夯实一个基础，就是始终坚持抓基层、打基础，促进史志工作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协调好省、市、县三级史志部门的工作关系。下级业务部门要尊重上级业务指导部门的工作业务指导，上级业务指导部门要关心、理解、支持下级业务部门的工作。上下级业务部门都要坚持把业务工作进展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对搞得好的就总结表扬，对搞得差的就激励鞭策，千万不可没标准、没原则地闹矛盾。要加强各级史志部门纵向和横向业务交流。通过经常性的工作交流以及评志、审志等业务工作，大家共同积累经验，弥补不足，开拓领域，促进业务水平不断提升。要不断改善工作的基本设施条件。以落实“一纳入、八到位”为抓手，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逐步改善办公条件、史志编纂条件、信息宣传条件以及业务人员队伍条件，积极创办方志馆，优化业务工作内外部环境。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志工作开展得好与坏的核心指标，必须始终紧抓不放、抓实抓好。只有把这两项工作做好了，把基础打牢了，开展其它工作才有可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负责同志要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在突出重点、夯实基础的同时，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全面推动各项事业。三要改革创新，全面推动。创新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地方志编修能够连绵两千余年而不断，从地记到图经，再到方志的定型和古代地方志编修的繁荣，再到民国时期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靠的就是不断地创新，不断适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越是面临新形势、新机遇，越要不断进行创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推陈出新是一种创新；勇于探索、不断变革、狠抓落实、解决难题也是一种创新。只有不断强化创新意识，才能自觉破除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观念、领导方式和工作套路，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才能不断解决新问题、新困难。要把创新体现在工作规划的制定上，使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落实到各自工作上；要把创新体现在体制机制的建立上，比如：地方史、乡村志等如何编、如何审，要有制度设计；要把创新体现在内部管理的改革上，做到责任到岗、到人，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要把创新体现在修志队伍建设上，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强、专兼结合、适应需要的修志工作队伍。

加快修志进度。一要尽快完成市县两级修志任务。在纪念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强调，《规划纲要》中确定的“两个全面完成”，即“ 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是法定目标任务，各地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确保在2020年之前列入二轮修志规划的省、市、县三级志书全部出版。我省二轮修志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总体进展不是很理想。《目标责任书》要求在2015年完成市县二轮修志任务，但没有按期完成，一些地方拖了后腿。《规划纲要》颁布以后，经过上下沟通、广泛论证，一致认为到2018年力争完成市县二轮修志任务是可行的。这样，在“十三五”的最后两年，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省志的攻坚和完成全省二轮修志的扫尾工作。二要用打一场攻坚战的办法推进修志工作。完成市县二轮修志任务，所剩时间不多了。对一些二轮修志工作相对滞后的市县来说，时间相当紧迫，任务相当艰巨，一般化的措施和按部就班的进度，恐怕完不成任务，必须采用特殊的措施、攻坚的办法，方可见效。各市州志办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制定攻坚方案、划定分段任务、充实编修力量、强化岗位职责、提供保障条件，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编修进度，按时完成任务。三要在进度最慢的县区、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上下功夫，加强研究和指导。未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的市州和县区，进展不尽相同，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这就要求省市两级的分管领导和相关处室的同志要沉下身子，深入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帮助下面找出工作难点和薄弱环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不履行以法修志职责、不支持修志工作的市县，还要进行执法督查，督促其切实落实“一纳入、八到位”。总之，要通过不间断地督查和指导，确保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能按期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不拖全省的后腿。

严把志书质量。一是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正确处理进度与质量的关系。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这是我们一贯的指导思想。从已出版的志书来看，一些志书质量不够理想，往往是一些编修人员对志书的严肃性认识不够，对造成不良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急于出书造成的。当然，拖拖拉拉，长期拿不出稿子，质量也就无从谈起。我们提倡抓紧修志各环节的工作，抓紧时间先拿出稿子，不拖不延，按时成稿。但出书要“慢”，在志稿总纂后，则要不断推敲，反复修改，细细打磨，以求最佳。二要坚持“三评”经验，广泛征求意见。“三评”就是修志机构内部评议、组织同级各部门各单位进行评议（横向评议）、组织上级和下级相关部门进行评议（纵向评议）。这是我们多年来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即是在二轮修志的攻坚决胜阶段，这一经验和做法也要坚持。通过广泛征求意见，以达

到众手成志、确保质量的目的。三要坚持“三审”制度，切实把好“四关”。“三审”就是志书的初审、复审、终审。“四关”就是志书的政治关、体例关、史实关、文字关。志书作为官修书，它有特定的组织形式及审定程序。“三审”是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序，任何一个审定环节都不能忽略。无论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甘肃省地方志规定》，还是省上近年来下发的有关文件，都始终坚持将志稿评议及“三审”制度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出现过志稿未经评议就直接报送终审，或以初审、复审代替评议的不正常现象，这是决不允许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坚持以法治志，严格执行评议、审查的相关要求，切实把好质量关。三是对正在编修的志稿，要做到“十有”，对进入审改的志稿，要做到“四再”。“十有”，即：篇目设置有创新、事物发展有过程、前后变化有对比、重大改革有始末、重要活动有特点、重要会议有主旨、各行各业有涵盖、新生事物有记载、社情民意有反映、入志人物有标准。这十个方面是以往在志书编修过程中容易出现疏漏和偏差的地方，这十个方面的问题把握好了、处理好了，也就为二轮志书的质量提升奠定了基础。“四再”，即：再认识，以求同。认识志书官书官修的地位、认识志书是资料性文献的本质、认识志书编修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求等基本规律，从而使上下统一思想，把志书修改好。再挖掘，以求新。也就是说，志书修改要在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上多下功夫。再核对，以求真。要核对原则性问题，如中央关于一些重大事件的定性和提法、涉及民族问题和保密问题的记述是否符合有关要求等；要核对有些专业性问题，如地图、农业、科技、矿产、卫生医疗、动植物名称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是否正确；要核对容易出现差错的问题，如时间、地名、人名、职务等；要反复核对数据，尤其是表格数据，要纵横对比，与正文的记述数字对比，力求真实准确。再打磨，以求精。要严格按照志书物以类聚、事以类从的原则，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要从统一各编各章的体例做起，注意体例的一致性；要从打磨篇章节目的标题做起，确保篇章节目名称的准确性；要打磨文风，确保志稿语言简练，文风统一，符合志书对语言文字的要求。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 推动全省年鉴和信息化工作迈上新台阶（摘要）

李振宇

认真做好年鉴工作。对地方综合年鉴工作总的要求是，全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高度重视年鉴工作，紧紧围绕《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提出的“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工作。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辑，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一是对尚未启动地方综合年鉴编辑的少数市（州）和县（市、区），要认真按照这次会议要求和张军利主任的讲话精神，及时向本级政府汇报，争取尽快启动年鉴工作。二是对已启动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而又编编停停的县（市、区），要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尽快恢复，要按照年鉴的规范要求，实现一年一鉴，逐年连续出版。三是已实现按年度、连续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的市州和县（市、区），要严格按照《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规定》、《甘肃综合年鉴编辑规范》等规定，不断提高年鉴质量，争取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的质量水平再上新台阶。四是要努力培养一支人员相对稳定、政治素质高、业务水平好、能打硬仗的年鉴编辑队伍。要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外出考察、相互交流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年鉴编辑人员和各部门、各单位供稿人员的文字水平和业务能力。五是要通过政府出面，沟通协调好与提供年鉴稿源各部门、各单位的关系，积极争取他们对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的关心支持，以保证年鉴供稿渠道的通达、顺畅和及时到位。

积极推进信息化工作。一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提出的地方志信息化建设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级建设、资源共享”的原则，科学谋划，尽快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地方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意见》，以规范和统一全省地方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为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信息网站联接，实现全省地方史志系统信息网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供制度保证。同时，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加快“一网、一库、一馆、两平台”的信息化建设。“一网”是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门户网站。这是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主阵地，是向社会各界展示甘肃方志工作的主要平台；“一库”是甘肃省地方史志全文数据库。通过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将全省各地的志书成果、地情网站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努力打造甘肃地方志书、地情信息展示、检索、服务和共享的数据中心；“一馆”是甘肃省数字方志馆。通过开发甘肃各地地方志资源管理系统，把全省的数字化志书、年鉴、地情资料、旧志、方志期刊、音频、视频、图片等资源集中起来，利用虚拟技术，对甘肃地情进行二维、三维全景展示，改变传统意义上方志馆存在的服务时间的限制和空间距离的障碍，为读者提供跨区域、跨空间的便捷服务；“两平台”是甘肃省史志系统网络办公平台和方志甘肃微信公众号平台。依托甘肃省史志系统网络办公平台，全省史志系统将实现志书资料数字化、志鉴编写无纸化、公文传送网络化、学习开会视频化；依托方志甘肃微信公众号平台，人们只要使用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和掌上电脑，就能够随时、随地、随身访问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门户网站，查阅你所需的地情资料信息，充分享受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给您带来的便利。二是对少数市州和县（市、区）地方史志工作机构尚未建设开通地方史志网站的，要积极

创造条件，尽快建设和开通网站。对已建设开通网站的，要继续抓好网站建设的完善和改造升级工作，尤其要在统一数据格式、统一数据标准上下大功夫，以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三是加大经费投入，确保信息安全。加强资金和技术投入，充分借助各类资源和技术力量，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建设软硬件设施，努力提高省、市、县三级信息技术水平和安全等级，强化保障措施，严格管理，不出安全保密等方面的问题。四是加快人才培养，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保证。要定期举办网络信息技术培训班，全面提高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五是强化督查考核，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激励机制。省、市（州）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加强督查考核，要通过评先树优、通报情况，达到激励先进，提升中间，帮扶后进的目的。同时，充分发挥甘肃省地方史志网和方志甘肃微信公众号平台作用，加大对典型做法的宣传推广力度，形成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工作格局。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举办全省第二轮省志编纂业务培训班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于6月28日至30日在兰州举办全省第二轮省志业务培训班。全省第二轮《甘肃省志》承编单位编纂人员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体人员，共计130余人参加培训。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张军利在开班仪式上通报了第二轮省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并就编纂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修志人员的责任感、学习方法等作了讲话。

这期培训班邀请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原处长王晖、四川省地方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处长陶利辉、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二处处长任小燕、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处长陈守强进行集中授课。授课内容包括二轮省志篇目设计、资料收集、志书体例、统稿总纂、资料转化和行文规范等方面。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 孔令奇供稿）

《迭部县志（1991 ~ 2010）》通过终审

6月26日，甘南州政府在合作市召开甘南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终审通过了《迭部县志（1991 ~ 2010）》。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赵凌云主持终审会议并发表讲话。

赵凌云说，《迭部县志（1991 ~ 2010）》内容丰富、实事求是，翔实地反映了二十年来迭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迭部县志（1991 ~ 2010）》编纂完成是甘南州地方志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也是甘南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大重要成果。

赵凌云强调，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连绵不断，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 2020）》精神，着力推动我州地方志事业全面科学发展。希望全州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继续发扬拼搏奉献精神，拿出最佳状态、最高水平，结合我州实际，打好“民族文化牌”，全力推进我州地方志事业全面科学发展，为我州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建功立业，为我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甘肃省甘南州地方史志办公室 苏树民供稿）

陇上女诗词大家江瑞芝

时下翁

《甘肃通志·列女传》三卷七十八：江瑞芝，字天香，静宁江自岷女，副贡刘曰萃之母也。幼从父学，性颇颖慧。及父官天津，女红之暇，博览群书，尤耽吟咏，著有《蝉鸣小草》行世，后适刘，克尽孝道。

——题记

诗礼名家，清德习染

雍正二年（1724）五月初六，一个女婴在甘肃静宁州阜民坊通化新街一个世宦家庭呱呱坠地。她，就是陇上才女江瑞芝。天香，是及笄后父亲江自岷为她取字。

静宁江氏世族，鼎盛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咸同以后，则家道渐落。其起家人物是明成化朝的江深。江深字淮三，以例监生出仕，任四川夔州府照磨（审计官）。深子江岳，字永镇，嘉靖十二年选贡，任四川广安州判，清慎慈祥，征税不扰，后致仕。江岳之子江玉泉江玉京。玉泉字汝达，万历六年选贡，任四川灌县主簿，免除了寺院、贫民差役，士众僧人感激，为之立祠。玉泉次子江渤，万历二十一年选贡，除知山西芮城县。江渤孙江锭江鈖。长孙锭字彝珍，诗文清丽，中清顺治癸巳万寿科经魁，拣选知县户部学习，为户部主事。致仕后江锭江鈖昆仲二人曾参与康熙《静宁州志》的编写，江锭担任总局（主编），江鈖为分采（资料提供）。锭长子江自岷，季子江自岚。自岷字汇百，雍正丙午（1726）科举人，候补知县，历榷（天津）长芦之富国场盐务，归化场盐务。其为人，忠信孝悌，颇有口碑。且复意气闲雅，磊落不羁，诗文之外，兼擅琴书，是江瑞芝成才的启蒙人，女儿心中的偶像。自岷弟自岚，字腾百，乾隆庚午举人，拣选知县大挑授中部（陕西黄陵县）训导，淳朴好学，善书工诗，教诲后学，多所成就。江自岷子侄有江琯、江璿、江玮等；女四，瑞芝居长。

江氏世族中出仕者众多，其中不乏名宦，如列入《静宁州志·人物志·遗献》的万历朝山西芮城知县江渤，州志说他“性鲠介，慎名节，恬退自矢，不喜纷华”。上任伊始，芮城吏胥按照惯例奉上“欢迎费”三百金，渤厉声曰：“此民脂民膏耳，何以玷吾官箴为？”“急挥去”。以故“解组之日，囊橐萧然”。“渤穷经有得，归里杜门，手不释卷，所著有《春秋题旨》若干卷，藏于家。治家有法，教子颇严，虽独居，衣冠危坐，毫无惰容”，俨然古君子。《州志》叹道：江氏“父（江岳）、子（江玉泉）、孙（江渤）三世拔萃，清德相承，亦可风矣”。瑞芝祖父江锭，年少时即嗜学，为此他远避尘嚣，到离城百多里外的云台山（在今庄浪县永宁乡关山脚下）读经。《州志·艺文志》有《读书云台山》二首，即记其事。功夫不负苦读人，顺治癸巳科乡试，江锭在陕甘众多士子中脱颖而出，夺得第四名经魁。瑞芝的胞兄江琯，民国《静宁县志》有传。琯字献璧，号孑庵，又号朴拙，“性至孝，幼侍亲侧，虽命之坐，亦不坐。父母卒，哀毁骨立，殡葬必尽礼。庐墓三年后，每逢忌日，辄流涕不忘，孝行之称，内外无间”，乾隆中举孝廉方正。治学方面，江琯翻阅群书，博通经史。著有《三余集》《孑庵属词效颦》《五经合稿》等，士林争相传抄，称颂不置。

年幼的瑞芝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继承了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家孝敬父母，和睦姊妹；嫁人则上侍衰老，下教弱儿，含苦茹辛，玉汝以成，书写了自己无憾的人生。而受家学渊源的滋养，使她能够靠个人之努力，踏进诗歌的门槛，以其代表作《蝉鸣小草》，荣膺诗人桂冠，成为独一无二的陇上闺阁才女，馨香后世。

潜心吟咏，一《鸣》惊人

未出阁的江瑞芝，在家里其实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雍正四年，瑞芝年方两岁时，江自岷考中

举人，候补知县。自此父亲时不时去到外地，各方打点，以期递补一个实缺。利用居家赋闲的空隙，父亲教瑞芝以小学、《孝经》、四书及《内则》《内训》《列女传》诸书，“使其陶镕德性，冀将来不替妇道尔”，并无过大的期望。而禀赋超群的江瑞芝“于所教之书，辄过目成诵；授之讲义，即能领悟”，甚至迷上了写诗，女红之余，潜心讽诵，择词炼句，乐此不疲。

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而言，无望依靠个人奋斗纡朱曳紫，光耀门楣，但深明大义的父亲江自岷自有不同流俗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历代不乏彪炳史册的女才子，如西汉代父传经的伏胜之女、东汉续成《汉书》的史学家班昭之妹曹大家、前秦传授“周官”学的宣文君宋氏、东晋制作回文诗《璇玑图》的苏蕙等等。如果不学，这些人能成为名垂千古的闺范吗？何况，“诗三百篇”中，不乏女子之咏，“是诗书立教，圣贤原不为女子靳也”。为此，江自岷因势利导，让爱女放手学诗。嗣后，江自岷别妻离雏，远官天津，瑞芝旋归刘门。“未审于诗书之业，尚能究心否？”成了父亲心中挥之不去的悬念。乾隆十年，江自岷接内人潘氏至任所，潘氏拿出瑞芝所著诗稿以相示，浏览之余，江自岷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瑞芝所作，立意高远，合格适律，笔力不免稚嫩，诗味却倒醇永，和学步之初有天壤之别。原来，父亲离家之后，求知欲强烈的江天香在完成课业之余，充分利用家藏的图书资源，博览群书，“潜心探索，日事吟咏，匪伊朝夕”。俗谚“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作诗也会吟”，果然，瑞芝诗作骤然长进，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其思亲述怀之什，出以至性缠绵；其咏物遣兴之章，出以慷慨恬雅”，且“绝无女子脂粉态”——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惊喜。

乾隆十三年，由天津长芦富国盐场转任临榆归化盐场大使的江自岷思女心切，于是写信召女。瑞芝乃偕一子一女两个外孙，前来省亲。沿途风物，尽入诗篋。与父晤面之日，出平日所为诗词呈父，深得父亲赞许。江的好友同僚闻讯披览，咸惊慕异常，彼此相告，有类今天“微信朋友圈”传播之效。他们主动为其写序题跋，促其早付梨枣，以垂久远。陇上道学名家、通渭“老乡”李南晖击节赞道：“余曩不意其即援笔能诗文者，今且竟能若是！”自岷“兰臭相投”的至友、时为越支盐场大使的贵州人章世焘的评语尤富魅力：“是宁特梨花带雨，杨柳凝烟，辟邪蛙绿，触目斑斓，蜀岔皱红，照人璀璨已耶？”还有，江自岷的上司、盐巡道李星汉（庆阳人）的题跋，亦出语不凡，令人帖服：“（其诗）或格调超逸，或寄托高远；或象物写生，或比兴幽窗。谢庭之絮，何多让焉？班姑之香，且将可拮。真闺中才子，不可多覯者也。”一来同僚盛情难却，二来怜惜弱女苦心，三来盐场大使虽属正八品小官，但“油水”颇丰，付梓印费不成问题。于是江自岷订正女儿散稿，汇为一卷，题名《蝉鸣小草》，于乾隆十七（1752）年（壬申）刊行问世，是为《蝉鸣小草》“乾隆壬申本”。壬申本原版先交由刘氏收藏，后来在匪患中被焚。光绪中，江瑞芝的侄曾孙，做过学正、教授微官的江树蕙，不忍沿没前人苦心，于是倾其所有，于1889（己丑）年再次刻镌成书，是为“光绪己丑本”，习称“二刻本”。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看了上面那么多的赞词，如果有人把江瑞芝理解为“见花落泪，见月伤心”的娇小姐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优越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培育出弱不禁风的豆芽菜，江瑞芝与生俱来的，是自强不息的丈夫气概，君子潜质。在家学诗，她硬是苦磨苦吟，无师自通；嫁为人妇身处艰难，她无怨无悔，从容应对，同样名扬闾里。江瑞芝有一首佚诗《于归感怀》：

奴自于归握节符，三朝庙见定称呼。
堂空未克礼翁舅，闱冷何由拜阿姑。
举目重庭惟二老，回头阶下尽诸孤。
我来如此萧条况，那得心中免苦荼。

此诗如实反映了她初适刘门的窘境，读来令人感叹唏嘘，顿生怜悯。个中原委，得从丈夫刘元的家世说起——

江瑞芝长大成人，到了当嫁的年龄，父亲远在外地，公务缠身，遂由母亲和亲族张罗，送女成吉。婆

家相距不远，在通化后街。根据静宁《刘氏家谱》记载，刘氏祖先为宋代水洛寨主刘沪将军，沪之后裔遂家水洛城西北花沟。明中叶，其一支迁居静宁，遂为静宁州城刘氏之祖。刘元祖父名登俎，庠生；父文珠，庠生。文珠公三子，刘元居长。刘元字殿一，性情至孝，博览群书，人号“小通鉴”。他三岁丧母，未成年丧父，青年丧偶，人生之不幸全让他摊上了。江氏过门之日，舅姑（公婆）已前逝，祖父母尚在堂，叔妹年幼，家中用度，全靠刘元教书维持，拮据之状，可想而知。困难面前，父亲给她讲过的仁智、贤明、贞顺、节义……的古代列女形象，在她脑海里一一映现，给了她无穷的精神动力和面对现实的毅力。于是，从小养尊处优的江瑞芝一扫脂粉，洗尽铅华，布衣荆钗，亲操井臼——“事祖父母曲尽孝道，相夫子以敬，与叔妹以和，且教习诗礼，次第授以室家，聘奁之物，无所薄厚，内外咸服其德”——《刘氏家谱》这短短的五十个字里，凝聚了瑞芝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寒儒之家付出的日夜熬煎，血汗泪水！婚后某年，她应父之召省亲。瑞芝“依违踌躇，忍别祖父母”，含泪登程。在天津、秦皇岛盐署小住的大约两三年多的时间里，江瑞芝“一饮一食，必念祖母。常寄银家中，以为奉养之资”。同时，江氏把她对祖母、对家乡的怀念，一一倾之于诗——《春雁》：“奈何西地来，未有尺书寄？”《春柳》：“开眸见春色，回首忆秦州。”《秋日感怀》：“乡书写就凭谁寄，塞雁流连盼未归”……睹景思亲，真挚动人。当瑞芝旋归故里时，祖母裴氏已年届耄耋，瑞芝殷勤服侍，胜如亲生。迨至九旬，病在床褥，孙媳“日夜扶持，手涤厕牖，衣不解带者数十日，无怠容。及殁，哀痛几绝”。无论衡之以旧道德新道德，江瑞芝都堪称完美典型。

瑞芝生子四：曰观、曰豫、曰复、曰萃；女二（一说长女为前室高氏生）。四子经其母精心指授，俱成通儒，其中刘曰萃最为知名。《甘肃通志稿》说他“器识高迈，学问亦博，教子侄得燕山遗意，工书能诗”。著有《三梅斋诗稿》。

江氏晚年，与丈夫刘元诗酒唱和，赌茶为戏，如南宋赵明诚、李清照故事，闾中传为美谈。嘉庆七（1802）年五月二十三日，79岁高龄的江瑞芝无疾坐化，走得无憾，走得从容，走得难得——她的人生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行笔至此，作者认为江氏昔日的一个细节不容忽略——那是她在临榆（今属秦皇岛市辖）归化盐场衙署小住之时，每当江自岷处理盐场诉讼案件，女儿总要预先提醒父亲审时度势，力戒滥刑。如所周知，自从西汉武帝时始，历代王朝实行盐铁专卖。由于丰厚经济利益的驱动，许多人不惮以身试法，贩卖私盐，遭到严刑处治。所以江大使对女儿的劝告颇不以为然，说“此国法也，我何敢徇私？”这时，年轻的江瑞芝慷慨陈言，通过对儒家核心价值观“仁、义”的透析，阐明了赏厚罚薄的处讼思路。一番话，说得出仕多年，听断经验丰富的父亲心悦诚服。自此以后，江自岷处理署务，格外审慎，力求公允，使无不平。归化任内，口碑尤佳。这则故事，使人想到江瑞芝的一段名言，她说：“读圣贤书，当于身心上体察，方觉有味，方能收益。事父母果能竭其力，事君果能致其身，与朋友交，果能言而有信，兄弟果能翕，夫妇果能和，此即是学矣。世人竞以能文章、能诗赋为有学问，盖去圣贤之旨远矣。”江氏以社会为学问，以治家为学问，且数十年躬行亲践，夙夜匪懈，其言堪比经典，其行令人仰止。假若天香生为男儿身，以她的禀赋才华，何难月中折桂，平步青云？以她的超迈器识，又何难调和天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瑞芝《赋得有鸣仓庚》诗“养翮宁无待？深啼应有情”，“东风若借力，好去上林鸣”，正是瑞芝渴求报效国家心声的抒发。然而时代所囿，江瑞芝一生只能围着锅台扫把转，终老牖下，怎不令人为其扼腕，感叹唏嘘？

诗坛独步，天香流芳

《蝉鸣小草》诗目列诗六十首，其中《隆德道中别母》等五题各为二首；《秋日感怀》八首；《春咏》十六首，合计八十七首（目录外一首，不知诗主，不计），这些诗均成于乾隆壬申（1752）年之前。实际上，江氏嗜诗如命，津门旋里之后的主家期间，于柴米油

盐诸务之隙，忙里偷闲，未尝一日荒疏诗词。其二子刘曰豫尝言："太孺人自父任回家，所作诗词歌赋不下数百首，余等力微，未能付梓，仅有楷书者数本藏于家。"可见《小草》所收录的，盖其生平所作之一小部分而已。七十二岁时，同城文士化鼎吉撰修《化氏家谱》告竣，请江瑞芝作序，老太太即允所请，欣然命笔，亦可见江氏钟情诗文，至老笔耕不辍之一斑。

今天，当人们大声疾呼力戒浮躁，呼唤天真理性创作理念回归之时，《蝉鸣小草》的诗学美学价值何在？社会意义何在？笔者拙见有三：

其一，《小草》填补了陇上诗坛无女诗人的空白。

东汉时代，陇上诗坛曾出现了一位风华绝代的女诗人，那就是陇西通渭人徐淑。徐淑丈夫秦嘉字士会，亦擅诗文。嘉为上计吏远赴洛阳，二人鱼雁往来，互诉衷肠，一一寓之于诗。后秦嘉客死他乡，淑兄逼其改嫁，她"毁形不嫁，哀恸伤生"，守寡终身，留下了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秦嘉和徐淑的诗，受到了我国历代诗论家和诗选家的称赞，也得到历代读者的尊敬。东汉以降，迄于民国，陇上诗坛曾有过盛唐边塞诗的辉煌，明代"前七子"李梦阳崇古派的风靡，清代"关中四杰"吴松厓的清新……但那只是男人天地，呈现的是单一的阳刚——没有女性的声音，女性的柔美，不是完整的世界。民国以来，各种有关历代女性诗人的书籍资料陆续问世，影响较大的有民国施淑仪辑录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近年王英志编写的《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和肖亚南主编的《清代闺秀集丛刊》。有人通过对《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1260余位作者里籍的统计，发现女诗人群体分布最广的是鱼米之乡的浙江（524位），江苏（465位）次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陕西二位，新疆一位，甘肃归零。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寻觅觅，终于在迄今为止同类规模最大的《清代闺秀集丛刊》一书中，找到了甘肃籍女诗人江瑞芝的《蝉鸣小草》。原来清代女诗人人数众多，但出专集的仅占约其中的四分之一，在该丛刊搜罗到的401位闺秀的403种诗集别集中，静宁江瑞芝及其诗作，赫然在册，打破了明清闺阁诗苑江南才女一统天下的局面，"见我西陲山川之秀"，为我陇原父老增光，着实令人鼓舞。

江瑞芝的诗歌成就，颇得陇籍学者的重视。民国方志学、金石学、西北地方史专家张维的名著《陇右金石录》，不仅介绍了江瑞芝其人其诗，而且全文收录了贵州章世焘、通渭李南晖撰写的两篇序文，用以展现江诗的创作成就，这在《金石录》中是罕见的破例。静宁民初第一任县知事、学者王烜在其《存庐诗话》和《历代甘肃文献补录》中两次写到江氏诗作，十分推崇。

其二，《小草》显示了作者诗歌创作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风貌。

按品类分，诗集所收八十七首诗中，古体诗所占比重不大，只有《赋得有鸣仓庚》、《赠秦安何世嫂夫人》和《望姜女坟》三首，其它均为近体。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人言"古体易学难工，近体难学易工"，近体诗只要掌握了平仄规律，对仗特点，就能写出像模像样的东西，所以初学者一般都是先律绝而后歌赋。贯穿江氏律绝的主旋律，是女孩小鸟依人的思亲情结，而抒发少女怀春、花前月下一类的诗句在《小草》集中，是决然看不到的。无论是秋夜独坐，还是春日斜晖；也不管是草木飞黄，抑或是杜宇哀啼，总会逗起瑞芝对父母对家人的思念，正所谓"离情自古人同有，别恨谁知我独深"（《秋日思亲》二首）！在家乡，她翘首关山，思念三千里外的椿萱高堂；到辽西省亲，她又萦怀留守秦塞的风烛二老，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换个角度看，封建时代，女子的活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江氏概莫能外。若不是早年的辽西省亲之行，她一生的行迹，出不了静宁城圈圈的范围。狭窄的活动区域，贫乏的生活阅历，限制了她的空间，这本是她诗歌创作的不幸，然而这恰恰逼着她心无旁骛，专注地在"思亲"二字上做文章——"安得身輕如旅雁，关山飞过到天津"（《元日偶成》）、"最是思亲一念深，百方难医此愁襟"（《书怀二首》）、"乡书写就凭谁寄？塞雁流连盼未归"（《秋日感怀》）……把炎黄民族重亲情、重天伦的传统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熠熠生辉。

瑞芝诗存世不多，但其诗风个性已显端倪。前人惯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形容女性诗作。不错，瑞芝之诗，果"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

羞”。若仔细品读，就会觉得她的清纯是一种接近透明的清纯，简直到了“实话实说”、“白话白说”的程度——《怀小妹瑞薇》：

自离乳妹小薇哥，迅速光阴一载多。
记得去时方学语，不知此后又如何？

不假修饰，不事雕琢，内心独白脱口而出，使人鼻酸的艺术效果随之而来，这样的诗，世上能有几首？再如《之父任，别潘舅母并诸姊妹》：

我去心偏急，临岐复暗伤。
征途如箭速，离恨等天长。
梦寐常相忆，嬉游幸勿忘。
暂时遥望处，只有树苍苍。

诗人远赴津门省父，临别依依，执手相看泪眼，叮嘱姊妹“梦寐常相忆，嬉游幸勿忘”，这不禁让人想起《焦仲卿妻》中刘兰芝被驱，和小姑痛别的场面：“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千古同调，一样感人肺腑。

此外，笔者想说的是，由于题材范围的促狭，春雪春愁秋月秋夜往往成为江氏吟咏的对象，光《春咏》题下诗涉及春的意象就有十六种之多。江瑞芝根据其不同场合，各自特质，处理得丝丝入扣，毫无雷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其三，《小草》吸收了黄土地的滋养，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民俗文化元素。

兹举二例。

《隆德道中别母口占二首》之二：“说道萱堂赴远行，匆匆不尽别离情。满川草色红如许，都是思亲泪染成”。末二句运用夸张，将满川草色之红，说成是离别悲泣，血泪染成。艺术效果，自不待言。但草怎么是红的？不免使人生疑。原来陇坂大地的沟边路旁及河川湿地，广泛生长着一种草本植物，名叫红蓼（俗名水红，《静宁州志·物产》有载）。夏秋之交开花，远远望去，宛若血红。瑞芝将家乡风物信手拈来，引类喻譬，亲切生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艺术效果。诗集中陇原草木鸟兽和地理名词还有许多，如牧童、塞雁、仓庚、蕨、（六）盘山、关山等等，无不给诗篇打上地域的鲜明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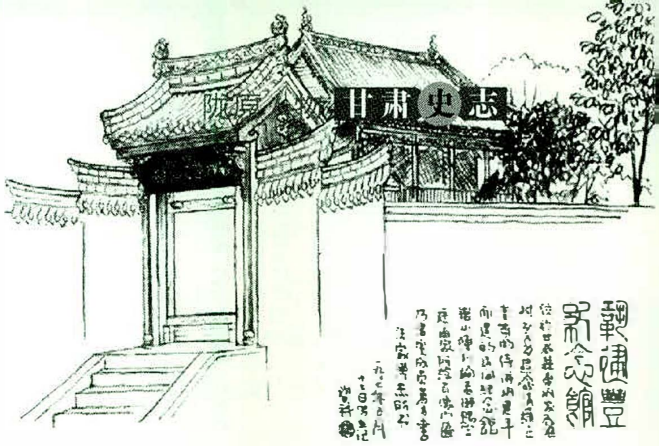
再有，上文我们举例过的《怀小妹瑞薇》的首句“自离乳妹小薇哥”，也很耐人寻味。男尊女卑是旧时代人们普遍的习俗观念，生了女孩的人家，给孩子起的名字往往带上良好祈愿，比如“招弟”、“引弟”、“转变”之类，民俗色彩甚浓。同时人们把女婴女童昵称为“哥”，如“嫚哥”、“憨哥”等等。北方广大地区都有此风俗，《红楼梦》中荣国府的管家大奶奶王熙凤小时候，大家不就叫她“凤哥儿”吗？我们说，出生于小小静宁州城世宦之家的江瑞芝，实际上也是生活在市井生活圈，生活在民间。家乡的风习时尚，一草一木对她而言，实在熟悉不过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些本土文化元素的渗入，使他的诗作如烂漫山花，别具情调，特别亮眼。

江瑞芝生于雍正，殁于嘉庆，经过了乾隆盛世的整个过程。史料记载，康雍乾时期，静宁地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发展到空前水平。任何文艺作品，总是会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虽然，《小草》没有也不可能把笔触指向重大社会事件，未能跳出家庭的小圈子，然而透过其所书写的离情别绪、悲欢离合，揭开“淡淡的忧伤”的纱幕，人们感受到的，依然是太平年间的安谧和祥和，恬然与无忧。

二百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太平老妪江瑞芝安详地离去，把一本不算太厚的《蝉鸣小草》留给这个世界。如同一块陶片，一段残垣，一方册页，一枚五铢一样，其本身必然嵌藏着不菲的人文社会艺术等信息，可以“究天人之际”，也可以“通天人之变”，“非遗”之所以珍贵，原因就在于此。甘肃自古苦甲天下，明清之际能出现江瑞芝这么一位可和江浙任何一位才女媲美的诗人，是很了不起的事。《蝉鸣小草》历经同治文革两大浩劫，孤本流传，更是不幸中之大幸！人们千万不要因“小草”之细而漠然视之，不要以“蝉鸣”之微而充耳不闻，“寸金尺玉，投之荒谷大野”的悲剧，岂能再次重演？相信，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它的存世价值，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也一定会有丰硕的专题成果问世——

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甘肃省静宁一中退休教师）



关西师表巩建丰

王　琪

公元1673年（清康熙12年），巩建丰出生在伏羌县东川的巩家石滩村。这里前临渭河水，背靠朱圉山，山清水秀，历史悠久。伏羲皇帝就诞生在离此地不远的朱圉山古风台，孔子贤人石作蜀、蜀汉大将军姜维都是他的同乡，而巩家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官宦人家。他的高祖父巩龙光，曾官至明代山东兖州府通判，是正六品的官员。他爷爷巩国势，是一老秀才，虽无缘功名，但笃学笃行，严于修身，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巩维桢正在当时国家最高学府京师国子监受业，充博士弟子。深厚绵长的历史文化底蕴，英才辈出的钟灵毓秀之地，滋养了他高尚的灵魂和纯朴的心灵；家学渊源的根脉，书香门第的熏陶，加之巩家石滩村古朴纯然的民风民俗，造就了他诚实谦逊的品格和勤奋好学的坚韧。少年时的巩建丰，犹如一盆郁郁葱葱的君子兰，在无边的春光里，努力地汲取阳光雨露，茁壮生长。历史记载，他自幼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化，熟读《四书五经》、《纲鉴捷录》等古籍，常常“读书励志忘餐，七岁能诗，十岁能文。”入学后更加勤奋刻苦，少年时即树立远大志向。有一年春节，曾自书春联一副，明心言志：“经纶事业思文正，淡泊胸襟仰武乡。”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诸葛孔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高尚情怀，成了他一生为官的精神向往和做人的思齐尺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然而，正当巩建丰像一株欣欣向荣的向日葵那样，在金色的阳光下，摇曳着年少的梦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降临了。他慈爱的父亲巩维桢突然因病去逝。当时父亲正在京师国子监受业。父亲去逝后，朝庭追赠为文林郎、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检讨（正七品）。父亲虽然受到了国家的褒奖，得到了应得的荣誉。但对正在年少的巩建丰而言，不啻晴天霹雳，他生命的天空顿时如六月飞霜，凄风苦雨。生活的打击，命运的不公，仿佛让他一夜之间长大了，他比同龄的孩子更加成熟、更加稳练，也更加谦逊、更加好学。那些日子，守着父亲的亡灵，望着凄楚的母亲，他明白无忧无虑的生活，单纯快乐的日子已经远去了，而他心头的责任，肩头的担子也更重了。于是他一边为父守孝，事奉母亲，一边砥砺意志，发愤读书。因学习成绩优异，21岁考为秀才，补为增广生员，入县学学习。入泮后的巩建丰，像所有古代知识分子一样，奔走在一条“科举仕途”的羊肠小道上。然而，金榜题名谈何容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诗人浪漫的畅想，真正的科举之路，向来充满艰辛和坎坷，漫长而艰难。对于甘肃士子而言，这条道路尤为严峻。当时，甘肃省虽然已从陕西省分出（康熙二年分省），独立建省，但乡试依旧与陕西合闱，贡院设在西安，由于甘肃地域辽阔，距离西安千里之遥，甘肃学子前往1000多公里外的西安应试，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花费很大，参加乡试的士子只有十之一二。每次录取的62名举人里，基本都是尽得天时地利之便的陕西士子。绝大多数甘肃学子皓首穷经，饱读诗书，但因家境贫寒，拿不出盘缠，无缘参加乡试，只能终老乡野，抱憾终身。这种状况直到光绪元年甘肃贡院建成，陕甘分闱，分设学政以后，才有了改观。巩建丰虽不至于因盘缠不足而无法参加乡试，但在这场充满种种变数和命运玄机的竞争中，巩建丰却屡次失利，累试不弟。然而，科举之路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巩建丰别无选择！于是，从21岁考取秀才，到40岁博得功名，整整20年的时间，巩建丰一边发愤读书，参加科考；一边在县城柳湖

之滨开馆授徒，传道授业。他渊博的知识，精湛的学问，赢得了伏羌莘莘学子的嘉声，一时间贤俊云集，“鬓如戟者亦无不肃供听讲”，邑人争师之。这是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也是一段拼博奋斗的时光，更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时光。春去春来，花开花落，柳湖之畔，回荡着他传道授业的声音，大像山上，存留着他吟诗作赋的儒雅。春花灿烂，映照着丰满的理想，秋月含情，流泻着思亲的情绪。晨读的书声，穿越古城的街巷，晚课的墨香，滋润渴望的灵魂。追梦路上，巩建丰马不停蹄，扬鞭奋进。

公元 1713 年（康熙五十二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巩家大院里的那颗老梨树才露花苞，吉祥的喜鹊就飞上枝头，歌声不断，好似在宣告着巩家即将来临的喜事。

那一年，是康熙皇帝 60 大寿之年。这位“早承大统”的皇帝，在位已有 52 个春秋。52 年来，他扳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安抚蒙古四郡，终致王朝升平，“国家蓄积有余，民间年岁颇丰。”康熙觉得普天同庆，以彰盛典的时机到了。于是，清代历史上首次“恩科”出台了。巩建丰在年届 40 岁时，恰好遇上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这一年的春天，他携带着朱山的厚重，濡染着柳湖的灵气，踏上了东去西安的科考之路。此时的巩建丰，经过 20 年的寒窗苦读，20 年的砥砺磨练，对人生、对世事都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和更清醒的认识，不好高骛远，不怨天尤人，平淡如菊，从容如水。因此，这一次，他是抱着一颗平常心从容赶考的，既没有初次考试时的激动和不安，也没有屡试不弟后的惶恐和焦虑。而结果却考出了最真实的水平、最优异的成绩。当主考官余长策、副主考官李士瑜和熊学烈等，在认真批阅了他的试卷后，不禁交相耳语曰：“此卷有儒者气象！”蛰伏 20 余年的巩建丰，厚积薄发，终于在乡试中脱颖而出，高中举人。中举，对巩建丰而言，意义非同寻常，不但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更是他报答泉下父亲、高堂母亲最好的礼物。然而，巩建丰没有太多的时间享受金榜题名的喜悦和亲人朋友的祝福。二月乡试虽然告捷，但八月会试、殿试在即。他必须全力以赴冲刺这人生最荣耀的时刻！八月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金秋八月，好运再次降临到巩建丰的头上，会试殿试，两试皆捷，赐进士出身，官翰林院检讨，留在当时国家最高学府 -- 国子监讲课。

公元 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巩建丰母亲逝世，他便请假归里守制，三年丁忧期满后，即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巩建丰由故里回京复入国史馆供职，授任康熙帝文学顾问。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庚子）顺天乡试，1721 年（康熙六十年辛丑）顺天会试时，他皆任同考官，协同主考官阅卷。

公元 1723 年（雍正元年），康熙帝驾崩，清世宗即位，改元雍正。巩建丰授任日讲起居注官。于是得天天陪伴雍正，不离左右，为雍正讲解经史，记载每天的起居言行。一次，他与雍正讲论《大学》，雍正十分满意，“动容听之”，当即赐给貂皮、茶叶和笔墨等物。据说他常挟一匣于肩舆中，朝暮日随，记载雍正言行，但“其所记录，虽子弟门生，亦秘不以示。”雍正对他博大精深的学问和“冰壶玉尺”的为人颇为赏识，“每蒙差事，赐御物累累。”曾在殿上对侍列群臣说“尔等皆当效法”。之后，就把培养太子弘历的重任委托给了他。巩建丰在雍和宫精心施教，对乾隆少年成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 1724 年（雍正二年）8 月，巩建丰钦点出任四川乡试主考官，主持四川乡试，选拔英俊，独具卓识，所取举人后多成名成才，被时人誉为“当代伯乐”。次年重阳节，雍正召集群臣和翰林院诸官，赐宴乾清宫，君臣联句共赋“柏梁体”诗会，巩建丰以“佳节云日换轩楹”句恭呈御览，“上为之色”。雍正曾对近臣说：“巩某持重老成，尔等讲官皆当效法。”由此足见雍正对巩建丰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升授他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正五品）。

公元 1720 年（雍正四年）冬，白雪飘飘。通往云南的山路上，匆匆走来一行人，走在最前面的两位就是新任云南省提督学政巩建丰和他的长子巩敬缉。云南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经济文化也较内地落后。但这并不妨碍他托庇功名，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于是，他满怀着一腔爱国忧民的热

情，不畏路途遥远，欣然前往。然而，当他行至湖南常德时，儿子巩敬缉不幸染病。巩敬缉，巩建丰长子，雍正癸卯举人，会试不第，便留京邸侍奉父亲。巩建丰视学云南时，便随父前往。夜幕降临，北风潇潇，看着驿站客舍里病重的儿子，抚摸着临行时雍正赐给他的笔墨，他又想起了雍正帝“激浊扬清，维风正俗”的谆谆嘱托。重任在肩，他无法停下前行的脚步。于是，他带着生病的儿子，继续匆匆行走在前往云南的路上。不料，刚到昆明，巩敬缉因耽搁治疗，病情加重，不几日竟阖然长逝，客死他乡，年仅 24 岁。消息传至伏羌老家，贤惠的长媳蒲氏，又自缢殉节。一年之内，痛失二位亲人，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何等的苦痛，又是何等的残酷。漫漫长夜，孤灯如豆，他心如刀割，无法入眠。一双茫然的眼睛，久久地遥望着北方的天空。痛定思痛，他哭之以诗：“大梦真同幻，浮生竟若兹。长男既不保，家妇又如斯。归陇行无计，用官奚以为。鬓边增白发，不胜晓风吹。”这件事，对巩建丰影响极深。二十年后，当他隐退归里，编纂《伏羌县志》时，依然记忆犹新，泣血淋漓：“丙午冬，太史视学云南，缉随任，构疾卒。家闻讣，蒲号呼恸跌，损厥首指，死而复苏。其家设灵致祭，乃潜登楼自缢，适一婢奔救，复从数栏飞下，头破血涌，伤左股，卧床三月。姑时为哭劝，蒲呜咽流泣曰：“非不知恩厚，奈夫亡，妇难独生，又无子可继，不死何为？”逾年柩归，撞头棺上，几毙。姑令婢不时环守，迨葬期将届，意欲同穴立节。忽修发整容，言笑自若，家人疏防，仍赴楼自尽衣桁间，年二十四。”200 多年后，当我们读到这段文字时，依然能感受到他滴血的心灵和痛苦的灵魂。

然而，肩负着朝庭使命的巩建丰，无法独自疗伤，他只能把个人的伤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以使命为重，以责任为先，全力以赴完成雍正帝“激浊扬清，维风正俗”的嘱托。巩建丰就职后，谢绝一切请托，主试查访，深入边疆村寨，足迹遍及云南各地。他推行教育，兴办学校，选拔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当教习。在科试中，他以身作则，严格科试制度，整饬士学，革除以往科试中存在的十大弊病，不遗余力选拔人才。他到任的第 2 年，亲自起草了《滇南课士条约》，规定了童生必须遵循的品行规范，要其“敦伦修行，尚志立品，务实力学，尊师择友。”力求做到端方正直，勤学慎思，切忌沾染各种不良习气。在主试查访中，严禁童生饮酒，倡导朴素向上风气。在主试中一旦发现童生中有“稍近华靡，不安朴素者”，总是“严加训诲，委曲开导，务令识撙节爱养之道。”他兴利除弊，移风化俗。大力提倡朴素节俭之风，反对大肆操办婚嫁、丧葬陋习。在任内他先后上疏数折，均被雍正帝嘉纳，雍正帝还在一奏折上朱批道：“尔人品端方，朕信得过尔。”由于他在任内兴利除弊，持衡取士，使云南“文风渐升”，“习弊杜息”，造就了一批人才。李因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赐进士出身，历官资正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东学政。巩建丰病逝后，李悲痛欲绝，特地为其作墓志铭，以表达对先生的栽培之恩和感念之情。

巩建丰在云南苦干了三年，昔日的边陲之地文风大振。一时间，他在云南兴学取士和移风化俗的义举广为传颂，“辙迹所至，人皆争乐道之。”与他同年中进士的滇人张汉（官河南府知府、著名书法家），在《介亭巩先生七十寿序》中云：“先生督学吾滇南，登明选公，人至今传颂，吾家子弟胥被教泽。”并赠巩建丰一副对联：“吾道南时，士望于今仰北斗；美人西去，群情未许卧东山。”公元 1729 年（雍正七年），巩建丰学政任满回京复命。临别时作《滇南别意》诗一首，以表达自己对云南士子的厚望和恋恋不舍的心情：“三年校士遍诸州，欲别临歧复逗留。桃李迎风诸庇荫，鲲鹏击水待遨游。去思漫看荒郊碣，来慕空传往日讴。万里归途从此去，华山昆海怅悠悠。”云南学子也依依不舍，挥泪追送至 600 里以外的澜沧江畔，在江边悬崖上镌刻“壁立万仞”四个大字，以作永久纪念。长久以来，滇人传颂：我巩太宗师，可仰止百世，与山水共长矣。

公元 1729 年（雍正七年），巩建丰云南任满回京，朝庭升任他为朝仪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秩正四品，主要掌管撰著记载之事。同年又授任殿试读卷官。显然，巩建丰以其卓著的政绩、凌霜的气

节和忠诚贯日的品德，受到了雍正帝的重用。然而，此时的巩建丰，经历过宦海风涛，走过了天上人间，历尽坎坷，饱经沧桑。如今已淡看世事，惯看秋月，眷眷然有归欤之情。白日里，公务繁冗，人际复杂，加之他患有眼疾，又有痰水之症，身体大不如从前。夜晚里，西北望月，寂寞难耐，痛失长子的忧伤，思念亲人的惆怅，时时缠绕在他的心头，犹如无边的月色，挥之不去。还有雍正帝登基后，皇室昆仲惨遭杀戮，前朝老臣亦多遭贬斥，那些曾经的同僚与故友，有的被罢官抄家，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自己虽幸免厄运，但已无心朝政，无意富贵。京华烟云，遮不住他思乡之情；功名富贵，留不住他归来之心。于是，公元 1732 年（雍正十年），巩建丰以头目眩晕为由，奏请雍正皇帝，请求归田事亲。一日，风和日丽，雍正心情极好，便赐宴乾清宫。席间，雍正帝想体察巩建丰思归之由，便出一字联命巩建丰应对，上联曰:“十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妻子。”巩建丰何等样聪明人，深悟其意，立即起身叩谢曰：“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对仗工整，天衣无逢。雍正帝感其才思敏捷，应对绝妙，言词恳切，当即准奏。这段民间传说，不但展示了巩建丰“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的治学风采，更为世人留下了一段君臣雅对的千古佳话。巩建丰回归里故后的第四年，雍正暴亡，乾隆即位。作为乾隆幼年时的老师，朝廷曾多次请他返京任职，但均被他婉言谢绝。

公元 1732 年（雍正十年），巩建丰退隐江湖，回到伏羌老家。归里后的巩建丰，云淡风清，冰清玉洁。虽然年过六旬，但依然以教学著书为务，以灌园吟诗为乐。在县城，他捐金修文庙，建东西两坊，教授生徒数百人，对那些家境贫寒而有才华的学生，总是想方设法，在生活上给予格外关照，伏羌古城的上空，再一次书香浓浓，书声朗朗。他还常被邀请到秦州书院讲学，远近学者纷纷登门求教，他总是热忱接待，讲经说史，剖析议理，终日不知疲倦。由于他精湛的学问，渊博的学识，独到的方法，桃李遍陇阪，被远近学者奉为“关西师表”。他的门下也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学者，诸如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南辉、胡钺等。

那是一段风烟俱净，云淡风清的日子。渭水之滨，徘徊着他临风赏月的身影；大像山上，徜徉着他吟诗作赋的儒雅。白日里，拄杖壶酒，携三五小童，散步于山田水洼间，“傍午倦来闲散步，柳林深处听鸣禽”；月夜下，戴月荷锄，约二三老农，流连于菜圃瓜田里，“一卧陇山甘退老，不妨学作灌园师”。春日暖阳，碧草幽芳，折柳觅花，听鸟鸣于山林；问山弄水，看日出于六峰。中渠艳赏，紫陌醉眠，书香盈袖，春风满座。夏夜风凉，繁星满天，携二三顽童，嬉戏于渭水之畔；邀三五好友，纳凉于柳湖之滨。风生水起，吟诗作赋，柔风绝俗，此乐何极。秋竹清爽，黄花蘸酒，临流赋诗，白云心事，明月情怀。看大雁南飞，听渭水东流。枕上诗书，门前风景，红枫寄情，斜阳思故。冬日拾柴烧炕，燃炉煮茶，目不释卷，手不停挥，著书立说，高风亮节，杖藜访故人，载月夜归人。梦寒曲冷，卧榻忘忧。

巩建丰虽然走的是一条科举仕途的道路，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生写下了大量水墨流香的诗文。他幼抱高操，一生嗜读，至老不倦。即使卧病在床，稍稍轻，便整冠在床，读书如故。有人劝他稍加歇息，他总是淡淡地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他长期从教、从政，学问博大精深，思想丰富多彩，一生著述甚多。他为文胎息韩柳，雄深雅健。雍正进士、吏部主事、扬州知府尹会一在祝介亭夫子七十寿辰时赞美道：“壁立三朝柱石臣，全从道脉起精神。高文人共推韩柳，稀寿天教颂甫申。”他在政治、教育、社会等方面的独到论述，尤其为人称道，更是经世致用的良言。他了解百姓疾苦，同情劳动人民。他认为做官者应当体恤百姓，礼士爱民，尤当照顾鳏寡孤独，做到轻徭薄赋，政简刑平，赏罚分明，宽猛相济。他说到做到，多年为官生涯表明，他勤政廉洁，节俭躬行，兴贤劝善，德高望重。他说：“当官者以清心寡欲为本，以办事明敏为用，以政简刑平为德，以兴贤助善为功。”他以多年的阅人经历，告知世人“知人”之法：“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亲，以君子守

正不苟合，而小人谀佞以容悦也，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对于民心之重要，他也有精辟的论述：“古之圣贤所以万世不朽，以其担当世道挽回人心也。”“学莫大于治心。”“观人心风俗可以知世道，人尚淳厚俗贵勤俭则世道日趋于盛可知，人习巧俐俗习奢侈则世道日趋于衰可知”等。在教育上，他推崇学以致用，学以修德，提倡“文以载道”。他说：“善学者之于文，不以艰深奇奥为工，而以见理明透为尚。”他强调：“变化气质是教人最切要事，能因其气禀清浊材质刚柔而变化之，则愚可明，弱可强。”“宜尚志立品”、“宜务实力学”、“宜尊师择友”，这些精辟的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崇尚程朱理学，强调做人德行居首。一生勤奋俭朴，谦诚恭行，笃学笃行，意趣淡远。他曾对他的弟子剀切地说：尝爱诸葛武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二语，讽诵不休。及自入庠登朝以迄归田50余年中，虽目击声色货利，纷华靡丽之物，但从不为之所动。虽为皇帝近臣，数掌文柄，但从未以帝宠或尺书通朝士而于故旧。只常守“淡泊宁静”四字，幸不为其所染而庶几免大咎者，以此试与诸生剀切言之。他的为人、为学、为官，人谓“老成持重”、“德才俱美”，堪称一代醇儒、名臣。

他为诗推崇杜甫陶潜，提倡宗经明道。诗风典雅纯正，平实简淡，格律严谨，感情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古典诗坛的一枝奇葩。他的诗题材广泛，辙迹所至，皆有诗作，可以说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反映。他忧国忧民的诗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咏史劝学的诗，借古咏今，语重心长；感怀记事的诗，平易近人，云淡风清；写景抒情诗的气势磅礴，感天动地。他尤其关注下层民众，百姓疾苦，有一种深沉的恤民情怀。“老农何吁叹？叹为难度生。”“聊以充枵腹，朝夕拌菜羹。”这是他在《老农叹》中的一声叹息；“雨涝四弥月，糜谷空秕糠。草根与树皮，食之多肿伤。十村九无烟，道殣遥相望。……无奈虎狼役，鞭朴扼其吭。四路如张网，何处喊冤鸣？”这是他在《乞妇答》中悲悯情怀；“市粮腾贵价难均，眼见饥民颠沛身。一岁叠荒糠作面，十家九空灶生尘。鸠形鹄面尤为鬼，背井离乡欲乞人。闻道开仓施户口，怎能涸鲋想涎津。”这是他在《不寐》时眼前浮现的饥民生活。晚年时他的诗更加空灵厚重，耐人寻味。《雪后即景》一诗：“晓行望碧空，一片玉玲珑。安得心如此，超于万象中。”景色清幽，境界空远，反映了他静谧淡泊的心境。而《消暑》一诗则直接抒发了他老有所为的乐观精神：“细细熏风拂面吹，衫轻人健影相随。漫云七十便颓废，矍铄犹堪戏水湄。”他撰写的对联虽然存世不多，但所撰之联皆清新明快，涵意隽咏。如这副“夏日游宋园会饮题联”：“亭小偏能邀翠入，山遥尽可送青来。”语言简净，意境开阔，历来为人称道。而他给北京甘肃会馆题写的会馆联：“羲轩故里，河岳根源。”因气势磅礴，充分显示了甘肃之要，让人叹为观止，流传至今。他还十分关心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晚年归里后，召集学人弟子，编纂《伏羌县志》12卷，因其体例规范，资料翔实，文笔流畅，200多年来，备受研究地方志者所推崇。他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日省录》《就正篇》《滇南采风集》《巩氏家范》《归田集》《静虚南北览胜》《主一轩小草并清吟》等书，后由弟子李南晖（通渭县人，雍正十三年举人，官至四川威远知县）整理，编为《朱圉山人集》12卷，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刊行。他一生留下的几百篇诗文，或柔美，或铿锵，或朴实，或清新。那些水墨交织的华彩乐章诠释了一位真正文人墨客的千古风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回望巩建丰山高水长的一生，他从西北弹丸之地巩家石滩出发，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国家最高学府翰林院，而后又进入紫禁城，历康、雍、乾三朝，由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乡会试同考官，乡试主考官、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翰林院编修，到提督学政、侍读学士、殿试读卷官。“老成持重”，德才俱美，享誉朝野，仅用十余的时间就把一个西北硕儒高华的人品，定格在了紫禁城。然而，仔细算来，巩建丰大半生的时间却在从事教育活动。未弟时，曾在县城柳湖之滨开馆授徒，传道授业，前后将近20年。入仕后，充雍正侍读和日讲起居住官数年，主持过四川乡试，又在云南视学三年，回京后又为殿试读卷官，

又施教少年乾隆，前后10余年。致仕后，又在伏羌、秦州讲学，受业门人数百，前后又10余年。在长达40余年的教书生涯中，形成了自己颇为深邃的教育思想，最终成为负有盛名的学者和前清陇上著名的教育家。也为地方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他的教育思想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主张学人应一丝不苟继承和实践孔孟之道。他十分推崇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自朱子后斯道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的主张。他说：“学人以诗鸣世，不如以文，文所以载道也。以文鸣世，不如以道，道所以躬行也。”对士子生徒，他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德行居四科之首。”他在云南亲自制定的《滇南课士条约》写道：“一宜敦伦修行，一宜尚志立品，一宜务实力学，一宜尊师择友”，要求诸生“文务醇正，勿伤大雅风规；品尚直方，毋近未俗诡过。”他认为师者的首要任务是使受业者学会做人。使其明辨义利，奉法守礼，读书励志，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养性为根本。为师者如果以学生获取功名利禄为要，那是不足取的。他指出：“今教者以讲书启其聪明，以作文发其心思，虽有英俊子弟，不过侥幸功名而已，未见器材之大成者。”如果士子不辨义利，贪图富贵，纵使有经济文章，亦不能成为栋梁之材。为师者要以义理养其根本，以经史畅其枝干。在进行言教的同时，更应当注意身教。他重视启蒙教育。认为要造就栋梁之材，必须从小抓起，如果孩子在“五、六岁时不教以安祥恭敬，任其轻佻嬉戏，不教以食蔬饭衣朴素，而先顺其欲而导之，欲以养成根器，难矣。”他还指出，朱子《小学编》中的“少年登高科”是一大不幸，不是科名的不幸，而是少年的不幸。因为少年血气未定，涵养未深，一旦荣登高科，势必沾沾自喜而失去远大志向，故以取士为荣身之阶的做法并不可取。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因材施教。认为师者既要对学生一视同仁，又要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多方造就，使其各有所用。他指出：如果“能因气秉清浊，材质刚柔而变化之，则愚可敬，弱可强。”他还说：“圣人之量天地，贤人之量江河湖海，中人以下或沟或洫或浍或川。识有深浅，量有大小，不能强而同也。”也就是说人的素质是有差异的，为师者就应视其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他认为学与问是做学问的两个重要方面。他说：“学问者学于己问于人也。”学问并非是简单的记诵，而关键在于穷其理。故“善学者之于文，不以艰深奇奥为工，而以见理明透为尚。”问必须做到“审问之”。他举例说，“樊迟两问仁，知犹未了然于心，乃见子夏质问焉。可见古人问一端必反覆推酌到底而后已。”他主张读书学习要静心潜修，循序渐进。他告诫生童：“欲向上达，先戒下流。”“勿浪饮酒，勿乐佚游。”鼓励他们“苦中得甘”，“达材可以升堂”。他在《劝学诗》中写道：“学道原从笃志求，莫道世味扰潜修。经书尽有无穷味，童子不帷目不游。”他还说：“古人有言能咬菜根则百事可做，非谓专咬菜根，盖言能受苦者也。”学习上应该有咬菜根的精神。学习乃逆水行舟，“学问不日进则日退”，因此，要不断进取，因循萎靡是做学问的大敌。他曾描述自己晚年的读书生活：“泊归后，每于暇中焚香展书，凝神静虑，求古贤所得力处，然后始悟。”

公元1748年（乾隆十三年），巩建丰卒于家中，享年75岁。次年安葬于县城西南旗鼓山祖茔。他病逝后，其门生旧友、乡里父老子弟“莫不走哭陨涕”，吊客过其庐有深痛之若父母者。

巩建丰育有三子，长子巩敬辑，雍正元年举人，随父视学云南时，病殁于昆明。次子巩敬绪，乾隆戊午科举人，历任河南林县、封丘、新安、渑池，陕西中部、宜君、洛川等8县知县，人称一代能臣，归里后，又为家乡办了许多好事实事，深受百姓爱戴，后入祀伏羌乡贤祠。三子巩敬授，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生员。

1989年，为纪念这位陇上著名的学者，家乡巩家石滩村民集资数万元，在村中修建了“巩建丰纪念馆”。纪念馆为两层土木结构楼阁，雕梁画栋，起脊瓦兽，四门八窗，古色古香。 馆名为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题写。馆内还悬有当代著名学者霍松林等名人题写的匾额数面。

（作者：甘肃省甘谷县扶贫办干部）

甘肃近代十大名中医

石战涛

中医药学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医药学也是唯一完整保存着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全部要素的民族医学，是世界医学史上传承至今仍生生不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极其少数的医学文明之一。中医药的存在和传承，本身已被视为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正成为当前国内外现代科技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在甘肃历史上，出涌现出了许多为世人所敬仰的优秀中医，经笔者整理，比较有名的有以下几位。

1. 慕元春，字善卿，生于清·乾隆盛时，同治二年冬卒，年八十余，镇原县南乡平泉镇人。元春精歧黄术，其医病以养生为本，服药次之。著有《养生论》。

2. 秦霖熙，字瑞泉，号春帆，甘肃皋兰人。霖熙素善岐黄，精于别白。在京二十余年，公务之暇，行医活人。其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无论贫富老幼，均一视同仁，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医著有《外感辨证录》二卷、《小儿惊风治验录》一卷。

3. 杨建春（1825—1889），字逢春，号普青，清光绪庠生，原籍江西鄱阳县，至建春辈始居于甘肃庆阳府（今合水、庆城），世代行医。建春医德高尚，医术至精，救死扶伤，在当地颇有盛誉，集行医经验，搜集单验方5453个，编著《一百七十五证方》两卷，约十八万字。其孙朝卿遗有《临证验方集》手稿一卷。

4. 丁彦龙（1841—1901），回族，原籍陕西凤翔，后迁居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世代行医。彦龙自幼随父习医，后入药店学徒，钻研医道。1871年自创“保盛堂”中药铺，闻名遐迩。自制“避挹疫散”“清瘟散”等，曾有效控制时疫流行。其二代炳义、炳乾、炳文，著书《圣点脉诀》（俗称“佛点头”）。

5. 王继志（1868—1926），字士先，号雪山主人，靖远县大庙堡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恩科举人，任《秦风报》主编、《陕西通志》总纂。晚年精医，撰成《经证证药录》十二集16卷，共40余万字，证药172味。

6. 王仁山（1892—1972），原名王得寿，甘肃武威城关镇人。仁山自幼酷爱中医，对伤寒脉法颇有研究。被当时同行称为“伤寒医家王八爷”，其临证经验被武威1958年的《验方汇编》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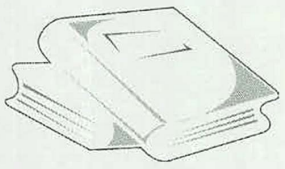
7. 岳毓兰，清末，生平未详，金县（今甘肃榆中县一带）人，精于医学。著有《岳毓兰验良方》一卷、《医方百科录》一卷、《外方歌括》一卷。

8. 葛正儒，字青云，清末，鼎新县（现甘肃金塔县）新西人，清代文庠生（秀才）。正儒精医理，善太素脉。内伤外感，无不手到病除。而又善治时疫、白喉及虚火。手著《产后经验良方》《男女杂证要略》等书，惜未刊行。

9. 张鼎成，字丹陵，清，生平事迹不详。精医学，所著有《验方》数十则，抄行于世。其父张照南，咸丰三年进士，成就后学甚众。

10. 甘惠廷（1900—1979），原名甘维哲，学名甘希先，字惠廷，甘肃皋兰县人，世医出身。曾参与筹建甘肃省中医院、兰州市中医院等。中华医学会第一批会员，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行医五十余年，活人无数。善治伤寒、脾胃、妇科等疑难诸病。一生独创数十特效医方，如治疗外感伤寒的“灵宝汤”“三清汤”“柴豉汤”“苏防杏仁汤”，调经的“加味逍遥汤”“加味少腹逐瘀汤”“荆炭柴胡汤”“柴胡桂枝鳖甲汤”，安胎的“苏梗归身汤”等等，素有“甘氏一贴药”“平民医生”之美誉。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主任科员）



试谈“篇”与“编”的含义及在志书编纂中的运用

张正龙

凡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同仁，几乎经常和“篇”、“编”二字相接触、打交道。从最初拟定志书篇目、探讨志书的编章结构，到后来的编志、读志过程中，不时会发现一些新编志书在第一层次（亦称门类）的称谓上不尽相同，既有称“篇”的，也有称“编”的，还有称“卷”的。总起来看，称“篇”或“编”者居多，称“卷”者相对较少。在开始遇到这些情况时，对“篇”、“ 编”二字的字义及其用法虽然产生过疑虑，但后来由于司空见惯，加之亦未见到有关方志刊物上对此事议论的文章，同时，也以为“篇”、“ 编”之差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就未予注意。

再次引起笔者对“篇”、“ 编”二字的注意，想对这两个字的字义及其用法进行探讨，并决心搞个清楚明白的近因，是在拜读了一部市志之后，因为该志在其第二十篇第一章的第六至八节中，在记述当地交通警察、武装警察和消防队的有关编制、改编、扩编情况时，前后共有10处之多，无一处不是写成“篇制”、“改篇”和“扩篇”。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不禁疑虑重起：难道说“篇”、“编”二字的字义真的相同，可以通用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下功夫查阅了身边能够见到的《辞海》（三卷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源》（四卷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版）。为便于对照、分析起见，现将各书对“篇”、“编”二字的注释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辞海》中对“篇”字的注释共三条，其二是：“成部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说文解字·叙》：‘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见该书第4329页）。对“编”字的注释共四条，其一是：“古时用以穿联竹简的皮条或绳子。《史记·孔子世家》：‘读《易》，韦编三绝。’后因以称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如：人手一编；上编。韩愈《符读书城南》诗：‘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见该书第2719页）。

《辞源》中对“篇”字的注释是：“竹简，古时文字皆著之篇。后因称首尾完整的文字为篇。如《论语》二十篇，一篇犹一卷；《诗》三百篇，一篇犹一首。后来文字书于帛，故称，《汉书·艺文志》、《易》皆称篇，《诗》皆言卷，其余一类之中，或篇或卷不一”（见该书第2365页）。对“编”字的注释共三条，其一是：“串联竹简的皮筋或绳子，《汉书》八八《儒林传》：‘（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注：‘编，所以联次简也。’后代谓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叫编。如上编、下编”（见该书第2450页）。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篇”字的注释共三条，其一是：“首尾完整的文章：篇章|《荀子·劝学篇》”（见该书第1042页）。对“编”字的注释共九条，其六是：“成本的书（常用于书名）：正编｜续编｜人手一编|《故事新编》。”其七是：“书籍按内容划分的单位，大于‘章’：上编｜中编｜下编｜”（见该书第80页）。

下面笔者就个人管见，先谈其注释的相同之处及其差异所在；再论其所注释的得失；最后就二字的字义及其在使用上的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

一、三部工具书对“篇”、“编”二字所下定义的同、异。对“篇”字的注释，《辞源》说：“称首尾

完整的文字为篇。”《现代汉语词典》称“篇”是“首尾完整的文章”。两者基本一致，差异之处在于“文字”与“文章”一词而已。而《辞海》则称“篇”为“成部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辞源》与《现代汉语词典》二书的注释有较大的差异。对于“编”的注释。《辞海》称“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这倒与其对“篇”的注释有部分近似之处。《辞源》谓“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现代汉语词典》则说是：“书籍按内容划分的单位，大于‘章’”。笔者管见，《辞海》与《辞源》完全相同；《现代汉语词典》则有另说。

二、三部工具书对“篇”、“编”二字注释的得失。《辞海》与《辞源》对二字的注释，虽然引经据典，书卷气很浓，却不够爽快、准确，也缺乏时代精神；而《现代汉语词典》对二字的注释，确言简意明，一矢中的，并有较强的时代感。

三、对“篇”、“编”二字的字义，及其在使用上的意见与建议，综合三部工具书对二字字义的注释，笔者以为，从文字工作，特别是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角度来讲，“篇”字的字义就是指“首尾完整的文章”。如果引伸一步来讲，不仅是“首尾完整的文章”，而且是能够独立存在的文章。如若需要举例说明的话，那么一篇论文、一篇短篇小说、一篇散文都是。当然，如果用一本论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集作例子。《辞海》对“篇”字的注释也是对的。而“编”字的字义，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即是“书籍”按内容划分的单位，大于“章”。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它不仅是“书籍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与书籍中的其它部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成部著作中一个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笔者管见，“篇”、“编”二字是不能通用的，尤是在新编志书中是不能通用的。新编志书中的第一层次（即门类）称为“篇”，既是不准确的，也是不恰当的，应该用“编”为好。此议不仅适用于本届修志，也适用于续志编修。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2016年9月5日，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主办，西北师范大学承办，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协办。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委会主任夏红民为会议发来书面致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冀祥德出席会议并讲话，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出席会议并致辞。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军利、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田澍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刘玉宏主持。

夏红民在书面致辞中介绍了甘肃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地方志工作情况。他指出，甘肃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事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这些政策规定的出台，使全省地方志事业进入了依法治志、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为全省地方志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甘肃省地方史志工作按照“三级志书为主体，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信息化平台为依托，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思路，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已全面形成；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二轮修志进展顺利，年鉴编辑全面展开，编修成果不断丰富；基础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建成地情资料库（方志馆）27个，地方志网站40个。总之，全省地方志工作基础条件建设、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有了很大提高，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社会能力不断提升。

冀祥德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受李培林会长委托，对甘肃省委、省政府对会议的支持，以及西北（转第30页）

县级综合年鉴编纂“三要三不要”

陈平军

摘　要：县级综合年鉴编纂内容选择要全面而广泛，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社会的真实现状，把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素材收录进来，要坚守入鉴标准，收录标准一定只能限于县委、政府各部门以及各镇大致概况；叙述主体要有地方特色，重点要选择有地方特色的政治事件、产业发展、经济特色来组织材料，在框架设置、内容取舍，都要突出发展中的县域地方特色，不要写成县委、政府的功劳簿，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地情现实的资料书，才有可读性；语言要准确而简练，避免编成流水账。

关键词：县级综合年鉴　内容全面　地方特色　语言

在全国范围内的二轮修志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所有修志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虽然二轮修志的时间断限离我们的现实不是太久远，但是资料的匮乏依然是困扰编纂者的基本难题，有的省市县较早的启动本行政区域综合年鉴编辑的就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由此可见，编辑综合年鉴是多么的重要。为此，我们陕西省紫阳县在二轮修志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编辑年鉴的重要性，在编纂二轮县志的同时，启动《紫阳年鉴》编辑工作，为三轮修志储备、保存资料，力主使我县的地方志事业科学可持续性发展。

我们在年鉴编辑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带有共性的问题，通过学习中指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和有关年鉴编写的学术论文，吸收有益的观点，学习比较优秀的年鉴成果，通过比较，再结合本县实际，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解决难题的方法，现综述于此，相信多少会对年鉴编纂者有一点裨益。

县级综合年鉴内容要全面而广泛

县级年鉴所叙述的主体是县级地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这就要求内容要广泛，政府工作收录，部门工作要收录，统计资料要收录，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现在的综合年鉴几乎成为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资料汇编，内容显得很单一，读者面很窄，除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选择性的浏览一下之外，几乎没有多少社会上的读者群，这样就削弱了年鉴的功能。

为何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我认为还是编辑者的视角问题，眼光比较窄，编辑者不妨把年鉴的收录内容和范围扩大，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用敏锐的眼光去发现社会的真实现状，把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素材收录进来，比如：人民的生活水平变化，思想观念的转变，消费方式的变化，购物方式的改变，民风民俗的变化等等，这些与每一个人都相关联内容多涉及，这类素材可以采用专辑、专记、附录的形式载入，还可以把本年度的有影响的社会热点事件、优秀文艺作品等收录进来，扩大阅读面，相信阅读年鉴的人会逐渐增多。

县级年鉴内容要全面，但又要做到手不能伸得太长，不要啥都收，收录标准一定只能限于县委、政府各部门以及各镇大致概况，不能再细了，我们在编辑《紫阳年鉴2014卷》过程中，就有编辑提出要将每个乡镇的中心学校、卫生院的概况专章专节介绍，美其名曰扩大年鉴的影响面，这就属于手伸的有点

长，甚至连资料都已经收集到差不多了，我就提出来，如果收录了乡镇学校、卫生院，那么司法所、法庭、计生站、派出所等机构是不是都应该收录，这样就麻烦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放弃了这个所谓的不坚守收录标准和原则的创新行为，确保了年鉴的权威性。

县级综合年鉴主题要有地方特色

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线，当仁不让的是年鉴的叙述主体，重点要选择有地方特色的政治事件、产业发展、经济特色来组织材料，在框架设置、内容取舍，都要突出发展中的县域地方特色。紫阳县服务群众“五个一”工作法获得中省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赞誉，并获得社会各界好评，一时间迎来很多县市单位来我县学习取经，为此我们在《紫阳年鉴2014卷》设立“特记”收入人民网新闻《紫阳县推行“五个一”机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安康市委组织部调研组调研报告《紫阳8年凝练“五个一”工作法》、紫阳县政府网新闻《紫阳干部选任机制喜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提名奖》，集中展现“五个一”工作机制，为社会各界了解“五个一”工作法提供了一个窗口。

紫阳县是贡茶之乡，茶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县委县政府也是把茶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来抓，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也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主管产业的茶叶局更是不遗余力扶持茶产业，极大的激励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叶产量和紫阳富硒茶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为此我们专门在农业编目里设茶叶章节进行专门介绍，在挖掘有关茶产业的详细信息基础上，还设了“紫阳富硒茶备忘录”、“紫阳富硒茶发展大事记”等专记，记载有关紫阳富硒茶的生产、茶叶技术培训、茶叶参展获奖的一些详细信息，全方位的记录茶产业的现状。

针对以上两个主要的记述信息例证是不是就这样记述就可以了呢？我以为还不够，这类素材是年鉴记载的重头戏，但是如果只记载到此，那么就很容易把年鉴编成党委政府施政的功劳簿。这些信息不仅要在各个部门设条目记述，我认为还要记载老百姓对“五个一”工作法受益情况，对这个工作法态度、看法，党员干部履行“五个一”工作法的有关反思等有关信息。对茶产业不仅要记述政府行为也要记载茶农经济收益现状，茶叶销售状况，对产茶大户也有必要适当介绍。这样，年鉴才不会沦为党委政府的功劳簿，而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地情现实的资料书，才有可读性。

县级综合年鉴语言要准确而简练

年鉴素材大部分来自于各单位的年终总结，有的年鉴资料提供人员把总结掐头去尾，把总结的小标题作为条目，交给年鉴编辑部应付差事，成为了各部门年鉴资料来源的主要方式，如何避免这些客观因素制约年鉴的整体质量，我认为，年鉴编辑者要在语言的锤炼上下功夫。

首先，在条目的编辑上，去除修饰语，抓住主体核心词语，编制能体现重点的小标题，条目要简洁，没有副词、形容词在条目中出现，语句不宜过长，一般在四字、六字，最好不要出现十字以上的语句作为条目。

其次，在内容的编辑上，要去除总结痕迹，什么以“------”为主导思想，上级部门的指导、支持，以什么为抓手，以啥为重点，之类的语言尽量不要出现，直接叙述事情的主体，做了啥事，有啥样的效果就可以了。也就是直接揭示主题，不要拐弯抹角，这样才能达到语言准确而简练。

再次，不要以数据的堆砌来代替主题内容，数据是体现一个部门工作成效的有力武器，这个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能以数据代替工作。要有主要措施和做法，这才是产生这些数据根本原因。

还有，有的年鉴资料呈现一个单位的主要工作，采用一、二、三、四等列举，罗列的项目很多，看似条理清晰，实则为流水账，这就要求年鉴编纂者要有一定的综合能力，可以采取合并同类项，精炼

志鉴中行政区划图审图号的办理程序

滕 辉

冠以行政区划名的官修志书及年鉴，本级行政区划图是必不可少的资料性文献。什么样的行政区划图才能在公开出版物上使用，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只有经过国家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取得审图号后，方可在公开出版的志鉴中使用。所以，地方志系统必须清楚国家相关规定，才能依法行事。

一是了解国家实行的地图审核制度

2015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地图管理条例》（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对所有出版物使用地图做了明确的规定。

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地图审核制度。向社会公开的地图，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但是，景区图、街区图、地铁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除外。"

第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图的审核：

（一）全国地图以及主要表现地为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地图。（以下略）"

第二十二条规定："经审核批准的地图，应当在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的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其中，属于出版物的，应当在版权页标注审图号。"

二是取得合法的、可以公开出版的本行政区划图的使用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2002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5号公布，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基础测绘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基础测绘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第136次会议通过，2006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69号令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语言，提炼一些精准的条目来概括这些主要工作，避免流水账。

最后，时间要搞准确不能有：目前、当前、近几年、这段时间等模糊时间概念，要与资料提供者多沟通，把这些反映具体事务的时间核查准确，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考察的机会，为第三轮修志留下准确的素材，奠定扎实的资料基础。

（作者：陕西省紫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民政府负责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以下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测绘成果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成果工作。”

《地图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行政部门（以下称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地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地图工作。”

在我国，行政区划地图只有本区划的地方人民政府才有权组织测绘。一般由民政部门负责对边界和行政区划审核工作。经地方人民政府授权后，有地图测绘资质的部门方可测绘行政区划图。未经地方人民政府授权，任何部门（无论是否有测绘资质）均不得擅自测绘行政区划图。经过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测绘的行政区划图的所有权应该归授权的人民政府。

作为使用地图的各级地方志办公室须找到所要使用的且必须是由有地图测绘资质的单位测绘的行政区划图的著作权所有者，协商地图使用的相关事宜。如：是否可以无偿使用？或者是有偿使用？

三是确定负责本行政区划图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地图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一）世界性和全国性地图（含历史地图）；

（二）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图；

（三）涉及国界线的省区地图；

（四）涉及两个以上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图；

（五）全国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中小学教学地图；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地图；

（七）引进的境外地图；

（八）世界性和全国性示意地图。

第五条　下列地图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一）涉及国界线的省级行政区域地图；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地图（不涉及国界线）；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中小学教学地图；

（四）世界性和全国性示意地图。

第六条　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图。

第七条　下列地图无明确的审核标准和依据时，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商外交部进行相应地图内容审查：

（一）历史地图；

（二）世界性地图；

（三）时事宣传地图；

（四）其他需要商外交部审查的地图。”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纂的志书和年鉴中需要使用本级行政区划图时，要按照上述规定，向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递交地图审核申请，同时附上志鉴中所要使用的本级行政区划图。

四是申办地图审核批准书

地方志办公室在签订志鉴出版合同时，如果载有行政区划图，就必须按照要求向出版社提供本行政区划所在的省市区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甘肃省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是甘肃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的准予在志鉴中使用行政区划图的审批函。

目前，全国各省市区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也不尽相同，国家对于地图审核批准书的式样未做统一规定。近期从宁县志办、安宁志办办理志鉴中使用的行政区划图审图号的过程，以及我从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室了解的情况及网上所查资料得知，目前，我省志鉴使用行政区划图办理审图号的具体程序是：

委托拥有本政区行政区划图且具有地图编制资质的部门（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与甘肃省基

础地理信息中心签订志鉴插图使用合作协议书→ 由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出具地图审图号的申办材料并到甘肃省政务大厅代办审批手续 →20 个工作日内获得地图审核批准书→交付地方志部门。

（注：办理审图号是免费的，法定期限是 20 个工作日，承诺期限是 10 个工作日内就可办理完毕。）

地方志办公室取得审图号后，将甘肃省地理测绘信息局行政许可函复印件加盖地方志办公室的公章并注明“复印件与原件无误”后，作为志鉴审核必须提供的内容与志鉴稿一并提交出给版社。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主任科员）

（接第 25 页）师范大学的共同承办和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协办表示感谢，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然后介绍了本次会议主题的重要性及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志工作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从依政修志到依法修志，再到如今的依法治志，体现了地方志工作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服务社会，发挥地方志资治辅政的作用。他还指出，这次学术年会是与高校的首次合作，是一种新的尝试，为推动方志学学科建设、方志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地，今后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与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还将开展深度合作。

冀祥德指出，方志学与其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样，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地方志学者也要有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下一步工作，他提出几点要求：第一，在“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第二，要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方志文化影响力，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地方志的独特作用。第三，地方志学术研究要为志鉴编纂实践服务，积极利用现有研究成果指导地方志、年鉴的编纂和利用。第四，地方志学术研究要开拓视野，提升水平，加强与学术界和海内外相关机构的广泛交流。利用好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搭建的交流平台，让学术界更加了解我们的新方志工作，也让方志界在与学术界的交流中真正把握住地方志工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西北师范大学的基本情况。他指出，西北师范大学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基础，尤其在西北少数民族教育、敦煌学、简牍学、西北史地、西北民族宗教与文化、陇右地方文献、西北方言研究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学校连续主办的“历史与展望：中西交通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黄金段：甘肃丝绸之路文化高层论坛”等，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影响。作为“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之一，西北师范大学将发挥学校教学、科研的优势，整合共享校内外各种资源，从人文沟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入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本届学术年会采取以文与会的方式，分大会学术交流和分组讨论进行。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漆永祥，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上海地方史志学会会长、教授朱敏彦，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卫，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北京志》副主编王铁鹏，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处长张占社作大会交流。在分组讨论环节，共有 60 余位作者发言，并有 60 余位专家对文章作点评。会议研讨围绕“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方志编纂、“一带一路”视野下方志文献价值的再评价、方志文献所见“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一带一路”方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志文献与“一带一路”区域文化研究、方志文化与社会变迁、地方志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地方志工作模式创新研究等论题展开。

来自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 110 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科研处 彭川供稿）

谷苞社会调查工作对地方志编纂的示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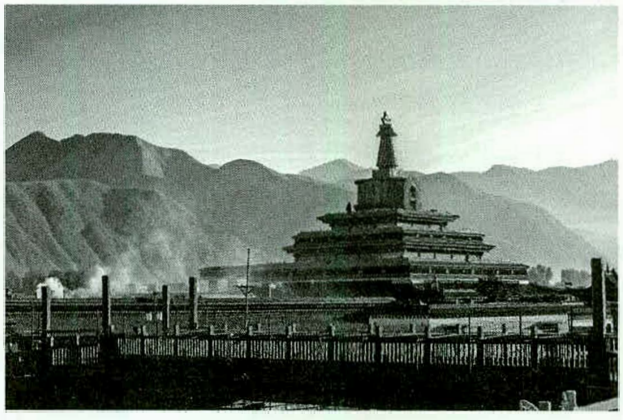
邓 明

谷苞（1916年-201 2年），兰州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曾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新疆史学会会长、中亚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离休后曾任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兰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学术顾问。

20世纪30年代，谷苞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曾两次到云南省呈贡县化城镇作社会调查，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书稿。1944年回到兰州，在兰州大学教授民族学、社会学，并带领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完成的五篇调查报告是：1947年，赴甘南藏区调查完成《卓尼藏区的土司制度》、《卓尼藏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1948年在甘肃山丹、秦安和会宁的三个自然村进行社会调查，完成《河西——农民的地狱》、《河西农村的崩溃》和《甘肃省会宁县农家经济概述》（以下简称《会宁农家经济概况》），为社会调查提供了范本，至今仍为编史修志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读物。

下面即以《卓尼藏区的土司制度》等调查报告为例，学习谷苞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技术。1947年调查后所写的《卓尼藏区的土司制度》，于次年发表在兰州《西北论坛》上，这是最早应用社会学、民族学学说，科学调查甘肃藏族土司制度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具有开拓性、补空白的意义。全文分四个部分，分别介绍卓尼土司制度的沿革、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兵马制度，最后是结语。着重阐明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卓尼藏族土司制度的组织体系后兵马制度。土司制度起源于元朝，兴盛于明清，西北的土司于民国时“改土归流”。据清光绪兰州进士张国常《土司蕃族考》，清光绪间今甘青地区共有西宁、碾伯、大通、洮州等十九家土司，其中卓尼土司颇具特色，《洮州志》载：这里的藏族“颇染汉风，其俗务稼穑，习工作，事畜牧，高楼暖炕，皆与汉无异。”但对于其制度及内部的情况则语焉不详。谷苞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约3.5万平方公里的卓尼辖境，按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分布着四个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地区：洮河以北的藏民以畜牧为主，略事农业；洮河干流以及支流沿岸的藏民，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及伐木；白龙江上游叠部地区的藏民，以农业为主，兼事狩猎；插崮岭群山中的黑番地区的藏民，以农业为主。并且这四个地区的藏民不但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服饰及风俗习惯亦有差异，特别是黑番地区的藏民与其他三个地区的藏民，彼此间就连语言也难沟通。

关于卓尼藏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只有旗与“丈尕”两种系统，前者是对普通藏民在编制上的划分，后者则是对于具有统治势力的藏民在制度上的划分。“丈尕”分为“十二丈尕”、“外四丈尕”两种，这是根据居住地区分的，前者聚居在卓尼城区，后者分居于城



区临近的十个村落。每个“丈尕”由其属民推选一个年高德重者为小头目，要报知土司。小头目随时供土司差遣，同时还有对于土司的一切设施的建议权。属于“丈尕”的藏民，与属于旗的藏民，在权力与义务上均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丈尕”是个有统治权力的组织。杨土司属下号称有四十八旗，经谷苞实地逐一调查，以大旗的旗名计算，共有四十七个，从实有旗长的数目计算，只有二十二个，实际上只有二十三个旗，这就订正了《洮州厅志》的错讹。

谷苞经过调查，认为兵马制度是土司制度的基础，因为它既是土司制度的武装组织，又是经济基础。对内受清廷征调，协同清军作战；对内可以惩办抗命的集团；又靠经济的力量，维持着统治机构的运行。兵马制度立足于杨土司境内的土地上，分为四类：兵马田—是中原王朝赐给土司的封地，土司只有土地管理权，长期使用权则属于持有尕书的兵马田户；衙门田，管理权属于土司，租于藏民；章珠田，属于喇嘛寺院；丈尕田属于旗长等贵族管理。上述四种田地中，兵马田的数量最多，管理权在杨土司手中，耕种者有向土司支兵马、当乌拉、纳钱粮的义务。这是支撑土司制度的三大柱石，支兵马是武力基础，纳钱粮是经济基础。

三四十年代的学者认为卓尼土司辖区和拉卜楞寺辖区，都是政教合一的地方，谷苞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是正确的，同时他发现两地的不同之处：卓尼土司的政教合一中，政权处于第一的位置，宗教处于第二的位置；拉卜楞的政教合一，则是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的宗教权处于第一的位置，受寺院控制的土司的政治权力，则处于第二第位置。这就既看到两地之间的共同性，又看到两地之间的差异性，就对事物有了一个全面正确的看法。

这对我们编修地方史志的人员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无论在调查地情，还是搜集整理资料，或者撰写志稿时，都要全面调查，既要注意事物的共同性，还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以求对该事物有一个全面而正确判断和记述，以还历史的真面貌。

如果《卓尼藏区的土司制度》一文是面上的一篇调查报告，那么《卓尼藏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一文则是关于这个面上的一个点的调查报告。卓尼藏区的朱扎七旗是一个特大的旗，其辖地在洮河主流及支流两岸，长达70公里，较大村落有65个，居住1000户左右的人家，还有耕种兵马田地的800户、住尕房子的汉民200户。

谷苞调查了朱扎七旗形成历史：清初，堪舆者说，离城15里的加当村为风水宝地，将出伟人，若不徙去，将对土司不利。杨土司轻信此说，令村民拆毁旧宅，迁往下游另建新村。部分村民遵命迁徙，另一部分以朱扎七旗代表名义，赴北京告状，奔波13年，打赢官司。清廷给代表之一授予大总承的职位，规定每年由其征收朱扎七旗村民钱粮，再汇缴土司。

从此，朱扎七旗形成一个特殊集团，与其它各旗有很大的区别。朱扎七旗的首长为大总承，杨土司亦派旗长一人，专司土司与大总承之间传达的责任，不能直接办理旗内的公务。全旗分为9个小旗，每个小旗设小总承一人。每个小旗又分为2个总管区，每个总管区有总管2人，内中亦有无总管者2小旗。总管区下为村，每村各有扎督一二人至三四人。这样一个貌似杨土司属下的朱扎七旗，实际上仗着清廷予以的某些特权，常常跟杨土司分庭抗礼，冲突、争夺不断，尽管甘肃巡抚、洮州厅先后颁布了6张告示，规劝两者停止争执，但是清廷还是坐收分而治之之利，却苦了藏民。

朱扎七旗的公务，分为义务行政三种：即征钱粮、征兵马、征乌拉；自治行政两种：即防备盗匪、调解诉讼。

同时，谷苞还发现通过选举、轮流，产生朱扎七旗的大总承、总管与扎督。卸任的大总承，将各种文件尕书、常爷（常遇春，为朱扎七旗公共供奉之神）神像，移交给新的大总承。这表明了洮岷一带藏民自明初以来对于中原政权的认同。众所周知，土司是世袭的，谷苞则发现土司制度里，大头目、旗长与总管的产生，则参用选举与轮流两种办法，而头人的产生则根据各村居民的轮流。这种细微的差异，正是得力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所强调的“缩小距离”和

“参与观察”原则，即在调查之初，调查者就要注意缩小与被调查者之间情感和文化上的距离，要参与到被调查者的社区和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进行较长时间的直接观察。这对于我们史志工作者进行社会调查，具有指南和示范的作用。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大部民族学家迁徙到西部，为了建设抗战大后方，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丰富多样性，并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边政学，即民族学与边疆政治相结合的学科，以研究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边政。谷苞上述两篇调查报告，正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高潮时期的力作，对于该学科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保存了珍贵资料。

《河西——农民的地狱》一文写于1948年9月2日，这时离河西解放不足一年的时间。谷苞一行5人，在山丹调查农家经济。山丹是河西比较富裕的县份，他们先选了一个比较富裕的村落，居住着130户人家，然而在农历五月青黄不接之际，能吃饱的人家只有十一二户，大多数人家只能用少许谷物和大量野草维持生命。这个村由于多少有些谷物，未像别村大量饿死人，冬天还能穿破褐衣或毡衣御寒，这就是这个村比较富裕的所在吧？到了最坏的地步，也就是食粮颗粒无存，又告贷无门时，只能忍痛出卖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多被自新疆入关，宦囊颇丰的卸职官员买去做使女。

这一切均根植于一个“穷”字，那么“穷”又是如何造成的？除政局的动荡、水利的失修等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利贷的猖獗，“靠了高利贷，在90%以上的农民的困穷上，建筑起了不到10%地主、富农等富裕”（《民族研究文选三》页314《河西—农民的地狱》）。高利贷运作的情况是怎样的？谷苞经过调查，发现高利贷大致有五种形式：一为借粮，二为支粮，三为支工，四为合种，五为剪毛，并逐一予以解释。例如支粮，在青黄不接时，富农用极低的代价预购贫农的秋收。五月间，1老斗（约3市斗）小麦的市价为300万元，而支粮的价格却为70万元。这就是说，此时贫农用富农的70万元，从富农处仅能购到2升小麦，秋后要还富农小麦1斗，利息是原来的4倍。高利贷是大多数农民填不满的黑洞，还不完的债，制造了人世间无尽无止的痛苦，谷苞深为同情，不禁喊出：“河西——农民的地狱！”

《河西农村的崩溃》一文写于1948年。当时河西一共有16个县局（设置局），人口约96万，它们程度不同地处于衰落和穷苦之中，正在走向崩溃的道路。谷苞用选样调查的方法，在山丹县奇寨村进行调查。这个村落1919年以前有200来户人家，经谷苞一行挨户挨家调查，只剩70户，短短的30年，2/3的人家做了逃亡绝户，留下的只有1/3。村中到处都是逃亡者遗留的残败堡子，逃亡绝户的共有88户，其中76户死绝了，只有12户逃外谋生去了。

逃亡的原因是穷。兵匪的骚扰，衙门、土豪劣绅的捐派，与高利贷的盘剥，是造成农民穷的根源。从80多个个案的分析中，谷苞发现了一些规律。一个中等以上的农家，走向崩溃的第一步是出卖牲畜。这是因为卖了牛，就无法耕作；卖了羊，则无肥料和副业收入，还要负担各种捐税，导致收支失衡，为了生存，只好去举高利贷。一举高利贷，就步入崩溃的第二步。紧接着踏上崩溃第第三步，只能拆卖房屋木材。这时，农家只好背井离乡，走向逃亡绝户的道路。奇寨村的崩溃就是河西崩溃的缩影。

同时，谷苞还调查了这里的农家既然已到无吃无住的地步，为何不典押出卖田地以救急的原因。这是因为，河西的田地无人敢购买，谁购置了田地，谁就要承担各种苛杂负担，不但让你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倒赔。

这两篇调查报告均写于1948年，先后发表在北平市的《新路》杂志上，均在解放区的电台上广播过，当时影响很大。

在十年九旱的甘肃大地上，河西地区有灌溉设施，能够保持旱涝保收，政治清明时期，农家能够维持吃饱穿暖是不成问题的。然而，20世纪的前30年，河西地区农村崩溃，成了农民的地狱，

《甘肃省会宁县农家经济概述》一文写于1938年12月14日。全文分绪论、农村与农家、耕地、租佃

与借贷、土地经营、农家生活6个部分，穿插10个各项调查表，全面阐述了会宁县的农家经济。谷苞采用的是代表选样法，即选择一个典型的县份，即陇东的干旱纯农业县份——会宁县，先充分阅读有关会宁县的文献，访问熟悉会宁县情况的有关人士，在全面了解会宁县的概貌的基础上，然后选定几个村落，作为此县的代表选样村落，进而入村实地调查。入村后，头两三天，向村民说明来意，使其明白调查的用意，而不致引起惶恐。安民告示完成后，即可一户不漏地挨户访问。白天按调查表所诸项访问，夜间审查并更正所填的调查表，并开会讨论当天所发现的问题。待整个村落访问工作做完后，再花三数天功夫，分别向不同身份与见解的当地人士，了解全村公共性质事项。这项工作完成后，即可进入另一个选样村落调查。谷苞在此强调，要面对访问时的一个难题：即被访问的农家，特别是那些富有资产者，由于对捐税的恐惧，常常采用“瞒产”的方法进行搪塞，即把自己的人口、田亩、牲畜与收益等以多报少。并提供了解决难题的办法：对于每一张表格的填写，并不完全根据各该户的答案，还要多次访问其邻居与利害不同者，以修正虚报事项，达到所得资料大体上与实情颇为接近的程度。

谷苞选定会宁县韩家集，调查了30个村落，142户人家。之所以选中韩家集，还要从会宁县的地理气候说起。会宁县境南北长东西窄，呈长方形，因此降水南乡多于北乡，南乡能够种植小麦、玉麦等8种作物，且收成比北乡高，人口自然稠密。而北乡只能种植小麦等3种作物，常遭亢旱，收成不保，人口当然稀疏。而韩家集正处于会宁县南乡与北乡的过渡地带，兼有南北特性，颇具会宁县的代表性。这对于我们史志工作者来说是值得注意的，开展调查，首先要选好典型的调查处所，这是至关重要的。选对了点，事半功倍，调查所得资料才有典型性。

谷苞重调查了韩家集的人口、家庭、耕地、农作物、地权分配、租赁、借贷、土地经营和农家生活等事项。韩家集位于一个南北长20多里、宽1里多的川道里，两侧山面上是层层梯田，五六十个村落稀稀拉拉分布在山脚下。谷苞调查了30个村落，才有142户人家，平均每个村落仅有4.7户人家。村落这样分散，说明生产力低下，经营粗放，广种薄收。农家散居虽然便于就地耕作，但在安全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随时都会遭受土匪的袭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就打筑堡子用以自保。会宁等县到处可见的堡子就是这种情形下的产物。这告诉我们，某地的居住生态环境与历史、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

调查了韩家集142户农家，其中4户杂户无土地，亦不务农，靠小贩或行医为生。18户地主，有6户自己不种地。真正种地的只有132户。而这132户农家，以其有无土地分为两类：自己拥有全部或部分土地的，有地主、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共101户；自己无丝毫土地的，为佃农、农工，共31户。经过计量调查，看出：佃农每户平均租进的亩数比自耕农高，原因是自耕农无土地；半自耕农和佃农能租进川地者极少，这是因为川地的生产力较高，地主不肯租出。从中可以看出谷苞当时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他在2005年将此文编入《民族研究文选（三）》中，写了一篇《附记》，指出：“我认为此文对当时农家经济的实况，有比较客观、比较接近实际的叙述与分析。”

谷苞还从会宁的农家经济中看出甘肃陇东干旱地区，除了由于人口的增加，无休止的开荒，使这里的农业生产走上了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由于开荒而造成了荒地的不断减少，而荒地的减少就是牧场的减少，其后果是放牧牛羊的减少，导致畜肥的减少，加之以秸秆、野草、畜肥做燃料，用来烧水、做饭、烧炕，以致农田的施肥量锐减，收成锐减。结果是举目濯濯童山，干旱缺水，缺吃少穿。人们为了生存，无休止地开荒，造成了不断破坏大自然地生态平衡，反过来大自然对人们予以严厉对惩罚。这个当时富于前瞻性的忧虑，随着人口的增长，在21世纪初的今天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人类社会面对严峻考验，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全世界的主旋律。从中可以看出谷苞的远见。

谷苞的这五个社会调查报告，不仅本身就是翔

实的、珍贵的编史修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修志工作者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范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大转变、大变革的时代，由原来的农耕社会正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尤其是近十多年变化更加迅速，许多事物、景观正在迅速消失，我们将再也看不到了。在新编志书和续修志书中记述这一切，是修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这一切已经消失了，或正在消失，现在惟一的补救办法是尽快进行社会调查，将科学调查的资料经过整理，然后入志，把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这不仅对现在，而且对将来，对子孙后代研究这段历史，认识这个社会，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志工作者认真研读类似谷苞所写的这些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当作范本，指导我们开展社会调查，科学搜集翔实、典型资料，从根本上提高志书的质量。

参考书目

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

黎锦熙《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3年。

（作者：甘肃省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甘南州召开全州地方志工作暨业务培训会

6月23日，甘南州政府召开了全州地方志工作暨业务培训会。州政府副州长、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石占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回顾总结了近年来全州地方志工作，分析研究了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了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同时对全州地方志工作业务骨干进行了集中培训。

石占良要求，要明确任务，进一步落实《规划纲要》的基本要求。国务院《规划纲要》和省、州政府《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地方志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规划纲要》精神贯彻好，落实好。

石占良强调，要加强领导，进一步为地方志工作提供保障。我州地方史志事业总体形势是好的，但在部分县市也存在重视不到位、领导不得力、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经费不保障、目标不明确、自身能力不强等问题。对此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着力解决地方志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修志单位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加强配合，认真撰写，确保我州第二轮修志工作能够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完成。

（甘肃省甘南州地方史志办公室 苏树民供稿）

（接第39页）“才艺、学问、见识三种特长，人得一种很不容易，要兼备三种尤其难。史学所注重的是思想，具体陈述的是事实，所凭借的是文辞。孟子说：国史记载的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其文辞构成了历史，其思想则被孔夫子修成《春秋》继承了。没有见识无法判断其历史意义，没有才能无法完善其文化辞章，没有学问无法提炼历史事件。”（《史志巨擘—章学诚传》王作光，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第141页）以此，为折遇兰的“述而有论”作结，足矣！

（作者：甘肃省正宁县委党校教师）

“述而有论”在古代地方志书中的绚丽绽放

——清折遇兰《正宁县志》研读

张芹鹤

正宁历史上，从家谱和典籍中可觅踪迹的修志活动，自明代至中华民国，有5次，保存完备，可资借鉴，犹有继承和弘扬价值的当属清折遇兰《正宁县志》，全志18卷，7大纲，32目，又祥眚、轶事、艺文各自为纲目，14万字，各目之前均撰述有目前小序，多为画龙点睛之笔，收到无穷回味之效。我在研读之际，往往被这些语言所打动，思想所引领，情感所激荡；反复研读，觉得常读常新。古人修志，用自己的学识和实践，开辟了一种别有洞天的领域，值得我们学习。再说，我们今天修志，人数浩荡，但只从那些章前无题小序来看，似乎欠缺着什么，说真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文化渊源。而折遇兰这本《正宁县志》中的独到之处，就是“述而有论”！他与史志鼻祖章学诚当属同代人，志书理论在当时完全处于个人艰苦的实践和探索阶段。折遇兰就用自己第一部所修的县志，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开拓。我认为，他把撰述（评点议论）和记述（记载资料史料）做到了有机结合，使得全志“述而有论”和“述而不论”，各有千秋，相得益彰！他的《正宁县志》，可以说“述而有论”这种写法在古代地方志书中的绚丽绽放。

因此，我撰写本文，不厌其烦，基本援引摘录了（《正宁县志》清折遇兰纂修；王立明点注；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除过目中或目后以“按”出现的所有论述性文字。呈现荤荤大端，以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折遇兰也毫不谦让，他在卷之一《凡例》二中，开宗明义“志者，记载之文，然必兼以论断，俾是非得失如指诸掌，方见有关政治。若第组织事实，将焉用志？为今按闾阎、风土情形，于目后断其是非，于纲后论其得失，以为补偏救弊之助。若本文已详尽者，则不复赘。”（第5页）一是要观点鲜明；二要经世致用；目的是断是非，论得失，“以为补偏救弊之助”。当时为之作序的吴一嵩，（清）江西新建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宁州知府。在卷之一《序》中大力推崇这部县志“或序论以开先，或评断于篇后，无不折衷至是，订正无讹。”（第2页）

首先，我觉得作者这些“述而有论”的目前小序，有着历史文化的深邃背景，放眼华夏的宽阔视野，提萃地方精华的准确靶点。如卷之二《天文志》《星野》“星可得而推乎？阴阳升降之故，如系风捕影而不可凭也；星不可得而推乎？躔次宿度之数如列眉，视掌而不可诬也。自占星之说起，而惑其旨者，遂欲挟矢以射天狼矣。不知和祥、灾异达于天、通于地而由于人，顾〈洪范〉休征为皇极之应，然则后世〈天官〉等书，虽勿作，可也。”（第19页）星象学说，实属天道自然规律的一个分支，与九州八野相应，与尘世人事相通，让修史编志之士至少要撰其要旨，洞其所属，方可不被所惑。再如卷之三《地理志》《沿革》“三代以上公天下，以封建而治，世之权分；三代以下公天下，以郡县而驭，世之权合，郡县犹是！而废兴因革不绝书者，势有以使之也。正邑自汉唐以来，迭经沿革，一废于晋，再废于后周。及我国家统一，中外设官分爵于封建、于郡县，而后百里，金汤固于磐石，加以休养生息，骎骎乎复睹三代之盛矣！”（第23页）作者认知，国家治理或者叫作管理，从古迄今，上下相沿，至清代，县域划定成熟，只要地方官奋力作为，肯定能开拓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百业兴旺，文化昌明的盛世来！《形势》“秦号天府之国，表里山河，据天下险阻，可谓壮哉！即一邑至小，或势如建瓴，或形资扼塞，莫不可攻可守，藩卫中原，洵昭德蓄威之所也。正宁据北地之南，山高而多谷，擅左出右入之胜，且

长城雕岭，雄峙东偏，想见古人防边之严。爰熟察详审，附载方袤，俾官斯土者画沙聚米，而知控制捍卫之方。”（第25页）《山川》“客有登五岳之巅，穷四海之澜，而叹天地之小。退而见拳石勺水，惊叹狂走，而谓大莫与京者，遇以神也。小邑无高山大川，顾一丘一壑，士大夫或流连往复，赋诗见志，矧灵秀所钟，蜿蜒磅礴，而忠亮耿直之士，往往出于其间。〈语〉云：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可以悟矣。”（第28页）作者由远及近，由抽象而具体，由历史而现实，由泱泱中华而正宁小邑，条分缕析，突出此小邑在此目中的特定作用。卷之六《建置志》（二）《兵防》“方今天子统一，中外偃武修文，骎骎乎养兵而不用兵矣。顾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矧北地深沟高垒，为昔日用武之地，弓矢干戈固不可以无事废也。罗川虽蕞尔邑，南扼石门之险，东连子午之雄，俨然环庆保障。且武有七德，而终之以和众、丰财。众志成城，岂必较量于营伍之大小也哉？”（第62页）《里甲》“古者，比闾族党乡，遂都鄙之制星罗棋布，非特便于查核，盖守望相助。王者寓兵于农之义于此乎？在罗川，旧为廿一里。明季，兵火灾伤摧残过半，虽经并为七里，而烟火飘零，尚不免明浮于实。盖生聚若斯之难也！赖朝廷招抚安集，衡宇相望，已可按籍联编，人知生齿之繁，几忘百余年来休养之力矣！若夫积村为里，析里为甲，则村堡又可稽云。”（第64页）“长城雕岭”，乃秦代在境内一段军事设施；“石门”，正宁古时通达陕西关中必经关口；“子午”，即子午岭，雄峙正宁东部，属构成正宁东高西低地势的主体。作者从战略视角，点出这种“形资扼塞”的特殊之处，并且从治世的社会实际出发，提出和众、丰财、偃武修文的主张，使全志的指导思想始终围绕在利国利民这条主线上。

其次，作者博学多识，议论纵横，在目前小序中大量引用、用典、设喻，有的联系比照，举一反三；有的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有的探究得失，寄予厚望；有的感慨良多，以抒性情。如卷之四《地理志》《古迹》“风霜雨露之所飘零，狐虺（蛇）鼬（黄鼠狼）鼯（蝙蝠）之所窟伏，有断碑横碣、破址颓垣，士大夫婆娑徒倚，谓此某某台榭丘垄也。曾几何时，而已化为荆棘榛莽矣。然其精芒怪魄，往往游于故垒荒坛、残烧劫灰之外。故能感人至深，而使低徊俯仰，流连不忍去。若夫绰楔乌头，义关风旨，罗而列之，亦爱古者之所不废云。”（第33页）《胜景》“铜台（三国时曹操所建）金谷（晋时石崇所筑）擅古今壮丽，以黄溪赤壁比之，则浓淡不伦。然一委于荒苔，一传为盛事，何者？雅俗分也。正宁一隅湫隘，无雄台杰阁可资宴赏，顾出者成丘，陷者成谷，洼者成池，缺者成洞，固已饫闻而厌见。昔昌黎于燕喜亭，谓：‘天作地藏有鬼神，阴相言景而至。’天作地藏乃免于俗尔，何必雕镂藻绘，与造物争巧哉？”（第40页）“出者成丘，陷者成谷，洼者成池，缺者成洞”，正是正宁这种黄土丘陵地形的真实写照。《风俗》“读〈蒹葭〉〈无衣〉等篇，可以观秦俗之大略。顾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善夫。〈地理志〉之言曰：‘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盖相沿相嘘，一郡当与全省不同，一邑当与通郡互异。罗川为北豳旧地，虽文明渐启，尚有陶穴遗风，然则移风易俗可尽诿诸人事之无权与？”（第42页）《物产》“〈禹贡〉：‘九州之产，瑶琨（宝石）篠荡（竹子）、羽毛齿革、铅松怪石之类，无巨无细，悉综悉该。’盖物产未可忽也。正邑，弹丸一隅，无新奇罕有之物可登贡赋。顾布帛菽粟皆天地自然之利，苟稼穑可宝，亦爱物心藏，何必穷霍山之珠，罗汾水之玉，以侈观美哉？”（第46页）卷之五《建置志》（一）《城池》“〈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周礼〉城郭沟池具颁其制，盖增陴浚隍，亦聊以固吾圉耳。小邑无金墉铁瓮之观，然登城四望，南山如屏，俨资保障。西亘长川，冈峦环列。其东则长城驰道，秦人之所经营也。北控胡羌，密迩环庆，非唐宋以来用武之地乎？守兹邑者，筑之而高，凿之而深，其何？以有备而无恐。若夫司关联市，事以类从，并详考而附于左。”（第49页）《公署》“国家设官分职，必并其居处而经营之。盖处政临民之所，古人取象于天，使百尔臣工皆得体此意以敬天勤民，厥体至隆，厥义綦重。登其堂者，顾名思义，庶几民具尔瞻之旨矣。〈诗〉曰：‘君子攸芋，君子攸跻。’

重公署也。”（第51页）《邮传》“驿额繁简，因乎地之冲僻，势使然也。至细而为铺，则已无驿之可言。顾文檄簿书，终无虚日，递送迟速，固政治之勤惰所由关也。爰考其沿革，论其得失，俟留心驿政者，随时酌量调剂云。”《学校》“先儒论学曰：‘寻孔颜乐处，是道也。国家以之化民成俗，儒者以之修身立教，措之为盐梅燮理而无所加于身，藏之为陋巷，箪瓢而无所歉于己，所以引天下于之乐之中，而使之乐其乐也。’今国家宾兴长养之方，远轶前代，即以罗川一隅，而学校规模既详且备，士生其间亦既鼓舞奋兴，蒸蒸日上矣。顾三年小成七年大成，岂惟是工帖，括取科名而已在？亦将有所乐乎此耶。”（第55页）卷之七《祠祀志》《坛庙》“崇德报功之典，圣王所以以神道设教。自社稷山川百神及有功德于民者，皆祀之。即渺乎一隅而有其举之，莫敢或废。盖一邑，而境内之象具焉。〈书〉曰：‘至治馨香。’〈传〉曰：‘惟德是辅。’与斯典者，奚以和神、人格上下欤？若夫非所祭而祭之，谓之淫祀，淫祀无福，其敢于大典以取戾？”（第74页）每一目必有论，每一论都会别出新裁，不同见解，蕴积着绵密深厚的历史学养。古人所讲的多识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岂止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所谓主编和副主编，当是怎样的感悟？我是痛切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史志工作者，历史文化积淀的不足。

再次，阅读古志，大家都说古人重人文而轻经济，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生产力极其落后，在史志著作中的反映。折遇兰《正宁县志》概莫能外，可贵的是他始终有着清醒的，高屋建瓴的认识，这种认识，便自然而然地归结在这些目前小序中。《仓庾》“贾太傅曰：‘积贮者，生人之大命。’〈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盖余三余九，储丰年之有余，补歉年之不足。先王为民计者，至熟也。’正邑户鲜，盖藏民之仰赖仓廒者，十中七八。庾廪所关，视别邑为更切，亦视别邑为更难。夫权盈虚缓急，有备而无患者，守土之责也。未雨绸缪，宜何如而乃可？”（第68页）《桥道》“昔诸葛武侯好治桥梁道路，岂作无益，以重劳吾民？盖徒杠舆梁，王政所不废也。罗川僻居湫隘，不过鸟道羊肠、潢污行潦，无康庄巨浸可观治理。然一线蚕业，亦不免踵连趾接，脱委而不治，将茀不可行，何以壮杨柳之尘而为百里生色耶？”（第71页）卷之八《田赋志》《赋税》“先王则壤成赋，维正之供，相厥地之肥硗，以定赋之多寡，法至善也。罗川土力固薄，赋额亦轻。我国家自上下下，偶遇歉收，蠲赈并举，更为旷古所未有。顾任土作贡，实以下奉上之义，此考核之条，所以必严于有司也。唯在司民牧者仰体朝廷惠养之义，视年岁之丰歉，为催输之缓急，不负官，不扰民，庶朝野公私两得矣。”（第97页）《经费》“国家量入为出，度支必有常额。顾经费本于民赋，而山陬小邑，入者少而出者多，祭祀俸薪饩廪之需，尚不能不仰资国帑敬事后食，奚以对兹升斗而无愧哉？〈诗〉曰：‘不素餐兮？’刺旷工也。〈易〉曰：‘鼎折覆餗。’励廉隅也。”（第101页）《户口》“版图藏于天府，康乐献自行人。盖民为邦本，生齿之盈耗，先王所兢兢也。罗川遭明季兵燹之余，流离转徙，村里为墟。我国家百余年来，与民休息，加以深仁厚泽，浃髓沦肌，而后散者聚，剥者复，连村比屋成豫象焉。夫稽民数以上之朝廷，有司事也，敢不按版籍而登之？”这些论断，见微知著，既情系苍生，关心民瘼，又尽责朝廷，竭诚国家！封建士大夫的人生境界和事业情怀，更应从折遇兰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总论中可见一斑！《地理》总论：罗川一隅，固不可以全秦大势而论，顾其地界，陕甘之间，与邠、耀等犬牙相错，而贫富相悬，或至倍蓰者。其故有二：以地利言之，水虽多而不腴，土虽厚而善燥，今岁所耘，明岁有不可复种者，谓之歇田；平原之上掘井数十丈而不及泉，斯地力之薄也。以人事言之，田数广而不精于耨，畜数寡而不充于粪。有收则罄，所获以供一岁之用，斯人力之疏也。于是乎，田愈瘠民愈穷，而俗因而渐敝矣。夫限于地者，无如何成于人者，补偏救弊，伊谁之责？吾故曰：‘治兹邑者，在劝农有方。’”（第47页）《建置》总论：“罗川居甘省东北，距省一千一百余里，不免鞭长难及，若归入陕省，转称近便，而必隶于甘属者，何欤？尝按质形势，谓庆阳合郡专为控制银夏而设也。银夏自唐宋以来，屡为羌寇所据，经杨叔明、范希文、韩稚圭等诸公相继扑灭，至今尚设重兵收戍。夏州无

备，则两河皆为所牵动，而要害失矣。庆阳居陕甘之交，屹然北向，为朔方锁钥。银夏有故，则以精兵扼其咽喉，直捣灵州，而西路一带指顾自定，此韩范诸公所以致胜也。以是观之，庆阳固甘省之要地，而宁州、正宁在郡治东南，堪资后劲。无二邑，则庆阳之势亦弱矣。否则河东地界至泾州、固原，本属划然，庆阳合郡不若归于陕省之为便也。"（第 72 页）《田赋》总论："三代以下，理财之良法，莫善于劝垦，而勤垦之方则未有今日之善也。夫水田起科迟以六年，旱田起科迟以十年，缓其赋以酬其劳，实属仁至义尽。而报垦者寥寥，则劝之者未力也。罗川自县东六十里外，尽有可垦之田，独其地势较高，或陷于山麓，或坐落塬阜，开垦不易，而愚民又习于安逸，是以观望不前。不知地利无穷，殚数年之劳，而收永久之益，夫何惮而不为？惟在有司实力劝督，以期野无旷土，人有恒业，则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矣！"（第 104 页）这些议论，当是言犹未尽的真知灼见，自成一家之言的典范。反思我们所打造的概述，动辄洋洋洒洒数万言，哪些数真胆略，哪些有真时弊，哪些算好建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今志书半人物。折遇兰《正宁县志》中，自然有人物记述的篇章。分类至细，各有所钟！卷之十《献征志》《人物》"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率因地以著名。若夫深山邃谷之中，虽有盘根错节、倚天拔地之材，不逢大匠，谁过而问之？然其虬枝劲节，固自挺然特立于尘埃之表。罗川虽小邑，而间气所钟，不乏魁梧奇伟之士。盖大木不择地而生，大儒不择地而出，其理一也。且地以人传，乌得以县小儿忽之！"《忠节》"读文天祥《正气歌》、武侯《出师表》，虽甚庸懦，未有不感慨激发或至于流涕也。盖天地忠烈之气，无一日不存于人心，故'上则为日星，下则为河岳'。而藐然中处者，一往而莫御，百折而不回，浩浩乎塞于天地之间。呜呼，可不谓壮哉？罗川一隅，而见诸史册与得之传闻者，正不乏人，考而录之，亦植经维纪之一助云。"《乡贤》"古者瞽宗之祀，所以崇德尚贤，苟非懿行丕著，虽贵族不与，而况欲结纳声气以幸邀哉？罗川文献销沉，唐宋以前无征不信。顾俎豆所关，少而愈贵。苟名实既符，即一人一事而流风余韵已足低徊想像于无穷，矧典型未远，犹堪屈指数之耶！《孝义》"孝为百行之源，而姻睦任恤（和睦亲邻，救济贫弱）即因之以生，此教化之所由起。而风俗人心之大本也。夫歌哭怨慕之真，缓急取舍之义，或发于诗书，或根于天性，批复匹妇，不必规规古人，乃至性至情感触流露，若有不能自禁者。而则古昔陈先王者，顾可出其下耶？噫！此可以兴矣。"（第 130 页）《文学》"儒者读书论世，幸而置身朝庙，文章可以华国，经济足以匡时，因而扬眉吐气，激抗青云，固其所矣。否则牙签（象牙制的图书标签）石室（藏图书档案之室），玉佩琼琚（均比喻华美的文章），洒然而风雨惊，渊然而本末贯（意思是一挥而就写出的文章文词警辟，哲理深邃，本末贯通，足以让风雨为之一惊），亦足以昭垂不朽，利赖无穷。小邑不必多有本有用之士，而风流典雅，自成一家者，亦时有人，可听其湮没不彰与？"（第 139 页）卷之十二《献征志》《选举》"国家设科取士，举海内怀瑾握瑜之士罗而致之，以备股肱、耳目之选，又复多方选擢，不拘一格，此诚多士鼓舞奋兴之日也。罗川为北地人文之最，抡元夺魁者，后先相望；而经明行修之选，又济济有人。他日献之朝廷，盐梅舟楫，吾知其必有合矣。夫善人可宝，敢不敬而书之？"（第 149 页）《艺文志》"汉班氏以刘歆《七略》作《艺文志》，而诸史因之，志之不废文也，尚（时间久远）矣！小邑文献销沉，旧有存者，不过吉光片羽，委弃于苔碑芜碣中。及我国家文教四达百余年中，踵事增华，士之樵苏艺圃、渔猎辞林者先后相望，故名篇佳制时有可采。选而录之，亦鼓吹一助云。"（第 170 页）总论："罗川本一隅湫隘，而汉唐以来，或以事功显，或以节义传，昭垂史乘者，班班可考。至于矢志柏舟，以巾帼而知大义尤为指不胜屈，岂非山川灵秀、蜿蜒磅礴以至此耶？！顾人才盛衰，虽由于地气，而长养培植则不能不资于教化。官斯土者，诚以齐鲁之人自待，如蜀士大夫。将见贤豪辈出，必较胜于前。出则为名宦，处则为名儒；入，笃孝友之谊；出，敦姻睦之义。将使后之秉笔者大书特书，以为人材之薮、礼教之区，是则余今日所深望也。"（第 159 页） （转第 35 页）

古今崆峒山志书研究

张怀宁

摘　要：从明清至当今，崆峒山有专业志书11部，有传承，有特点，具有文献史料、学术研究、开发旅游等价值。

关键词：崆峒山　志书提要　　学术价值

山志属地方志门类的专业志之一，名山有志，志记名山。凡是山水奇特，风景秀丽、文化、历史、宗教等积淀深厚的华夏名山，都有一部或多部山志。山志直接导源于古老的《山海经》，中国历代的山志有数百种。《中华山水志丛刊》收古籍319种，其中《山志》刻印38册153种。《中国名山志》16册，汇集《华山志》《泰山志》《九华山志》《武夷山志》《普陀山志》《五台山志》《黄山志》《庐山志》等名山志书。《四大名山志》4册，有《峨眉山志》《清凉山志》等。经济、文化发达的浙江一地就有山水志280种，其中明清时期编纂的山志121部，现存62部[①]。研究，编纂山志是一项传统的名山事业，张潮所谓“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一、崆峒山——大西北一块宝石

崆峒山，位于陇山东翼六盘山支脉，在甘肃平凉市城西12公里处，因轩辕黄帝问道于广成子而被誉为“道源圣地”，秦皇汉武登临，文人墨客题咏，四方香客朝拜，旅客游山赏景，是汉唐丝绸之路上西出关陇之要塞，主峰海拔2123.3米，景区面积84平方公里，山势雄伟，神奇秀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和谐交汇，其中的八台、九宫、十二院、四十二座建筑群、七十二处石府洞天，自古以来就有“西来第一山”“西镇奇观”“崆峒山色天下秀”的美誉。

二、明李应奇的万历《崆峒山志》——甘肃最早刊行的山志[②]

李应奇，字鹤崖，明朝平凉人，赵时春的孙女婿，历任延州、庆州知州，开封府教授。万历乙酉年(1585)至1589年编纂成《崆峒山志》，设分野、建革、疆域、形胜、田赋、仙迹、题咏等七目，前有平凉知府罗潮一篇《崆峒山志叙》。原刻本三卷二册，江苏周厚堉家藏本，收入万历《内阁书目》和《四库提要存目》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类存目五。其中分野、建革、瓦亭关、会盟坛等记载，或有补缺赵时春《平凉府志》之意，《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志颇有微词，认为“丛杂无限断也”。张维《陇右方志录》有著录，评其“殊似府志之体例”。清张春溪《崆峒山志》中收李应奇诗二首。郝润华主编的《甘肃文献总目提要》

著录万历《崆峒山志》。

明代，许登编纂《崆峒山志》，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有著录，今已佚。

三、清张伯魁的嘉庆《崆峒山志》——五次刊印

张伯魁，字春溪，清朝浙江海盐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平凉知府，将前任王肇衍、阎曾履未刊印的《崆峒山志》删繁就简，重加编修，于二十四年(1819)五月刻印。分二卷二册，有图、辨、古迹、名胜、寺观、仙迹、隐逸、物产、诗、赋、记、论等12目，三万多字，甘肃省图书馆有存。张维《陇右方志录》评嘉庆《崆峒山志》“于李（应奇）志删去分野、建革、疆域、田赋等目，而于阎稿亦多删减，盖亦山水志之稍严整者。然古迹所载多属故事，而见于寺观之唐宋旧迹，转不载入，去取已嫌失据”。“名山金石，国故攸关，此志不列专目，未免轻其所重”。同治十一年（1872），崆峒山太和宫刻印嘉庆《崆峒山志》，原版今存平凉市崆峒区博物馆，1993年仇非标点整理印行1500册。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63册有嘉庆《崆峒山志》，日本馆藏甘肃方志中也有此志。2004年国家图书馆编印《中华山水志丛刊》第七册中有嘉庆《崆峒山志》，《甘肃文献总目提要》有著录。张伯魁的《崆峒山辨》等诗文收入后世地方志书。

张伯魁的嘉庆《崆峒山志》先后5次刊印，其传播与影响在崆峒山志书中领先。

四、仇非的《新修崆峒山志》

199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仇非主编的《新修崆峒山志》，编纂李学纯，协编曹建魁，摄影黄毅。该志10章，有环境、胜景、建设、道教、佛教、文物、旅游、艺文、管理、杂志，38节，21.7万字，44帧图片，1幅旅游示意图，32开本，印5012册平装。1999年10月获甘肃省优秀史志成果一等奖。

五、黄毅、张连举、张怀宁的《崆峒山新志》

2008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崆峒山新志》，黄毅、张连举、张怀宁主编，魏柏树总纂，有大事记、专志、附录、后记；专志15章，历史、地理、气候、植物、动物、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景观特色、宗教、文物、艺文选萃、崆峒武术、学术研究、旅游、机构管理。85万字，106帧照片。精装本，印2000册。2010年获甘肃省史志成果二等奖。

六、崆峒山专业类分支学科志

1.《崆峒山植物志》

高维衡编纂，1998年12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志分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被子植物门。记录崆峒山1006种植物，分述于129科、455属，插图216幅。设崆峒山自然概况、分门检索表、附录、后记。100万字，16开本，印1000册。

2.《崆峒山动物》

赵明星主编，1999年12月三秦出版社出版，设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两大类，记述崆峒山动物270种，其中稀有动物数十种，全志25万字，32开本，普装，印1500册。

3.《崆峒山佛教志》

2007年6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妙林主审，仇非主编，设概述、寺院兴衰、法物经藏、历代高僧、佛协、僧众名录、仪规法会、诗文杂录、碑文选录等10编26章，照片173帧，25.7万字，16开本，普装。印2000册。

4.《崆峒山道教志》

曹建魁编，志的前言后有九章，总论、宫观、斋醮、名道、文物、武术、艺文、管理、拾遗。2009年11月，平凉崆峒山道教协会内部印行，20万字，32开，平装。

另有《崆峒山道教历代碑铭录》，潘延川1989年编。范朝晖、李学纯编《崆峒碑文楹联选》，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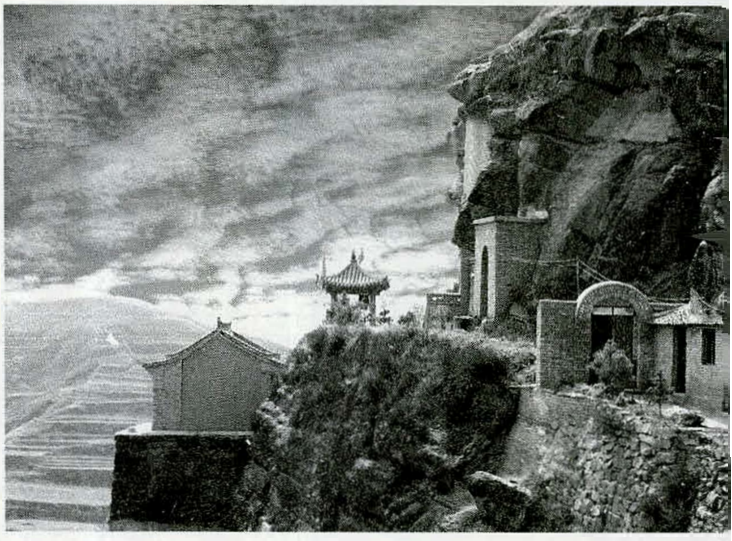
年三秦出版社出版。

5.《崆峒山金石校释》

主编王大睿，作者吴景山，2014 年 7 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收录崆峒山从秦代至中华民国时期的金石碑铭 110 余种，以刻碑时间为序，前半部分为图版，后半部分为释文，附有按语，简录相关研究资料。

6.《崆峒山武术志》

2012-2015 年李恒达主编，38 万多字，300 多幅照片，分墨宝、概述、大事记、门类、拳械套路、组织、比赛、礼教、人物、艺文、附录 11 编、38 章。内部印行。



七、编修山志，是一个地方文化发达的反映或表现[③]

明清时的《崆峒山志》有 4 部，一部早佚、一部未刊，现存 2 部。新修的《崆峒山志》有 2 部。新修的崆峒山专业学科志有 7 部。共计 11 部，在西北地区不算是最少的，但与东部沿海地区文化发达的江浙相比较，我们的差距非常大。西部大开发，文化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也不是张贴标语口号就完成了。我们要承前启后，加倍努力，改变落后现状。西部的名山、甘肃的名山都需要有人编写山志。

八、崆峒山志的特点

万历《崆峒山志》有 7 目，嘉庆《崆峒山志》有 12 目，皆采用条目体，有序跋、专记两大部分内容，以专记为主体内容，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为崆峒山“存史”，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平凉地方志书的缺口，又经历了数百年岁月洗礼，能够传世就不容易了。当代新修的崆峒山专业类志书，继承了明清《崆峒山志》的传统内容，普遍采用了章节体，有概述、专志、附录三大部分，以专志为中心。卷首有图、照片、题词、序、凡例、目录、大事记、概述等。专志按编、章、节设纲目，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编写[④]，容量比旧志大，图表、照片比旧志多。附录有文献辑存、索引、修志始末或后记等，比旧志跋的分量大。新旧志的共同处是体例内容有传承与交叉，艺文部分收编的历代诗文特别多；新志突出了崆峒山历代遗存之金石和文物的收藏及保护。“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新志的学术资料性更加突出。

九、崆峒山志书的学术价值[⑤]

古今《崆峒山志》保存了历史上大量文献史料，如记北宋天圣七年（1029）崆峒山铸“黄帝万岁，臣佐千秋，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铜钟。记庆历二年（1042）崆峒山僧人抵御西夏兵入侵，保护避难群众，获朝廷封号和赏赐紫衣。反映出宋代崆峒山佛教的兴盛。记元至正十七年（1357）刻立问道宫碑，今存。明代在崆峒山主峰建隍城，在老君楼绘“老子八十一化图”壁画，今存 29.3 平方米；证实元、明时期崆峒山道教的兴旺。在崆峒山塔院建大明藏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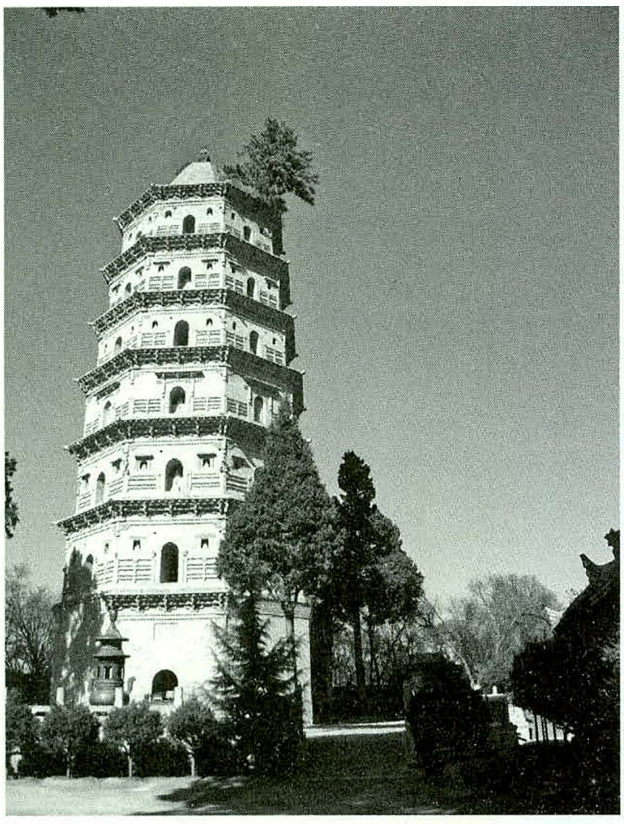
新修山志记清同治十年（1871）三月，左宗棠书《崆峒玉碑赞》，“木病斯癭，石灵成影。高平之山，孕兹奇景。猨公著藤，山果坠岭。摩挲几遭，尘空光炯。金积既平，渤崆峒顶。 叵奈硜硜，笔刀莫逞。马肆献奇，志之荣幸。用供古佛，聊慰寂静。关陇其宁，年丰寿永。车骑燕然，吾曷敢请。……永供佛寺，为此邦祈福也”。此碑今存，《左文襄公全集》等著作没

有收录这篇碑文。崆峒山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崆峒山古建筑群，已列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专家学者研究、考察崆峒山的植物、动物、地质、民众信仰等取得了重大成果，高维衡在崆峒山采集、鉴定、制作了大量植物标本，发现了植物新种，命名为甘肃八仙花，编纂了《崆峒山植物志》。历代的崆峒山志书，在宣传、开发崆峒山文化旅游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崆峒山新志》在大事记中有：1994 年，列入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 年，确定为国家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2004 年，成为国家地质公园；2005 年，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十、崆峒山志的作者群体

明清《崆峒山志》的编纂者李应奇、罗潮、王肇衍、张伯魁等曾任平凉知府，进士出身，古代的地方官员，“断案、收税、修方志”是基本工作。大多数地方官员任期内没有修志，可能还有一些地方官员所修志书没有传下来。《崆峒山金石校释》的作者吴景山是兰州大学教授，他骑自行车考察西北陕、甘、宁、青、新境内的丝绸之路，编纂丝路金石丛书，“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仇非、张连举是《平凉市志》《崆峒区志》主编，新修山志责无旁贷。高维衡、赵明星、张怀宁是平凉师范高级讲师，从事生物、地方历史研究，以崆峒山为学术研究重点。《崆峒山佛教志》的主审妙林是崆峒山高僧。李学纯、曹建魁等是平凉文史工作者。地方官员、专家学者、高僧大德等共同为美化绿化崆峒山而植树种草。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十一、崆峒山志书的局限性

历代《崆峒山志》受地方经济、文化条件等因素制约，编纂印行困难，只在甘肃地方出版社出版或平凉地方内部发行，较多的印行 5000 册，多数印行 1000 册，个别仅有稿本。发行量小，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不大。在国家、省市、大中学校图书馆、新华书店找不着。

另外，在崆峒山志书中，当地文人溢美、浮夸之词不少，如“海内真崆峒”“道教发源地”“老子天下第一”“树崆峒学大旗”“天下养生第一地”等夜郎自大的说法，在志书及诗文中，时有出现，不够科学严谨。

注释：

① 万霞：《明清浙江山志述论》，复旦大学 学位论文 2010 年。

② 郝玉屏：《甘肃方志通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 年。

③ 张群：《近三十年山志研究述评》，《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

④ 王辉：《山志体例章法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地方志》2008 年 2 期。

⑤ 石光明：《明清山水志的学术价值》，《农业考古》2006 年第 1 期。

（作者：甘肃省平凉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张维方志思想研究

陈尚敏

摘　要：张维曾撰有《方志衡义》一书，以表达他研治方志数十年的心得体会，可惜此书已散佚。不过，在《陇右方志录》自序及其对所著录方志撰写的按语中，约略可见张维方志思想之梗概。本文主要从张维对方志起源发展、功用价值、编纂以及弥漫于旧志的弊端陋习等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予以申述。

关键词：张维《陇右方志录》方志起源　功用价值　编纂

张维（1890-1950），字维之，号鸿汀，笔名南野。甘肃临洮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童试中式，入兰州府儒学，不久考入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博物班。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甘肃拔贡第三名；次年春，赴京朝考，列名二等第五，遂授学部书记官。从此步入仕途，先后在中央和地方任职近四十年。然又勤于治学，造诣多在史学、方志学方面，正如先生所言："吾于文史、方志，致力颇深，自信略有成就。"[①]张维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方志学家，其在方志学上的贡献，学界谈论较多的是他主持纂修民国《甘肃通志稿》、独立编著《甘肃人物志》、《陇右方志录》以及校补勘定陇右旧志等方面[●]。张维曾撰有《方志衡义》一书，以表达他研治方志数十年的心得体会，可惜此书已散佚[③]。至今尚未见到专门探讨张维方志学术思想方面的文章，应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陇右方志录》是一部区域性的方志目录[●]。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在当时享有盛誉，曾被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列为国际交换书籍。柳诒徵称赞此书为创例，"如各省皆有仿作，则与学者以极大便利"[⑤]。黄苇先生认为："在区域方志提要中，以张维《陇右方志录》最负盛名。"[⑥]通过《陇右方志录》自序及其对所著录方志的评价，约略可见张维方志思想梗概。因相关论述大都来自于作者对方志著作研读后的总结，其结论具体而有针对性，即使对当今修志，依旧有着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张维对方志起源发展、功用价值、编纂以及弥漫于旧志的弊端陋习等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予以申述。

一、方志的起源发展

方志和任何一个学科一样，都有着一个源起、

---

① 《六十自述》，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9页，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② 要者有：王锷：《张鸿汀先生在方志学上的贡献》，《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2期；牟实库：《一部研究西北问题的重要参考书——〈甘肃通志稿〉》，《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1期。

③ 关于此书，其哲嗣张令瑄说："此稿为先生治史志学多年心得见解，时有新义，写定此稿，就教高明，以飨后学。"参见张令瑄：《甘肃张鸿汀先生遗书提要》，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401页。王锷先生在《张维著述考》一文中说："张维研治方志数十年，故以其对方志之见解撰为此书，惜已佚。"参见《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2期。

④ 《陇右方志录》录今甘肃、青海、宁夏方志。正文前有《自序》、《凡例》和《目次》，后有《附记》。著录的地方志包括省志2部、郡志50部、县志212部、杂古今志29部，共计293部。各志注明其存佚、年代、撰者、卷目等情况，最后以按语形式对其予以评价，类近解题之体。《陇右方志录》刊布后，张维又为新见到的一些方志编著目录，即《陇右方志录补》一书，体例悉遵前书，录省志1部、郡志4部、县志22部，杂古今志9部，共计36部。参见王锷：《张维与〈陇右方志录〉》，《西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陇右方志录》及其《录补》两书分别于1934和1943年由北平大北印刷局印行，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据此影印出版，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77册。本文所使用的版本即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所标注的页码为原印本页码。

⑤ 参见张季容、张令瑄：《张鸿汀先生事略及著书提要》，《兰州文史资料选辑》（总12辑），第12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黄苇：《方志学》，第6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发展和定型的过程。张维对此曾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

> 方志之名，肇始《周礼》，其后演为国别之史，左丘《国语》、《史记·世家》犹其遗义。汉制诸郡计书，先上太史，副在丞相。东汉以后，始有州郡之书，始惟明扬耆旧，渐而方物有志，风俗有录。至《华阳国志》、《襄阳耆旧传》，更涉载风土政事。挚仲洽为《畿服经》一百七十卷，凡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视孟坚《地理志》，条理益加详焉。书虽不传，而方志之书，作者日众。隋唐以来，诸州郡皆有图经，颇畸重地理。宋元诸志，编录浸广，说者谓滥觞乐史《太平寰宇记》，而不知仲洽先此有作也。明制郡县皆立志。爰及有清，承流弗改。计今中国千八百余县，无志者，盖寥如矣[①]。

民国继清而来，清代又是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突出成就即是方志理论的形成。像历史派代表人物章学诚，在方志走向成熟，乃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功莫大焉。张维就说："自清乾隆时，会稽章学诚建言以史法为志法，又言经记一方文献，必须建立三书，由是类例益肃。而方志之学，益重于世。"[②]事实上，民国方志学家多是在祖述章学诚方志理论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探讨方志起源其实是在寻找和追溯方志某些基本要素的萌芽。在此问题上，张维显然袭受了章学诚"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③]的观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方志毕竟是综合体，与单一记述地方历史的著作有很大差别，缘此，将方志起源归结到某一种书或某一类书，都可能引发争议，即是《周官》所称古方国史，也只是近似于后世方志的某些特征。方志多源的观点似更合乎方志发展的实际。

在方志发展过程中，张维认为图经是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是和章学诚观点有出入的地方。章学诚认为："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为户籍，图谓土地形象，天地广狭，即后世图经之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④]章学诚否定图经是方志，这实质上否定了图经是方志发展史上重要阶段的事实。今天我们认为方志于宋代基本成熟定型，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渐次融合了专述史地的方国史和地理书以及地图的相关内容和体例，最终成为一种无所不载的资料性著作形式。图还成为方志的基本体裁之一，甚至有"无图不成志"之说。

另外，张维认为方志雏形于西晋已经形成，其标志是挚虞《畿服经》，而非四库馆臣所谓的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⑤]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张维的这一观点也可备一说。

二、方志的功用价值

中国是一个史学的泱泱大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华民族理性成熟的表现。史鉴意识，形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品格。地方志向为史学旁支，其功用价值也是从史鉴的角度出发，往往以"存史、资政、教化"来概括。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张维对方志功用价值的认识有两点值得重视。

首先，强调方志所存之史，系关下层社会民生。

> 史籍之书，莫繁于我国，综古今所著录，

①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②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第103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第1039页。
⑤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923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其数盖赢十余万卷，大率言朝廷改革事为多，而兼言社会民生者，厥惟方志[①]。

张维在评价旧志时，对相关内容尤为措意。如嘉靖《平凉府志》，“指斥时政，能言人所不敢言，于民生疾苦兢兢焉，惟恐言之不尽，信方正慈祥人也。”[②]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志言自同治初至光绪之末，税日益增、价日益涨，四、五倍于厥初。呜呼！民力竭矣。”[③]民国《崇信县志》，“蕞尔小县，累经兵燹，生民困穷，殆有非人想像可得者。志于此反复详说，而尤详于经过。乱事读之，使人深痛于边鄙孑遗之劫后疾苦，则作者固有心人也。”[④]

张维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系受到新史学思想的启发。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痛陈旧史学弊端，指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舍朝廷外无可记载”；“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上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也”。“正史范式”支配下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史学，其内容重在记录王朝兴衰，帝王谱系，关乎下层社会民众的历史无多。《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20世纪初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滥觞[⑤]。

传统学人往往视治学为其现实关怀的手段。民国为乱世，加之甘肃地处边远，远离中央权威，各地回、汉军阀林立，动辄酿成兵燹。张维将那些关注下层社会民生者引为同调，实有借别人家的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意味，其中深寓着他本人的现实之感，这又与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力救时弊的社会责任感密不可分。张维曾自言：“我读书四十多年的治学观念，就是明事理，求实用。”他出生于一个旧时耕读之家，祖父为生员（俗称秀才）、父亲为举人。“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治史学的，在我幼读时，就训以《通鉴》大义，又常讲述他们经过的许多乱离和困难，使我在孩提时，就中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贯穿于他的政治生涯。“辛壬之际，先生年富气锐，颇欲奋志事功，与时贤相先后。及迭经变故，知军阀政权之不可与有为，而建设国家之人才，必有赖于教育，乃议设立兰州大学、西北农专、西北医学院、兽医学院及各县专科学校，复力主迁西北师范学院于兰州，保送国内外留学生，设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馆、敦煌艺术所”，“又以陇地素瘠，欲改善国民生计，当先兴水利，大启农、林、路、矿之利，故于玉门石油之探采，各地河渠之疏修，公路、铁路之兴建，皆多所倡议”，“先生四长省议会，为时二十年，以至公至正之态度，于民生疾苦，如迭请减免人民摊派、差徭及地方积弊，减少壮丁征额多至一万九千人，诸大端无不竭尽心力，与当道者争执之”[⑦]。他的政见在为他迎来声誉的同时，也引起政敌的不满。“吾尝以憨直得罪权要，缇骑及门汹汹，势若不测。”[⑧]

其次，强调方志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价值。张维继承章学诚“志乃史体”的方志学科属性的观点，认为：

自人之有群也，其经营事状，常有以继往而开来。记载此事状，以昭于后人，惟史之赖。分析愈微，则记载愈详，事状乃愈真。自国而省而县，是分析之微也。详而能真，惟方志兼之。故觇一国文化，求之史，毋宁求之方志。

在对产生于陇右这一特殊地域的方志评价时说：

嗟我先民，斩荆棘、辟草莱，以启西土，以与异族战，以繁衍我胤裔。万千年来未时或息，幽之为卦象，显之为礼乐，化之为风俗，蔚之为制度文物，发散之为事功

①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②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7页。
③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4页。
④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90页。
⑤ 参见陈峰：《两极之间的新史学》，《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我的青年时代》，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8页。
⑦ 韩定山：《张鸿汀先生事略》，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6页。
⑧《先室郑夫人墓志铭》，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109页。

文章。生乎今之世，而欲观其粲然者，方志是已[①]。

由于方志记载范围相对较小，因而使其更容易具有“详”且“真”的特点。对方志在历史规律认知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价值的肯定，使方志功能具有了新的意蕴和内涵，这是与民国时期高涨的科学精神的影响分不开的。传统“资政”、“教化”方志功用价值观，仅是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既然方志是著述之体，其价值显然不囿于此。

张维总纂《甘肃通志稿》可谓历经艰辛，如果没有对方志功用价值的充分认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任何人做事都有其现实动因。《甘肃通志稿》“凡为卷一百三十，都约四百五十余万言，因于旧者十盖三、四，而用新例编修者殆十之五、六”[②]。“志稿十之八、九为拙作。”[③]加之又是乱世修志。“民国十八年甘肃省政府议修省志，通檄采录史实，设局编纂，延聘多人分任撰述。未几军事繁兴，主政者数有移易。至二十年初，以费绌中缀。明年复以部颁修志事例，改局为馆，仍以不才任馆长兼总纂，又设分纂四人，编辑四人，搜罗新材，董理旧稿。迨至二十四年秋，限期已届，仍未杀青，乃与临夏邓德兴隆、桂林廖进之元佶，静宁朱玉伯秉衡，共约以私人负责，继续编修。而三君先后又以他事去，又近二年，不才始勉为成书。”●“吾在通志馆七年，其时戎马倥偬，经费极少，吾昕夕治书，常至夜分。自己采访，自己编录，时致目眩胸胀，历经辛劳。其后三年，全尽义务，终得完成志稿。”[⑤]

三、方志的编修

编修方志要因应时代，与时俱进，这是张维在方志编修上首先所强调的。

日新者，时也，而学术常应之。新志有作，必将有昔无而今有，昔略而今祥，昔之破碎襞积而今整理比次者。故天文必以寒暑风雨调节于人事，地理必由山川脉络研讨于地质，典制必明古今变迁之迹，财赋必及民生盈虚之故，民族礼俗必著嬗合转移，人物事功必取错综互见。辞必于信，事必于真，纪载纲领，必足以经纪众事而不遗，质诸来今而不惑。若是者，盖可语于今之方志矣[⑥]。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因此要创设新的类目对此予以函纳。伴随着新观念的产生，人们看待历史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在往昔被忽略的，在今天要特别重视。同时还要改造方志既存类目，使其体现时代特点。民国《甘肃通志稿》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上述革新理念，其《凡例》云：

首卷天章、纶音及艺文志载各文类诗词，如关事实，各归本目，其余原文概从割爱；

星野旧说，经古今学人考辨，不尽可据，今从省略；

本省地质未曾确实调查，今就近数年中外人游记及诸杂志所载及者，略编次之；

民族一纲为本志所创立，族姓以详所出，移徙以考转移，户口以表生聚，宗教、学艺以纪文物进化；

实业则生事所需，吾民族所赖以生以养者也。今俱详稽古今，比次纂述；

风俗、方言虽见旧志，亦复参考增辑。于方言并详其语音变化，中夏遗音散见各地，民族嬗转之迹，盖往往有可因此而考知之者，未可忽也；

财赋各目，旧志颇多简略，今俱参稽

①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② 张维：《陇右方志录补》，第5页。
③《南野先生访问记》，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7页。
④《甘肃通志稿序》，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89-390页。
⑤《六十自述》，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9页。
⑥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史志、会典及财政机关档案，分别编次[①]。

其次，对资料的重视。方志是著述之体，要具有识见和创造性，但这些品格的获得要建立在对资料的全面搜集、考证的基础上。张维把资料的搜集、方志的撰著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譬之山海珍错，渔者猎者之所获，皆以供宰夫之割烹苇炙，以登于太官之馔。虽曰宰夫之能，要不能不先资于渔者猎者”[②]。材料是编修方志的前提，其获得备尝艰辛。清朝为编修《一统志》，在广泛搜求历代旧志的同时，还多次诏修新志，方志编修一度呈现出兴盛局面，方志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充分肯定。但就陇右今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修成的二十余部州县志来看，其成书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张维直接将其斥之为“官辑应征之本”。“清康熙中诏修《一统志》，征取各省郡县志书，省吏制发目类，檄催编纂，此即当时官辑应征之本。凡康熙二十六年写本诸志，目类大抵与此（康熙《狄道县志》——引者）相同，简略亦相若。”[③]又说：“康熙中诏修《一统志》，征取各省方志，郡县官率应命，义例雷同，事实又多简略，直不足以言志。”[④]像康熙《两当县志》：“史实殊为简略，盖承命塞责而已，不足以言志。”[⑤]康熙《伏羌志》：“大率剌录《巩昌府志》，无所订正。孝行、艺文皆注无考，其仓促塞责可以想见。”[⑥]康熙《阶州志》：“大论堪舆，愦愦如此，安能责以著述乎！”[⑦]平时不注意资料收集、保存和整理，届期修志，虚应故事自然就在所难免。章学诚早在乾隆时期就建议州县设立专门的修志机构，其实已注意到这一点。张维也曾建议政府设立甘肃丛书编印馆，以为修志服务。

> 西北历代为用武之区，民族复杂，每由处置失平，数十年时有兵燹，一经变乱，非仅文物为之烬尽，而人民所受之惨剧，长期难于复原。昔年撰述史志，每感文献之无征。故吾于通志馆结束后，建议当道设立甘肃丛书编印馆，以后扩大为文献征集馆，自任馆长兼总纂，意欲随时搜集地方史料，以供治西北学术者之参考。但既不为军阀政权所重视，经费极为困绌，成效殊少[⑧]。

在资料搜集上，张维做到了身体力行，由他整理的陇右地方史料，今以稿本留存的就有《陇右舆地录》十六卷、《陇右水利录》五卷、《陇右财赋录》十卷、《陇右政事录》三十卷、《陇右民族录》十卷、《陇右边事录》八卷、《陇右霸国录》四卷、《陇右学艺录》三卷、《陇右著作录》六卷、《陇右著作目》二卷、《陇右考古录》四卷、《陇右轶闻录》四卷、《陇右文存》一卷、《陇右史丛》五十卷、《甘肃丛书目录》一卷、《甘肃丛书》一百二十一种；已刊行出版的有《陇右金石录》十一卷、《校补》一卷、《补录》二卷、《拓本》二卷[⑨]。对此顾颉刚曾慨叹到：“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当扰攘之世，而有如此之卷帙，许大之志愿，可谓豪杰之士。观其所出版者，皆切实不苟，精力贯注，则其非作大言可知也。使其不从事政治，搜辑材料固无若斯之便，而其成就之精炼则无疑也。予游西北，所接读书人不多，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意外矣。”[⑩]

再次，重视听取学界同仁的意见。《甘肃通志稿》编修之前，张维先行拟订凡例和编印图志。“至其编纂大意，俱在出订凡例，前已刊行。不才在志局所编之《省县总分图》、《地理沿革图表》，列为志稿卷一、卷二者，亦已先行出版。甚愿海内通人，绳纠而指正

① 张维：《陇右方志录补》，第3页。
②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③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35页。
④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0页。
⑤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9页。
⑥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68页。
⑦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72页。
⑧《六十自述》，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9-350页。
⑨ 参见张令瑄：《甘肃张鸿汀先生遗书提要》，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43-414页。
⑩ 钱谷融主编：《顾颉刚书话》，第17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之也。”[①]方志学界强调先行拟定凡例，主要是从方志编修的实际需要出发，张维此举，更在于接受志界方家意见。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对新修志书舆图有特别规定：“旧志舆图，多不精确，本届志书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绘制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②]张维先行编印的图志，包括以1：5000000比例测绘的省总图1幅，1：200000比例测绘的县分图81幅以及自三代至民国的历代沿革图30幅。以最新科学方法绘制方志舆图，在当时究属新生事物，听取各家意见，旨在使图志更加完善。分送的学者当中可考的有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江苏图书馆馆长柳诒徵，他们分别致函：“大著陇志例目，敬以揭载馆刊”，“先生主修陇志，征存文献，宇内响望。思承典型，尚恳将采访编纂经过详赐示知，俾登诸馆刊，以扬西北倡导文教之盛旨，而勖海内各省以继起。”[③]“图志上下千古，董理沿革。宣统安志，（指宣统年间成书的由甘肃翰林安维峻总纂的《甘肃全省新通志》——引者）故所未逮。衡之他省，绾（殆——引者）无其匹。”[④]顾颉刚后来见到图志内容，也给予很高评价：“《沿革表》与《分县图》先印成，文理密察，洵可为斯学前导。”[⑤]

最后，关于方志续修，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两次提及，基本的观点是要求续志在前志的基础上补充史实即可。像道光《续增平罗纪略》，“志取道光九年后故实，依类补辑，盖续志正轨也。每见各县改修志乘，往往变乱割裂，高自炫鬻，实则朝四暮三，徒滋纷纭，终无当于志法。转不如因仍旧例，续补无断，存一方掌故，以待有识者之论列，犹为省事而传信也。”[⑥]民国《续修永昌县志》，“此志义例一仍嘉庆旧志，惟取嘉庆后建置、人物诸事，依类目分录叙之，见旧志者不复详焉，续志正轨也。”[⑦]

四、旧志的弊端陋习

“四蔽六习”是张维对旧志不足的总结。何为“四蔽”？“蔽乎古者，疏乎今也；蔽乎文者，略乎质也；蔽乎人者，轻乎事也；蔽乎钞撮者，丧乎系统也。”“六习”是指“习夫天官之说者，侈著星野事应矣；习夫堪舆之说者，侈著龙脉结穴矣；习夫神仙之说者，侈著神话传闻矣；习夫辞章之说者，侈著诗赋文辞矣；习夫方舆览胜者，侈著八景十景矣；习夫通鉴纲目之说者，侈著褒贬删削矣”。“四蔽六习”弥漫方志之域，“是故所谓详而能真者，盖十不得其一、二”[⑧]。

自唐以降，历代学者对方志弊端都进行了归类、分析，清及民国尤盛。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进行过详细讨论[⑨]。不过，讨论的重点多在史实罗列，某些方面尚有申述的必要。概而言之，旧志弊端陋习的形成，其致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人们对方志学科属性的认识、方志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传统以及特定时代的各种社会因素等。

方志在记述内容上的厚古薄今倾向，主要源于人们对方志学科属性的认识。方志属地理的观念源远流长。乾嘉时期，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更是将这一观点推向极致，他们编修方志时对现实的漠视多为后世所诟病。不过，清代朴学兴起，实是当时文化专制政策的反映，可以说严厉的文字狱将这些最优秀的学者推向了故纸堆，其方志编修主张也与此有关。

汉魏六朝的郡书、地记是方志发展定型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其内容就充斥着神话传说、神灵怪鬼的

---

① 《甘肃通志稿序》，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89-390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选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第85页，辽沈书社1983年版。
③ 《浙江陈训慈书牍》，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90页。
④ 《镇江柳诒徵书牍》，张维著，王希隆主编：《还读我书楼文存》，第391页。
⑤ 顾颉刚著，达浚、张科点校：《西北考察日记》，第2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00页。
⑦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106页。
⑧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⑨参见黄苇：《方志学》，第396-407页。

记载，旧志“侈著神话传闻”应与此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另外，郡书、地记的兴起又与当时的选举制有关，无论汉代的察举制，还是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都需要对人物的品评。在这种风气下，门第和郡望观念就被特别的强调。其实，“人杰地灵”表述背后隐藏着获取最大政治利益的企图。为达此目的，郡书、地记在编纂时就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事。除此之外，旧志“蔽乎文者，略乎质也”的不足，也与一个时代的学风有关，像明代学风空疏，学者喜好呈炫竞奇，更使方志增添了文人意趣。伴随着科举制的广泛实施，一般认为在宋代支撑门第和郡望观念的社会环境不存在了，但由血缘泛化的桑梓情结、地域观念依然存在，地方志“侈著八景十景”即其反映。方志中的“艺文”仿自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过多收录诗赋文辞，自然不尽妥当。

一志半人物。地方志重人物记述，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是受自身传统的影响。郡书多记乡贤耆旧事迹；地记要在述地、记人。其次，地方志在其发展过程中，多受正史影响。正史的纪传体本就以记人为中心。再次，儒学以德治国，在实践上就需要树立典范以确立社会行为准则。方志中的名宦、乡贤、列女等，无不是从这一目的出发。

星次与地域相对应，彼此是一个相关的整体，这是古老的“星野”观念。《汉书·地理志》将其发扬光大。方志中的“星野”或“分野”一门，也是继承这个传统而来。古代占星术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示着对应地域的人事兴衰吉凶，其中寓含着古人建构宇宙秩序的渴望和努力。堪舆亦即分水，是指宅基地、坟地的地理形势，系关一个家族子孙的兴旺衰败。这些观念，在科学昌明的民国时期自然会受到批判。

（作者：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通过终审

7月10日，《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终审会在兰州召开。《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编委会各副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张生桢、省人大副秘书长陈田贵、张掖市委书记毛生武、省军区副参谋长丁杰，参加过舟曲泥石流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的省、州、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志稿编纂人员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编委会主任夏红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军利首先汇报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编纂情况，与会人员对志稿进行了评审。会议评审认为：志稿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表述清晰，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抢险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全过程，是一部成熟的志稿。会议决定《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通过终审。

夏红民在听取有关汇报和各方建议后指出，这部志书不仅真实记录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抢险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也是弘扬正能量、发扬甘肃精神的有效平台和最好体现，更是首开我省地方志编纂专项志的历史先河，要严格按照《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相关要求，充分吸收借鉴各方意见，继续查阅资料、删繁就简、字斟句酌，力争志书文字精练、图片精美，将其打造成一部使亲历者有共鸣、对读者有启发的质量上乘的精品名志。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 陈谦供稿）

论五凉文化繁荣的原因

孙占鳌

摘　要：五凉统治时期的河西地区，由于经济持续发展，“文教兼设”战略的实施，高度重视、重用人才等原因，造就了空前繁荣的五凉文化。

关键词：五凉文化　繁荣研究

十六国时期，甘肃河西地区出现了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01-376），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386—401），鲜卑族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414），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400-421），匈奴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397-439）等五个凉国的割据政权，史称“五凉时期”。

五凉时期，是河西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在五凉政权统治的一百多年间，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空前繁荣，突出表现：

一是儒学兴盛。五凉统治者通过开馆讲学、整理刊发经典，使儒学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敦煌、肃州、凉州一带名儒办学之风盛行，宋纤、郭荷、郭瑀、祈嘉、刘昞等几位大教育家的受业弟子就多达六七千人。前凉敦煌学者宋纤隐居酒泉南山，前来求学的弟子多达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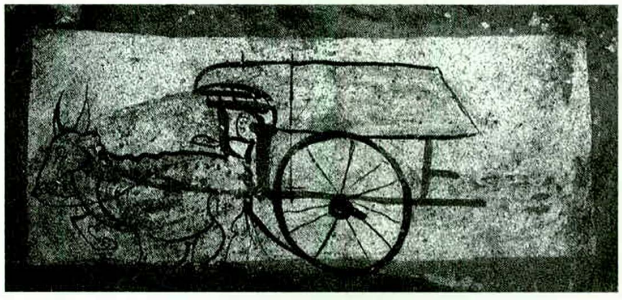
二是史学发展。五凉时期，官修、私修史书数量可观，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五凉诸国都设立史馆，或置著作郎，或置太史令，负责记载和修撰国史。仅《隋书·经籍志》《史通》《旧唐书·艺文志》及《太平御览》等史书记载的五凉史学家就有11人。敦煌史学家索绥作《凉国春秋》50卷（又作《凉春秋》），今佚。敦煌人刘昞隐居酒泉多年，潜心于典籍，著书5种共118卷、注述4种（本）。其中：著《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3卷，《靖恭堂铭》1卷；另注《周易》《韩子》《人物志注》《黄石公三略》。《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体编年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是文学繁荣。五凉文学上承建安，下启隋唐，创作成就居于当时北中国之首。作家云集，作品众多，诗歌、赋、散文等名篇佳作不少。

四是佛学盛行。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必经之地，佛教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地区传播过程中，敦煌、肃州、凉州逐渐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五凉统治者多信奉佛教，积极推广佛教。河西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佛图澄、道安及鸠摩罗什等一批大德高僧讲经、译经，弘扬佛法。河西地区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总之，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无论是佛教的传播、佛学经典的翻译，还是佛教洞窟的建造，都盛况空前。

五是艺术成就辉煌。文人书法、写经书法、音乐、舞蹈、绘画、雕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五凉文化的繁荣，打破了十六国时期中国文化持续低迷、萎缩的局面，给北中国寂寞荒凉的学术文化园地增添了异彩，在十六国时期居于中国北方文化的领先地位，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因此，



范文澜先生指出，五凉统治下的河西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①]。

五凉文化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为文化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收复河西地区后，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战略，河西地区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魏晋时期对河西的不断开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西经济的发展。五凉时期，在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推动下，河西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持续发展。

一是招徕流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人口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尤其在魏晋时期，在人口数量较少、全国都存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发展经济首先必须发展人口。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灾害频繁，人口大量外迁。当时中原人口外迁主要有两个方向：一部分迁到了向南方，一部分向社会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迁徙。史书记载，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②]。为发展生产，巩固政权，五凉统治者均采取了招徕流民的政策。西凉李嵩对流民采取设侨郡县安置的办法，《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载：

> 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治今瓜州县东）；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三郡均置今敦煌市东）。

上述记载中，西凉安置的移民达到了23000户。按当时户均人口比计算，至少在10多万人以上。加上原著居民，酒泉人口总量达到30万以上。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为经济开发提出了充足的劳力。这些新增人口中，有的是中原地区的人，有的是江汉地区的南方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和南方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推行“课农桑”政策。五凉政权非常重视农业。前凉统治者张轨颁布了“课农桑”的法令。“课”是督课的意思，即依靠行政和法律效力，驱民归农。同时，通过推行占田制将流民安置到土地上，一方面解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即租课收入，另一方面解决了流民的生活供给，最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张轨的后继者们也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张骏时议治石田，在人口稠密、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向戈壁要土地，运土殖谷；张重华也不遗余力地“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③]。

西凉王李暠执政时期，全面推行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大力发展农牧业。在继承西汉、曹魏、西晋以及前凉历代屯田的基础上，扩大屯田，“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④]。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中农、牧、林、桑等业兴旺发达，坞堡、园林相望的景象，反映出了西凉时期酒泉农业经济的繁荣。

北凉沮渠蒙逊时颁布了“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的诏令，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五凉政权还大力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如，代田法，选中育种技术在河西地区普遍推广；中原地区先进农具犁、

图1 酒泉魏晋墓画——《耕耙图》

耧、耙、杈、连枷等，在河西地区得到广泛运用。酒泉、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有大量表现播种、耕作、耙地、耧地、打场等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场景，还有大量表现魏晋时期新式农具、牛耕、畜拉铁齿耙、碎土保墒等先进农耕技术的生动场面。

三是大力发展畜牧业。五凉时期，为了保证战争对马匹的需要，各割据政权都积极发展畜牧业，以解决军需民用对牲畜的需要。西凉王李暠在宜禾、昌蒲、新乡、干齐、延寿、安弥、表氏、居延诸县建立畜产品基地，使畜牧业成为西凉的一大支柱产业。437 年秋天，北凉沮渠牧犍向北魏一次性奉献良马五百匹。北凉灭亡后，北魏将河西开辟为牧地，其“马至二百余万，驼半之，牛羊则无数”[5]，足见北凉畜牧业的发达。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家庭养殖畜牧业也有较快发展。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出土有关生产活动的壁画 89 幅，其中反映畜牧业题材的就有 38 幅。从墓画内容上看，有画羊群、牛群、马群、驼群的，画马、牛、羊于同一画面的，有画宰羊、宰牛、宰猪和杀鸡的，有画宴饮吃肉的，有画悬肉于厨的，有的画面上所画马多达 19 匹、羊多达 12 只、牛多达 6 头。总的来看，河西魏晋墓画中六畜俱全，表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畜牧业相当繁荣。

四是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蚕桑种植加工、畜产品加工和农具加工制作为主的手工业迅速发展，集市贸易日益活跃，贸易集散地已经形成。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桑蚕业的发展。酒泉、嘉峪关魏晋墓画中桑园、采桑、护桑、蚕茧、丝束、绢帛等图幅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蚕桑丝织工具图。画中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乌鸦，各族老幼普遍参与桑蚕生产场面。嘉峪关新城墓（1 号墓主人段清，曾任酒泉太守）出土砖画 660 幅，多为一砖一画，其中描述平民生活的就有 200 余幅，很多就画有桑园、驱鸟护桑、采桑饲蚕、缫丝工具、丝束等图景，形象地记载了西凉时期养蚕业的发达的盛况。

图 2 酒泉魏晋墓画——采桑护桑图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后壁左侧绘一坞壁，坞内有碉堡，坞门半开，门内立一看门奴，坞下有 3 棵桑树，树间有五位妇女采桑。墓画中亦有丝束、绢帛图。

魏晋墓壁画内容反映的是当时河西走廊真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场景和历史状况，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极高的史料价值。 墓画中众多的桑蚕丝帛画面是魏晋时期河西蚕桑业兴旺发达的真实写照。嘉峪关魏晋墓中还先后出土二十多件丝绸残片，为衣服衬里、衣面、领口、垫肩、裙带、云耳及招幡等的残件。质地有绢、绮、锦等，颜色有浅红、浅灰和淡黄色，花纹多为八字形和菱形，图案多系套色印染，其织造、印染技术堪称上乘，可与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媲美。

五凉政权建立后，都重视商业贸易活动，与中原地区和西域的商业贸易频繁。前凉张轨向西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6]。张寔向西晋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7]。五凉时期，凉州、甘州、肃州、敦煌成为河西地区大的都市贸易中心，商贸活动十分活跃，许多西域商人来这里行商。1907 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发掘出六件比较完整的粟特人信件。其中一件是西晋怀帝永嘉五至六年（312 ～ 313 年），一位居住在酒泉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康国（撒马尔罕）商人的信。信中说到粟特商人在敦煌、酒泉、姑臧（凉州）直到洛阳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些情况。信中记载，当时中原市场上主要的流通商

品有锦、绢、纱、绮、罗、刺绣等丝织品，以及铁器、漆器、铜镜等物品；从西域和欧洲输往内地的主要有玉石、各种毛织品、马、骆驼、棉布等。

五凉时期，河西郡县治所地贸易集散地也已形成。郡县治所既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各族群众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来此交易的有当地农牧民，小手工业者，有专业从事商贸活动的行商坐贾，也有沿丝绸之路到中原贸易的西域胡商。他们的交易行为受到当地政府管理和保护，如曹魏时期仓慈任敦煌太守、徐邈任凉州刺史时，都曾经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维护正常交易秩序。

另外，五凉时期河西地区一些人口相对稠密的农村已经出现集市。各族小商贩、农牧民用皮毛、粮食、牲畜、农具等手工产品，到集市上换取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赚取零售利润。

二、“文教兼设”的战略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政策保障

五凉统治者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五凉中两个汉族政权的建立者张轨和李暠以儒学文辞著称，即使前凉末主张天锡也具有令江南士大夫汗颜的言辞素养。[8]其他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都懂得昌明文教以争正朔的道理。后凉吕光、南凉秃发氏、北凉沮渠氏虽分别生于氐、鲜卑、匈奴家庭，但深知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的关系，聚集了一大批汉族士人为其经邦论道。沮渠蒙逊就曾下令“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色荒”[9]。由于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圈内，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秃发褥檀的汉学修养甚至使人叹为“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土……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10]。正因为如此，五凉统治者坚持推行了“文教兼设”的发展战略。

一是兴办学校，倡导儒学。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五凉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倡导儒学，推行教化。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成为他们传播、推行儒家思想的首要选择。前凉时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1]前凉的崇文祭酒地位仅居于刺史之下，反映了前凉政权倡导儒学的决心之大。

此后，南凉、西凉等政权也都兴办学校，倡导儒学。南凉秃发利鹿孤曾“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2]”后世史学家对利鹿孤此举极为赞誉，认为“鹿孤从史皓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13]西凉政权“立泮官，增高门学生五百人”[14]，兴办教育，传播儒学。

五凉政权在积极兴办官学的同时，还大力鼓励学者兴办私学。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私人讲学之风兴盛，一些宿儒名家纷纷开馆延学，传授各门学业，出现了拥有学生数百乃至几千人的私学。如酒泉人祁嘉，“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15]敦煌人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16]敦煌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17]敦煌人刘昞，“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18]

私学的大量兴办，不仅扩大了教育面，而且由于私学的授业者大都是造诣很深的名儒，因此，通过师承关系，形成了一些具有河西特色的学术流派。如敦煌名儒郭瑀“精通经义”[19]其学生刘昞也成为经学名家，尤长于《易》学，而刘昞的学生索敞又“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20]，刘昞的另一名学生程骏则从师专攻《周易》，索敞和程骏后来在北魏政府中任职，讲学注经。这样，从十六国到北朝，形成了一个经学流派，使河西学者的学术观点绵延后代，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官学和私学两条办学途径，使河西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当然，五凉政权此举的本来目的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儒家正统思想的统治人才，来推行礼治教化，巩固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河西教育的发展，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二是整理典籍，加强文化交流。

五凉政权为了传播儒学，组织整理了大批儒家文化典籍。北凉时配备“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21]同时，还广泛地进行图书交流，

如前凉时曾送“经史图籍于京师。”[22]元嘉三年（426年），北凉派使者下江南，向刘宋政府“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元嘉十四年（437年），又一次派使者向刘宋政府“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同时还带去了河西学者的许多著作，有“《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骄》九卷，《谢艾传》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牌》一卷，《皇帝王历三合记》一卷，《赵瞰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23]，共计二十种一百五十四卷。这些书中有经学、史学、文人别集，也有文字学、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著，内容广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五凉政权的这种献书与求书，扩大了南北方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为河西学者提供了江东学者的研究信息与成果，从而促进了河西学术文化的深入发展。

三是重视自身的文化学习。

五凉政权的统治者“崇尚文教”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十分重视自身的文化学习。

前凉的张轨曾师事名儒皇甫谧，史书称其“明敏好学”，深受当时文学大家张华的赏识和器重，誉之为“二品之精”；其子张寔“学尚明察”，张茂“虚靖好学”，其孙张骏更是“十岁能属文”[24]，长于诗文。后凉的吕光也是能诗善文，史书记载他在攻破龟兹城后，曾“大飨将士，赋诗言志”[25]。从《晋书》本传存录的《平西域还上疏》《下书讨乞伏乾归》《遗杨轨书》三篇文章来看，尽管都是应用文，但很有文采。

西凉的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他曾手书诸葛亮训诫以勖勉诸子：“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荀迁来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经人，道师于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26]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要求诸子勤奋攻读，并从中吸取立身之道，治国之术。他还亲自动手修补残破图书，“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并对侍臣说：“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箱”●。李暠写有《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数十篇诗赋，其中保存下来的《述志赋》，长九百二十余字，感物抒怀，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抒情赋的上乘之作。

北凉的沮渠蒙逊也是“博涉经史，颇晓天文”[28]，他曾专门写信给刘宋王朝的司徒王弘要求替他找一部干宝的《搜神记》，结果王弘请人抄了一部送给他，满足了其要求，从中反映了他对学习文史的爱好。

五凉政权统治者重视自身的文化学习，使得他们中间不少人本身就成了文人学者，如前凉的张骏、后凉的吕光、南凉的秃发归、西凉的李暠等人都可列入十六国文学家而当之无愧[29]。统治阶级对学习文化的爱好，对形成重视文化知识的良好风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这种良好风尚又成为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陈寅恪先生指出“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因此，而文化学术亦不因此沦替”[30]。由于统治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昌明的文化教育政策及各项举措才有可能形成和贯彻，浓厚的尊士重教的学术风气才能够得以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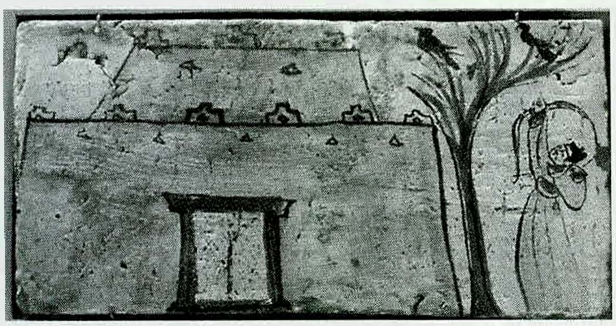
三、重用名人硕士的举措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人才基础

五凉政权对儒家知识分子尤为重视。前凉张轨曾“令有司推详立卅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具状以闻[31]”，将大批儒家知识分子请进前凉政权任职。此后，南凉、后凉、西凉、北凉诸政权也都重用儒学人才。南凉的秃发乌孤曾大

规模地收罗儒家知识分子，“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训、郭佚，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麹丞明、郭黄、史皓、鹿皓，文武之秀杰；梁昶、韩延、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晃、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32]从这一长串名单中可以看出，有不少人是儒家知识分子，在南凉政权中受到重用。

西凉李暠更是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33]，广泛地吸收有学之士，“博通经史”的敦煌人宋繇，在西凉政权中“历位通显”[34]，敦煌名儒刘昞官至“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李暠对他说：“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35]，足见其对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

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的是卢水胡建立的北凉政权。敦煌人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沮渠蒙逊“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36]；敦煌人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沮渠蒙逊以其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37]；敦煌人阚骃“搏通经传，聪敏过人……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38]；金城人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39]；金城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键时，为金部郎”[40]。即便是对曾在西凉政权任职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予以重用。如敦煌人宋繇仕于西凉，及“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41]，临死前又寄以托孤重任；再如深得李暠信任的刘昞，“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还专门为他“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其子牧键时更是“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42]。由此可见，凡是学有成就的儒家知识分子，只要北凉政权能得到，都加以重用。



后凉氐族统治者吕光以残暴著称，但却重用儒学人才。宗钦、宋繇等人都曾在后凉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博涉史传”[43]的著作郎段业曾作诗讥讽吕光，吕光“览而悦之”[44]，反映了吕光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尊重态度。

五凉政权重视、重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重用本土士人。

西汉以后，徙居河西地区的汉人逐步形成为当地土著群体，出现了一些有名学者，如被誉为“凉州三明”[45]的敦煌张奂、安定皇甫规、武威段颖，以才学宏博知名显达。西晋时，索靖、汜衷、张甝、索紾、索永“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46]。这些河西士人群体不仅身居高位，而且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代表着河西地域文化体系。

张轨出牧凉州之初，为确保立足河西，采取“拔贤才”的政策，广泛征求高才硕学、通涉经史之有识之士：“以宋配、阴充、沮授、阴澹为股肪谋主”[47]。到了张骏、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还曾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后凉吕光虽然统治残暴，但也重视人才，河西名士宗钦、宋爵就曾在后凉政权出任要职。南凉秃发乌孤广泛招揽人才，实行汉化，他模仿汉制，内设台省，外置郡县，建立起了以秃发氏为核心、以河西士人为骨干的南凉统治集团。西凉大量启用土著士人，如唐瑶、郭谦、索仙、尹建兴、张邈、张条、阴亮、祀德瑜、令狐赫等都身居高位[48]。沮渠氏北凉政权多以土著士人为显官，沮渠蒙逊对河西士林领袖刘晒崇礼有加。他在攻克西凉都城酒泉后曾说“孤不喜克李散，欣得宋舞耳！”[49]并且将宋娇“委以诊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键委托之”[50]。沮渠牧键还因刘昞博学，尊之为国师，为他专“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月致羊酒”[51]。

礼待和重用土著士人对于五凉诸政权的稳定，发展河西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给河西的豪门著姓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

二是广泛网罗人才。

五凉时期，河西避难者中的一大批中原世家名流，如河东裴氏、关中苏氏、太原王氏、洛阳赵氏等，携带了不少典籍。张轨对此采取了积极接纳和妥善安置的态度，从中选拔录用了很多中原人士。河西地区因此也聚集了大量人才，史料称“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52]。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打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53]。陈寅恪先生还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54]。

五凉其他政权也都中用中原人才，就连胡气很重的南凉也莫不如此。史载南凉政权组成人员中“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55]一时学者云集，人文辐辏：“区区河右，而学者坍于中原”[56]。

五凉政权对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使用，不仅推动了河西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吸引了大批中原学者奔往河西，如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陈留济阳（今河南开封东北）人江琼、广平曲安（今河北曲周东北）人程骏、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等，都纷纷来到河西，这样，又壮大了河西学者的队伍，为河西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有用人才。

结语：五凉文化的繁荣，得益于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得益于“文教兼设”发展战略的推行，得益于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重用。这是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充要条件，值得学习借鉴。

注释：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65，343 页。

②《晋书》卷 86《张轨传》。

③《晋书》卷 86《张轨传附张重华传》。

④《晋书》卷 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⑤［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卷 97《北凉录》，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618 页。

⑥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

⑦《晋书》卷 86《张轨传附张寔传》。

⑧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第 93 页。

⑨《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五北凉录，商务印书馆 1937，第 657 页。

⑩《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南凉录，商务印书馆 1937，第 624 页。

⑪《晋书·张轨传》。

⑫《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

⑬《晋书·秃发氏载记史臣曰》。

⑭《晋书·李玄盛传》。

⑮《晋书·祈嘉传》。

⑯《晋书·宋纤传》。

⑰《晋书·郭瑀传》。

⑱《魏书·刘昞传》。

⑲《晋书·郭瑀传》。

⑳《魏书·索敞传》。

㉑《魏书·阚骃传》。

㉒《晋书·张轨传》。

㉓《宋书·氐胡传·沮渠蒙逊传》。

㉔《晋书·张轨传》。

㉕《晋书·吕光载记》。

㉖《晋书·李玄盛传》。

㉗《魏书·刘昞传》。

㉘《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㉙ 参见曹道衡《十六国文学家考略》载《文史》十三、十四辑。

㉚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1，第 30-31 页。

㉛《晋书·张轨传》。

㉜《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㉝《晋书·李玄胜传》。

㉞《晋书·宋繇传》。

㉟《魏书·刘昞传》。

㊱《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㊲《魏书·张湛传》。

㊳《魏书·阚骃传》。

㊴《魏书·宋钦传》。

㊵《魏书·赵柔传》。

㊶《晋书·宋繇传》。

㊷《魏书·刘昞传》。

㊸《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㊹《晋书·吕光载记》。

㊺《后汉书》卷六五段频传，中华书局 1965，第 2154 页。

㊻《晋书》卷六十《索靖传》，中华书局 1974，第 1648 页。

㊼《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中华书局 1974，第 2221 页。

㊽《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书局 1974，第 2259 页。

㊾《魏书》卷五二宋弁传，中华书局 1974，第 1153 页。

㊿《魏书》卷五二宋弁传，中华书局 1974，第 1153 页。

(51)《魏书》卷五二刘昞传，中华书局 1974，第 1160 页。

(52)《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纪五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中华书局 1973，第 3877 页。

(5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 2001，第 30 页。

(5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 2001，第 23 页。

(55)《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中华书局 1974，第 3143 页。

(56)《北史》卷八三文苑传，中华书局 1973，第 2778 页。

（作者：甘肃省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天水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部署全市地方志工作

2016 年 7 月 18 日，天水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天水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安排部署了全市地方志工作。杨维俊市长要求：一要高度重视修志工作。修志是“一把手”工程，行政“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自过问、亲自督促、亲自安排修志工作。不能把这项重要工作耽误，把这么重要的部门弱化。修志部门不是一个闲单位，工作很辛苦。社会应尊重，自身要自豪。二要切实加强修志的工作力量。从社会上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老同志，抽调一些素质高、责任心强、能吃苦、有特长的干部参与修志工作。要使修志工作者有荣誉、有成就感。人社局要做好相关工作。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修志工作需要必要的经费、设施和办公条件。要加快相关区域拆迁，统筹规划，搞好市方志馆等文化设施建设。四要以科学的态度做好修志工作。要有创新，利用“互联网+”，打造“数字方志”、“智慧方志”。五要做好市志的整理和挖掘、利用工作。六要经费上予以重点保障。列入预算的要及时足额拨付，没有列入预算急需解决的经费，要予以重点保障。必要的经费在这样的单位能起大作用，财政局要研究支持。市发改委要将地方志工作列入全市“十三五”总规划。七要按进度完成编修的志书。2019 年要完成二轮修志，要重视年鉴、大事记编写，年鉴要公开出版，大事记要及时整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甘肃省天水市地方志公室 台志杰供稿）

千年黄河渡

张国藩

黄河由巴颜喀拉山麓的卡日曲，浩浩向东5464公里至山东垦利注入渤海，其中在甘肃境两进两出，流经2州2市14个县（区），全长882公里。重要支流有大夏河、大通河、庄浪河、祖厉河、洮河、渭河及泾河等。流经区域包括今甘肃的陇东、陇西、甘南的全部。这一区域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而且在中国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栈阁、伸臂梁、悬索、革船、皮胎等技术就由生活在这里的羌、氐民族所创造，并延用至今。其中的革船、皮胎技术就是利用丰富的牛、羊皮资源而发明的渡河工具。

黄河是横亘在中原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在千百年的交往过程中，他们相地势、看水情，选择过河地点，久而久之，这些过河地点完全固定下来，并被后世所延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渡口。随着交通的发展和人流、物流的增加，这些渡口一般会成为码头，大者为城，小者为镇，是一个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渡口临城镇者为官渡，临村而设的为民渡，或称散渡。渡运工具由最早的牛羊皮胎演变为皮筏，再到木质船、钢质船，安全性能越来越好。

自汉通西域，在黄河上设置渡口就有了明确记载。随着丝绸之路陇西段三线的开通，汉王朝依次在今临夏、兰州、靖远境内黄河设置了渡口。其中设置最早的渡口应是金城渡，即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征匈奴之时。此后黄河上的渡口有所增减，但大体位置基本未变。

黄河古渡

玛曲渡口 在今甘南州玛曲县城南5公里处黄河首曲。玛曲渡为古代吐谷浑道、于阗贡道通松潘的要津，历代不衰。北周曾于此设郡。渡口工具为马拉船。即将木板拼成方形木箱，里面包裹牛皮，船头系绳，岸上一二匹马拉曳过河，故称“马拉船”。玛曲还有一种过河方式，即赶牛下河，人骑于牛、羊皮胎，一手扯牛尾，一手扶皮胎。皮胎内一般填充货物或充气。这种过河方式很危险，稍有不慎便溺水而亡。1953年，当地驻军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皮筏浮桥。1985年浮桥冲毁，甘南公路段修建了码头，建造了一艘木质船，用于渡运人畜、车辆。1965年出于安全考虑，改为铁制机动船。设玛曲渡口管理所进行管理。1979年玛曲黄河大桥建成，玛曲结束了黄河上无桥靠摆渡过河的历史。

大河家渡口 古称积石渡，亦名临津渡、河关。位于积石山县境内的黄河岸边，俗称黄河上渡，是甘肃早期渡口之一。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游时，曾经“积石之河南”。《黄河志》载：“州以外立贡赋，若昆仑、析支、渠搜三国，则由积石已达河。”把上述记载与夏禹“导河积石”联想起

来看，积石古渡之置最早。汉宣帝神爵二年（60年）在这里设河关县，并设有官亭、烽燧。汉献帝中平元年陇西人宋建割据枹罕（今临夏西），自称河首平汉王。汉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命夏侯渊灭了宋健。夏侯渊又派张舒渡河关，入小湟中。蜀汉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派魏延由枹罕经河关过黄河入湟中。十六国前凉时期由此置临津县，此渡亦名临津渡。东晋太和元年（367年）羌人敛歧叛前秦，投降割据陇西的李俨，前秦、前凉发兵征讨。前凉王张天锡亲率一路由临津过黄河进军河州。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张掖，由临津渡河。唐文成公主由此进藏联姻。运去了大批的籽种、绸缎、书籍，其中还包括释迦牟尼12岁身量金像。元朝于此设积石州。明改为黄河上渡，有官船2只，水夫20名。清以后降为民渡，有民船1只，渡口亦因地名而易名大河家渡口。

莲花寨渡口 位于原永靖县城，今没入刘家峡水库。莲花寨渡口是古河州通兰州、碾伯（今青海乐都）路的主要津渡，北宋易名安乡关渡，时渡时桥。宋熙宁六年（1073年），知州景思立进军时在这里筑安乡关，修建浮桥，以护湟、鄯之路，不久改为渡。元符二年（1099年）王韶被困青塘，宋两路驰援，宋将姚雄重建浮桥。不久又变为渡。崇宁三年（1104年），北宋收复湟、鄯二州。知州刘仲武再次修建浮桥。其渡在炳灵寺下游至唵哥集以上河段，后遂渐下移于莲花城上游2里许的哈脑河沿，俗名哈脑渡。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年），河州知州刘卓设官船2只，水夫6名，有千户1员把守，并更名为莲花寨渡口。清降为民渡。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河州知州王全臣在莲花渡附近的黄河两岸，增设潘家、黑城等渡口，各有民船1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知州杨增新重修莲花堡，整治莲花渡口。民国时称黄河下渡。河州庠生蒋步颖曾对哈脑渡题诗云：

河畔石矶河内船，风渡日日客年年。

北人南去南人北，于岸诞登俱杳然。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王震兵团数万人即由此渡河。

祁家渡口 位于刘家峡水库下游，是国道213线上的重要渡口。北岸为永靖县，南岸为东乡县。1972年购置60吨铁驳船和38吨拖轮，后经几次改建。2001年，省交通厅投资232万元，建造一艘汽车滚装船，渡运能力大大增强。祁家渡口由祁家渡口管理所管理，年渡运汽车三四万辆，是省内最大的公路渡口。

金城关渡口 位于兰州西固区黄河南岸，是由关陇通河西的主要津渡。东汉末张既入河西，平定卢水胡之乱，即由金城渡河，前秦苻坚命苟长、梁熙军伐前凉，“苟长济自石城津，与梁熙等合攻前凉缠缩城（今永登南）”。后秦置军2万人防守，以护河西通道。北周武帝改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金城关。唐金城渡口移至于今黄河铁桥处，并置金城关，以扼凉州之路。明改渡为桥。隋金城关在明代改为青石关，地名仍存。

在今兰州市河口一带还有新城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西征河西，数次在这里济师。八盘渡，在八盘峡附近。汉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曾在此渡河。

鹯阴渡口 又名虎豹口，此渡位于平川区黄湾下村（一说靖远县祖厉河入黄河处）。因在汉鹯阴县而得名。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西临祖厉河而还”。居延汉简《传置道里簿》第二栏“至高平八十里”，第三栏“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高平即今宁夏固原，媪围在今景泰县南黄河边。由高平到媪围必过此渡。东汉建武八年（32年），刘秀再攻隗嚣，河西窦融率五郡太守及小月氏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至高平（今宁夏固原）晋见光武帝，会攻隗嚣，隗嚣大败，窦融大军即由此处渡河。东汉末张既平定卢水胡在金城渡河，手下将士劝阻“未可深入”。卢水胡探听到这一消息后，以为张既在鹯阴口渡河，于是在这里布了7000骑兵。张既将计就计，佯渡鹯阴，暗中从金城渡河。后凉吕光时，主薄尉佑叛，其军居鹯阴以应。可知鹯阴渡口是金城渡以下的一个重要渡口。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在这里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

小口子渡口 位于靖远县东北170里的石门乡小

口子村附近的红山峡口，这里地处红山峡狭谷地带，黄河至此折向北流，两岸高山陡峡，河道狭窄，是汉以来重要的渡口。明朝曾两次建桥，均为洪水漂没。清乾隆年间，由客居哈斯吉大商人胡正宽倡议，改建为渡，傍设哈斯吉堡。一度成为北路商旅必经津渡。

乌兰渡口 唐时乌兰路最主要的渡口。位于今靖远县东120公里处。西魏大统间，渭州刺史朱可浑道率3000人，由此渡河去灵州（今宁夏灵武）。唐在这里设会宁关，在对岸设乌兰关。《敦煌遗书·水式部·会宁关》载:“会宁关有船伍拾只...勿令北岸停泊。”按唐朝规定，会宁关渡工不下200人，每天渡河在千人以上。吐蕃占领河西后，常由此渡河沿乌兰道入侵关陇。唐宪宗八年（813年）吐蕃人欲在此建桥，朔方人常常将木材推到河里。吐蕃人得知朔方节度使王佖是个贪官，便厚赂王佖，并力桥成并建城堡一座。遗址至今仍存。明清时，乌兰渡废，上移至30公里处的索桥。索桥渡亦是汉以来古渡，明清成为最繁华的渡口之一。

此外，黄河干流的渡口还有甘南玛曲的木西河渡、阿万仓渡、齐哈玛渡、欧拉渡等；兰州的小川渡、小寺沟渡、钟家河渡、马滩渡、黄河沿渡、教场河渡、段家湾渡、拱星墩渡、东岗镇渡、红古崖渡、石嘴墙渡、白石头河渡、一条城渡（大川渡）等；白银的平滩堡渡、红咀子渡、蔡子滩渡、阎家渡、黄河湾渡、兆卜古渡、葵峪口渡、沙金坪渡等。民国34年（1945年）在碱滩设安宁渡，有渡工31人。次年，改建为机动渡船，一次可渡运两辆汽车。

洮河渡口 洮河渡口主要是临洮城西渡，是由陇西进入河州、青海一带的主要渡口。秦汉时设渡。宋熙宁五年（1072年）改渡为桥。唐汪川渡口，又称康家崖渡口，在河州（临夏）东100里的唐汪川白崖，俗称白崖渡，为河州通往兰州的重要津渡。明朝曾建过弘济桥。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御史刘翀设船1只，水夫4名。次年御史卢问之在渡口修公馆一所，迎送行旅。明末船废，以筏济渡。清圣祖康熙十三年（1704年），知州王全臣和监督同知郭朝佐捐资置船，以济行人。

洮河经过的临潭、卓尼、岷县和渭源、东乡、临洮、永靖县还有扎古鲁、术布、卡车、大族、柳林、木耳、新堡、总寨、纳粮、西寨、堡子、将台、马港口、红柳滩、洮砚、峡城、苟家滩、西坪、卧龙、达坂等小型民用渡口。值得一提的是，岷县境内有一种绳船渡口，即两岸置桩，横系巨索，索贯圆毂，联缀船体，行者挽缆踏船，则圆毂滑转，船依索而行，安全平稳。龙王台、哈撒等处就是绳船渡口。

渭河渡口 唐杜甫《秦州杂诗》云:“船人相近报，但恐失桃花。”说明唐代在渭河摆渡是很普遍的。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西宁道杨应琚赴京述职，途经秦州，从东柯谷口乘船渡渭，前往清水。他在日记《据鞍录》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临渭河，波澜汹涌，用方舟可济，不复前日之涓涓细流矣！”渭河渡口主要在夏秋盛水期设置，主要用木船、牛皮筏、羊皮筏摆渡。民国24年(1935年)，华双公路建成通车，在南河川建渡口，摆渡过往汽车。民国29 年（1940年）改渡为桥。民国36年（1947年）南河川桥被冲毁，将兰州黄河渡口一只双车渡船移至南河川，恢复渡运。次年桥梁建成，渡口撤销。渡口一直沿用至1955年。

渭河上渡口较多，北道区有裴家峡、王家庄、余家峡、八土河、峡口、潘集寨、南阳、南集、渭滩、白家庄、石谷川、底川、桑家门、水关、史家窝、阎西、吴砦、岭西、巨寺庄、虎朝湾、集村、咀头川、白青里、龙凤、沙川、月森、闸岭、牛背等32处，甘谷县有城西关、邱家峡、洛门等3处。其中，北道区的潘集寨渡口民国前是秦州通清水的重要渡口，称“渭水渡”。此外在泾河及其支流汭河、蒲河、达溪河、马莲河在丰水期亦设有渡口。

政平渡口，位于宁县政平堡陕甘交界马莲河与泾河交汇处。清代设木船一艘，可乘渡10人，是宁县到长武的捷径。东西河渡口分别置于环江和东河，位于今庆城县东面和西面。清置船各一艘。龙王庙渡口，位于灵台县汭河与达溪河会合处，为古渡口，清有官船渡人。泾川县境内泾河、汭河上设有渡口，水工工资由县府发放，每月每人二两六钱。

渡口文化

渡口设置必是两岸宽阔、地方平坦、水深且缓，而且是道路必经之处。丝绸之路陇西段南北中三线过河的地点两千年间大体未变，即：南线在河州炳灵寺，中线在兰州，北线在靖远。当然过河的具体地点有时候据水情或军事、经济需要有所更移。但不管怎样，渡口一旦设置，大都比较稳定，一般能维持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运营。宋夏对峙时，南线炳灵寺渡通阻无常，王韶开熙河路后，于阗供使只能通过玛曲渡由松潘转道建康。玛曲渡口由此兴盛。后来蒙古军队攻取川蜀，皆由此渡。明朝河西驻军数万人，每年所需10万石军粮由陕西汉中和中原供给。明初，将大批粮食屯于平凉，再由平凉转运兰州、河西，路远且险。明宣德七年（1432年），朝廷采纳陕西参政杨善建议，改造“迭烈逊黄河路”，即从开城（宁夏固原）西北行，过海源，干盐池，抵靖远迭烈逊渡口（黄沙湾），渡河运往河西，比走兰州一线捷近500里。从此迭烈逊渡口成为北线通河西的重要渡口，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被索桥渡口替代。

渡口是交通要津，势必为兵家必争之地，建城设防遂成为必然。自秦汉以来，傍河修建城池十数座，设州建县，派驻大量兵力进行防守。主要有：滨河郡，北周置，故址即今玛曲县城卓格尼玛。元为纳怜站道必经之地，设木赤站。明设尕甘都司。河关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59年）置，据临津渡约西10里处石门，今称关门。凤林县，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年）置。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移乌州（汉白石县）寄治于此。贞观十一年废州，改为安乡县。玄宗天宝元年复为凤林县。后为永靖县治，今没入水库。凤林县就在凤林渡口处。允吾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置，为金城郡治，今永靖县城上下古城即是。金城县，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置，位于石城津以东，城北门临河，故址在今兰州市西固区。前凉张寔徙金城县治于今兰州城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置兰州总管府，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为金城郡，金城县改名五泉县。城北门临河，西七里处即为渡口，后移至城北门，与金城关相望。明兰州为肃王府所在地，清为陕甘总督驻地，兰州遂成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榆中县，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故址在今榆中县金崖乡距黄河不远处。勇士县，西汉建，频临黄河，故址在今榆中县青城。西晋末年，乞伏氏依据勇士、榆中建立西秦国。宋狄青筑堡于此，当地人称条城或青城。会州、会宁县，本汉鹑阴、祖厉县地。北周太祖宇文泰为西魏丞相时于废帝二年西巡置会州，故址即今靖远县城。隋唐曾改州为西会州，县为凉州县。鹑阴县，西汉置，县治即今平川区水泉堡的陡城堡，遗址仍存。东汉改为鹑阴县。媪围县，西汉置，河在县南，故址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吊沟村之麦窝古城。

除了在重要的渡口设郡置县外，还在这些地方设置关隘，著名的有：河关、安乡关、金城关、乌兰关等，历代不衰。

随着移民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黄河沿岸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村镇、商埠，成为方圆百里的物资集散地，即所谓的水陆码头。如榆中县的青城，本是汉以来的河防要地，自明初屯兵以后，这里慢慢成为兰州最大的水烟种植加工基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其中有一路即用皮筏从青城装货顺河漂流到银川、包头，再由骆驼运往北京、天津。长途货运皮筏长20米，宽7米，载货20-30吨。短途运输一般由十个皮胎组成的皮筏即可，皮筏最多时达134条，另有少量木船，最多时有10条。陆路是水烟运输的主要方式，一般销往新疆、青海及长江以南各省。青海水烟以质优、味美，直接催生了中国水烟文化，水烟从选种、种植、制作、运输、销售、烟具工艺、吸食技巧等形成了一整套的产业链条和礼仪规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以吸食青城水烟为荣。清末太监马德清在《清宫太监回忆录》中写道：“主子吸水烟的时候，你得跪在地上，把仙鹤腿水烟袋用手握紧，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随时装烟，你得掌握好点火时间……（主子）一般是饭后抽兰州水烟，平时抽旱烟，用不着主子的吩咐，到时候就准备好捧上去。”水烟使青城富甲一方，清乾隆时有水烟作坊100多家，人口三万多，会馆、商行字号林立，庙宇星罗棋布，四

合大院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边。青城书院规模宏大，培养出了11名进士（其中一名为翰林），29名举人，82位贡生和众多的秀才。

靖远石门小口子索桥渡口立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山陕修路碑》，记述了客居哈斯吉的大商人胡正宽倡议修补渡口道路事，参与捐赠资修路的涉及2省、7府、3州、30个县180家商行字号。索桥南5公里哈斯吉（蒙语“玉”之意），是当时靖远北部的商贸集散地，仅车马店就有18家，店费“日收斗金”。小口子渡口清代有庙宇24处，行栈、车马店、商行数十处。

渡口不仅仅是商贸集散地，而且是中西文化传播之所。自汉开西域以后，中西商贸经久不衰，渡口经济不断迎来新的高峰。如靖远水泉渡口，明代盛极一时。《建设水泉堡碑记》载：“边商之飞星运转，边商之蚁攘蜂熙，咸于此假道托宿，迎送边驰者，苦无宁日”。中外使臣是促进中西关系的又一重要方面，仅北魏黄兴四年（1470年）以后的60年间，活动于河南（今甘南一带）的吐谷浑与北魏互派使者有56次。渡口在宗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为明显。西晋朱士行、东晋法显、北魏昙无竭均经金城渡黄河到天竺取经；北魏宋云从积石渡黄河遍历天竺。唐玄奘在金城渡黄河，游历五印度。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上，炳灵寺石窟是黄河渡口文化的一个典型。炳灵寺位于永靖县城西南35公里处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中，窟前即为炳灵寺桥渡。石窟开凿于西秦，至明代历代增修，共有窟龛200多个，造像700多个，高者28米，小者25厘米。历代造像题材丰富，风格各一。“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墨书题记，是我国石窟中发现最早的题记，有极高的考古学价值。

古代渡口一般都是关防重地。干线驿道上设渡的地方必有驿站、关防、城池，三位一体。如兰州北岸的金城关，建在九州台支脉伸入黄河的白马浪的半山腰上，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金城关为津关，即有城，有关，城内设驿，驿内有楼，唐时称临河驿楼。由此出关可取道河西走廊。唐天宝十三载（754年），诗人岑参过河住临河驿，登楼吟有《题金城临河驿楼》：

古戍依重险，高楼接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忽如江浦上，忆昨捕鱼郎。

除了临河驿楼，围绕金城渡及后来的镇远浮桥，兰州还建有许多河楼，如唐代金城北楼（北城墙），明代望江楼（九州台）、望河楼（桥南岸）、拂云楼（肃王府北城），清代荡喧楼（桥南迤西，与金城关相峙），这些楼成为文人雅士登吟抒情的好去处，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

渡口的军事战略性，决定了渡口地带居民的移民性。每遇战争，渡口一带的居民不是惨遭杀戮，就是逃亡殆尽。战争结束后，又移民实渡。现在甘肃大型古渡附近几乎找不到土著，全部为明清时期迁来的移民。这些地方虽经数百年的发展，但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大河家渡只能看到穆斯林文化；康家崖渡和对岸的唐汪渡是汉、回两种文化；青城则带有明显的江南风情。且往往姓氏庞杂，少者数姓，多者十数姓。

渡口有官渡、民渡之分。官渡费用在地方财政费内开支，以渡口等级设渡船和津吏数量。民渡由两岸村社居民自行筹资建造，共同协商管理。洮河康家崖渡和唐汪川渡本为一渡，后分设两渡，由汉、回两族分别经营管理，互不干涉。渡口中有一种免费渡运人畜的，称之为义渡。义渡所花费用，由渡口初建时剩余捐款生息而来。

渡口是古代连接两岸的最基本的交通基础设施，它虽具有经济、便捷的一面，但也有运量小、费时长、不安全的因素。故每逢大的战争，渡口就显得极不通畅，往往要临时搭建浮桥，以济兵马。明清以后，浮桥基本取代大型渡口，便利了两岸交通。而今，黄河桥梁已有数十座，天堑黄河变通途。公路渡口除刘家峡祁家渡口外，在边远农村仍可见到渡运的影子。但我们相信，随着“渡改桥”工程的进一步加快，渡口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交通方式，将完全走入历史，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作者：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史志办副主任）

甘南地区历代金石文献辑录综述

张俊立

作为地方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金石碑铭在甘南藏族自州境内也有比较丰富的遗存，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这是与该地区具体的历史文化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和全省、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甘南地区的金石文献在历史上也遭遇了许多自然和人为的毁坏，致使许多前人心血付之东流。令人惊奇的是，象甘南地区仅有的唐碑洮州《唐故大将军李公之碑》与《唐洮州石堡城战楼颂碑》这样雕刻精工、富丽宏伟的巨制，二者各于山野原址竖立千有余年，原物居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唐之后，甘南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能与之比美的碑刻宏制。只是后者于民国初年被美国传教士盗运至大洋彼岸的美国。现在，最大限度地搜集和整理历代遗存金石资料，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甘南地区的金石文献，清末以来，不断有人搜集编录。最早辑录的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洮州厅志》之卷十四《金石》、卷十五《艺文》等处，不但收录了部分重要金石文字，而且著录了部分碑刻目录。其中所收录金石文献年代最早者为唐碑，有确切纪年的为天宝八载（749）。最晚止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全书共收录钟铭1篇，碑文20篇(包括一碑两文)。此外，所录碑目14条，今已或者碑、文俱佚，或者仅存其文。《洮州厅志》所收录金石文字其实物基本分布在今临潭县境内，尤其集中在今临潭县新城镇及其周围，个别在今卓尼县境内。今舟曲县虽然有较多历史金石遗存，但由于绝大部分区域不在洮州厅辖区，洮志大概因此未予收录。如果说，由洮州厅同知张彦笃主修、曾任广东崖州知州的临潭进士包永昌总纂，编修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洮州厅志》，作为方志，依其体例，首开甘南历代金石文献辑录的先河，那么谁又是辑录甘南历代金石文献的第一人呢？《洮州厅志》编修前，未见相关辑录。而署名分纂《洮州厅志》者，分别是临潭人举人宋育辰、贡生吕芳规、贡生祝昌龄、廪生汪映奎。该志虽然没有载明分纂四人具体分工，但第一位辑录甘南历代金石文献的无疑是他们当中的一位。自然，《洮州厅志》是集体成果，但分纂者各有分工、主司相关卷目内容的编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目前仍流传于世的祝昌龄墨迹中，发现有其亲笔誊录的个别碑文及碑目，据此，似乎有理由说祝昌龄公应该就是辑录甘南历代金石文献的第一人。

民国时期，陇上著名金石学家张维辑录《陇右金石录》，其中涉及今甘南的共14篇，大部分未出《洮州厅志》收录范围。所录文献时间止于明代。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收录的平凉赵时春撰《凤山书院记》（录自《浚谷集》）一文，却为《洮州厅志》不载。据此碑记载，洮州凤山书院始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碑立于次年。这在甘肃的古代书院中，也算是比较早的了。《陇右金石录》对今舟曲县境内金石遗存亦无只字提及。1942年，临潭县政府组织人力，编纂《临潭县志》，虽未正式刊印出版，但内容颇为详实，其中《艺文》一卷，所保留数篇清代碑文，个别碑文未见此前史籍收录。

此后及今，不断有学人及地方史志搜集编著。或精考一石一金；或广搜细求，增补订正，结集成册。或着眼一县之内，或立足全州之域，辑录数量不断增加，编订质量不断提高。在全省第一轮地方志编修过程中，甘南各县市志中，均辑录了少量具有代表性的本地金石文献。原甘南州博物馆馆长李振翼先生，长期致力于甘南考古及文史研究，在甘南历代金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甘南地区非常有价值的唐碑《唐李将军碑》，之前录文缺字甚多，李振翼、马明达《“唐李将军碑”考略》根据原碑重新辨析考订，增补文字超过原有录文。李振翼《甘

南藏区考古集萃》（民族出版社，2001.11.）内列“碑碣、摩崖刻石”“馆藏、传世文物”等章，对全州范围内重要金石遗存做了扼要介绍。兰州大学吴景山教授《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10.）一书第一次对甘南州境内的历代金石遗存做了全面的搜集整理，共收录甘南境内金石文献121篇，其中包括一少部分碑、文已佚之碑目。时间上起唐代，下至当代。所收文献遍及甘南州七县一市，而以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为多。

近年来，临潭、卓尼、舟曲三县各自辑录本辖区遗物遗文，均有所成。其中，舟曲县文化馆编“多彩的舟曲文化”丛书之一《舟曲金石录》（2011.12.），将辖区内重要金石遗存文献34篇，以简介、原物照片、拓片、繁简两体碑文等四种方式予以存录编著，胶版彩印，图文并茂，制作精美，极富价值。卓尼县文化馆亦将本辖区资料极尽搜求，得29篇，汇编存录，弥足珍贵。所有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辑录编著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011年，拙作《临潭金石文钞》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内收唐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各类金石文献76篇。此后，本人受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张克复会长委托，按照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的编纂要求，开始编撰《甘南金石录》，作为系列丛书《甘肃省金石录》的分卷。在编撰过程中，将整个甘南地区金石遗存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所有金石原物资料，在参考前人时贤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亲见亲录，再行搜集考校，订正讹误，并多有增益。访求碑石，多在野外。有些地方，则始终未能亲往。如为实地查证舟曲翠峰寺碑石，数次远道前往，均因山高路险未能如愿。又只身前往九巅峡，考察峡中摩崖石刻，也因山路艰险，中途而反。期间周折，难以尽述。全书共收录金石文献192篇，另附原文佚失金石目录33条。所收金文资料始于西汉，讫于当代；碑石则始于唐，讫于今。从明代开始，几乎各代各期俱有金石遗存。而明代之前，不论金、石，各代或有或无，不相连续。在这些金石文献中，有部分藏文碑文和金属质印章。在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临潭、卓尼、舟曲三县，尤其以临潭县最为丰富。从全书收录情况来看，临潭金石资料的数量几乎占全州的一半。遗憾的是，除舟曲几乎所有辑录文献均有拓片外，所录其他各县市金石文献拓片较少。深入研究这部分地方历史文献，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解读到甘南地区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民众生活的诸多细节、甘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以及今日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和进步。目前，《甘南金石录》即将作为系列丛书《甘肃省金石录》之一卷，与其他部分地区分卷先期出版。愿此书的出版有益于甘南金石文献更全面地辑录整理和更深入地研究。

（作者：甘肃省临潭县档案局原局长）

《甘肃省志·测绘志（1991—2015）》编纂工作实施方案通过评审

7月15日，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召开《甘肃省志·测绘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及经费预算评审会。专家组成员听取了测绘志编志办有关情况汇报，审阅了实施方案及经费预算文本，经质询和讨论，一致同意实施方案和经费预算。

评审专家一致认为，《甘肃省志·测绘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甘肃省志第二轮编纂方案》、《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2015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甘肃20年来测绘地理信息发展实际编写，篇目大纲主题明确，结构紧凑，内容翔实客观，组织计划可行，总经费预算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预算基本合理，明细预算符合实际，能够指导新修测绘志编纂的实施。

（甘肃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杨战青供稿）

清水县五代后唐迁治旧上邽城说辨析

潘守正

新编《清水县志》（2001年出版）建置沿革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吐蕃复据清水，清水县辖地南移，县治迁上邽城。"又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976），县治从上邽城迁回。"

类似记述，还见于与《清水县志》同年及稍后出版的《秦城区志》和《天水市志》，只是两志中将清水县治迁移时间载在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秦城区志》还载，在迁治后，今秦城区（2005年改名秦州区）辖区部分地方属清水县。

追溯其说来源，清人所著《二十五史补编·五代地理考》在记述秦州沿革时，始出现"五代后唐为清水县治"的 记述。接着，在乾隆年间编成的《甘肃通志》建置沿革之秦州沿革表中，有"后唐长兴初移清水县来治"的记述，比《二十五史补编》多了具体时间。较《甘肃通志》成书稍迟的《大清一统志》，除在秦州条载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移清水县于此"外，清水条中还载："五代后唐长兴元年，县治移上邽，宋初还旧治。"民国时的《天水县志·沿革表》中亦袭其说。新出地方志，就是综合其内容并进一步发挥后记述的。

但遍览正史中上起唐末，历五代，以至宋初的诸地理志、郡县志，比照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就会发现，所谓五代后唐吐蕃据清水和清水迁治旧上邽城（今秦州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其理由是：

一、吐蕃当时不可能复据清水

迁移县治，当因原县治发生了动乱，或重大自然灾害，非此不可能平白无故将已延续很久的县治迁到另一个地方去，尤其迁往相距较远的别县去（今秦州区市区距清水县城，《秦州直隶州新志》载为130里，《元丰九域志》载为90里）。《清水县志》中的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吐蕃复据清水"说，当为是年清水迁治之由。但遍查两部《五代史》和《资治通鉴》以及诸部秦州志，皆不载长兴三年吐蕃复据清水事。不只后唐长兴年间，即使整个五代时期，亦不记载吐蕃向东扩张的战事。连记述历代战事甚详的《甘肃新通志·历代戎事》中，整个五代时期，陇右未发生过中原王朝与吐蕃间的战事。

史载唐宝应元年（762年）吐蕃东侵后，整个陇右地区，除时属凤州的两当、河池（今徽县）外，连同陇右以北的原州（治今宁夏固原，辖及平凉、静宁）、会州（治今靖远）、安乐（治今宁夏同心）皆被占领。大中三年（849年），秦州、原州、安乐州3州归唐后，为加强对陇右所复地区的防御，是年唐王朝即设秦成两州经略天雄军使。至咸通年间，又升为天雄军节度使，旋收复原被吐蕃侵据的成、武两州部分地区。从而，天雄军辖有秦、成、武3州（武州后改名阶州），成为陇右防御吐蕃的最高军政合一机构。时秦州由上邽县（今秦州区市区）迁治成纪（治今秦安中部叶堡川）。但"乾符以后，天下大乱"（《新唐书·地理志》总序语），居住陇右以北的吐蕃部落趁机向东蚕食唐土。据《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渭州、原州条载，广明年间（880~881年），吐蕃又攻据了原州及先前从原州南部平凉县析置之渭州，从而使秦州以北以至秦州所属陇城县地又为吐蕃占据。《新五代史·职方考》中"陇城，唐末废"，即由此而来。为防御吐蕃进一步南侵，唐王朝在上邽屯驻重兵，并长期驻扎，导致上邽县撤销而任由镇将各自征收赋税，维持军用。至于伏羌县，由于所居大批吐蕃不愿归唐，早在唐大中三年（849年）收复后，就任其占领，仅是有过名义上的收复，后来彻底放弃。所以至唐末，秦州原辖5县中，只存成纪、清水2县，连同后来划入的长道，至后唐长兴三年前，秦州仅领3县。

进入五代时期，"吐蕃已微弱"（《旧五代史·外

国列传·吐蕃》语）。及唐亡后，岐王李茂贞自立，坚守陇山两翼，与吐蕃部落和平相处，终无相互侵夺事发生。后唐以武力征伐兴国，立国不久，即统一原来各自为政的长江以北整个北方地区。吐蕃各部囿于后唐强盛，遣使与后唐修好。据《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就在长兴三年（932年），吐蕃于正月和八月两次遣使朝贡。

度其当时陇右形势，秦州西部（今甘谷及以西）和北部（今静宁、庄浪及秦安东北部部分地方）虽仍由吐蕃部落占据，但其部均各自为政。而天雄军（后唐改称雄武军）作为守御秦、成、阶3州疆土的高级建置，拥有较强的实力。清水县位于州治（今秦安叶堡川）东南，是联络关中的通衢要径。在北部平凉大道受阻的情况下，设在清水与陇州（今陕西陇县）间的关陇大道成为唯一一条与中原王朝联系的通道。以守土为责的天雄（雄武）军节度使绝不会坐视让吐蕃侵占清水。尚若清水当时被吐蕃占据，陇右与关中通道被阻，处于三面包围中的天雄（雄武）军和秦州还能在今秦安叶堡川立足？

二、陇城县的辖域决定了清水不可能越过陇城迁往旧上邽城

《旧五代史·郡县志》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见管长道、成纪、天水三县，外有十镇，征科并系镇将，今请以归化、恕水、五龙、黄土四镇就归化镇复置旧龙城；赤砂、染坊，夕阳、南冶、铁务五镇就赤砂镇复置旧天水县，其白石、大泽、良恭三镇割属长道县。从之。"所述见管（即现管）3县中"天水"，从下文复置天水县可知，为清水县之误。所称"十镇"实为12镇，除新置两县所属9镇外，白石在今西和县，大泽在礼县，良恭在宕昌东北。新置天水县治，史家确认在今秦州区西南天水镇。而龙城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应为陇城。陇城县隋开皇六年由河阳改名，设治于今秦安县陇城镇，据《新五代史·职方考》为"唐末废"。其废止原因，当因于当时占据今静宁一带的吐蕃部落骚扰而致，以至地被蚕食而县废。其地直到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即被吐蕃占据100多年后始归于宋，两年后设为陇城寨。所以后唐长兴三年所置陇城县与旧陇城县不在同一个地域。

《旧五代史》中的陇城县治归化镇，近代已无其名。但宋代成书的《元丰九域志》中秦州陇城条，给出了详址，即在"州东三十五里"。"州"指秦州城，即今秦州区市区。其东三十五里，为今麦积区马跑泉西，亦即三十甸子村北。其地至上世纪50年代，还有城垣残存。因此可以确证，后唐所置陇城县治设在今马跑泉西。由此推知，陇城县辖域在渭河流域，西南与天水县接壤，东北与清水县相邻，西北与成纪县毗连。所辖4镇中，恕水、黄土，不知所在，但五龙一名沿用时间很长，清顺治《秦州志》中有五龙镇。《直隶秦州新志》更载："五龙峰，在东南八十里，下为五龙镇。"直至上世纪50年代还设过五龙乡，60年代其地村名虽改称为红星，但汇入渭河的河水仍称五龙沟，其地在今元龙镇西南，可证陇城县东部辖域，直至今元龙、三岔一带。而西部辖域，据《宋史·地理志》，为防止吐蕃侵扰，陇城县境内设有静戎、永固、定平、长山、白榆林、郭马、安塞7堡。同一志中静戎砦辖9堡，其中大部位于陇城县境，而静戎砦治据《元丰九域志》，在州治（今秦州市区）东北40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静戎砦治标示在今秦安县东南与清水县、麦积区交界，《天水市志》称在秦安云山乡。三说方位是一直的。由此可证，陇城县西界，直延至今秦安县东南。从陇城县东、西两界可清楚看出，陇城县辖域横亘在清水县与旧上邽城之间，将两地完全隔绝。这就不仅使"清水县辖地南移"不可能，"县治迁上邽城"更不可能。试想如果将县治迁旧上邽城，官吏跋涉数十里越过陇城县去辖理，多不方便！

三、上邽是名县，即使变更建置，也不可能弃上邽名而将其地改属清水

上邽，原名邽县，春秋时秦武公十年（前688年）始设，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两个县之一（另一为冀县），至唐末废止时已历1500多年，可谓建置史悠久。而清水县始设于西汉武帝时，至唐末只历千余年。上邽县废止原因，诸史无载。从《旧五代史·郡县志》陇右道秦州条下所载当时州境"有十镇，征科并系镇将"推知，大约在唐末，为防止吐

蕃部落的侵扰，富庶的秦州（主要是上邽）成了官军屯兵之地，长时期的驻屯，由镇将各据一方，自行征收赋税，由此架空了上邽县官署，只好将县撤销，由镇将各自统辖。这也或许就是载有唐大中三年（849年）后建置变化的《新唐书·地理志》中秦州仍统有上邽县、而《旧五代史·郡县志》中上邽已不存在的原因。唐末至后唐长兴年间，相隔只20多年。假如长兴年间要在旧上邽城重新置县，必然是仍以上邽名县，即恢复上邽县。从《旧五代史·郡县志》所载“复置旧龙（陇）城”、“复置旧天水县”亦说明，当时在变更建置时是很注重沿用旧县名的，不可能让清水县鸠占鹊巢，把其治迁于旧上邽城，并辖属其地。

综上所述，所谓“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吐蕃复据清水”说是编纂《清水县志》时杜撰出来的史实，其目的在于为清水县治南迁旧上邽城寻觅依据。既然吐蕃没有侵据清水，那么清水县治也就没有必要迁往外地。与清水县治南迁的一切说辞都无法成立。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错在何处呢？

经对当时（五代、北宋）史籍的辨析发现，错在对宋人纂成的《太平寰宇记》的释解上。其记清水条载：“后唐长兴元年移置于上邽镇，即今理所也”。“即”，就是；“今理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清水县治所。可知所称上邽镇并不是上邽城，而是县治所在镇名。虽说上邽（邽县）治历来认为设在渭河和藉河流域，但与清水也有着不少渊源。据《直隶秦州新志·古迹》载，汉文帝时一度置上邽县于今清水县城北。唐初又在清水县设邽州。而长兴元年移治时上邽县已不存，或因为惜其名之失，清水县将所迁新县治称上邽镇，所以就有了《太平寰宇记》中记述。应该说，《太平寰宇记》中记述，是考证五代至北宋清水县治的信史。

与《太平寰宇记》可以相互映证的，还有比《太平寰宇记》成书迟约百年的《资治通鉴》。其书卷248在记述唐宣宗大中二年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清水事后，在注文中载：“《九域志》之清水，长兴所移也。”所述《九域志》即比《资治通鉴》成书稍早的《元丰九域志》。其注更加明白地确证，北宋时的清水县治就是后唐长兴年间迁治的上邽镇。

宋以后，对清水县治大致都持《太平寰宇记》和《资治通鉴》说。如《大明一统志》记述为：“五代后唐移治于上邽镇，宋、金仍旧。”直至清康熙年间成书的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清水条仍载：“五代唐移治于上邽镇，今城周四里有奇。”又载：“清水故城，在县西，汉置县于此，后皆因之。五代唐移置今治。”再后的《秦州直隶州新志》中，仍持上说。

约在清乾隆年间，一些考证学者将《太平寰宇记》中上邽镇，释解为旧上邽县城。此说一出，影响及后来一些地方志追随其说。旧《清水县志》中，甚至称清水境不仅有上邽城，还有上邽东城、上邽西城，凡与上邽县有关的记事、地名，全部搬在了清水境，有些内容延续至今，造成了史实的混乱。

结论：清水县是一个建置史较为悠久，且其沿革、县治所在均甚为稳定的县，其县自唐大中二年（848年）从吐蕃占领下收复后，历五代、北宋，至南宋初被金兵占领前的280多年间，始终隶属于中原王朝，未遭受过周邻异族入侵。清水县治，摒弃清代以来一些不确切说法，从记事较详且可信的《水经注》中可知，早期（两汉时）在清水（即今樊河）下游西岸，即今樊河汇入牛头河口以北，其地有旧城遗址。而北魏时清水城，仍在今牛头河北岸，只是移到了旧城以西。后来史籍所载后唐长兴初迁上邽镇，即从牛头河北岸迁于牛头河南岸，并将新县城称上邽镇。此后千余年至今，清水县治未曾变更。从最初的今樊河下游西岸，到后来的牛头河北岸，以至现今的牛头河南岸，清水县治始终在数公里范围的牛头河河谷迁变，未曾有过大的迁移，是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将县治始终设在同一个地方的县。

（作者：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地方史志办退休干部）

“昭武”考略

张立聪

一、“昭武”由来

提起“昭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汉朝设置的昭武县和现在的临泽县鸭暖镇昭武村。

其实，早在汉朝设昭武县之前，“昭武”之名已经存在。

一些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昭武”应为外语音转写，意为“城主”，用来称呼首领，犹如今天的“县长”之称谓。德国学者 J.Marquart 认为昭武应是后突厥碑文中的Čub对音，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进一步补充，认为Čub在伊朗语为“温”，在突厥语中则为“昭武”。日本学者植一雄认为“昭武”是嚈（音 yàn）哒头罗曼碑文中的 Jabula 对音，为嚈哒姓氏或称号。另外在敦煌粟（音 sù）特文书上，还多次发现 r β 口一词，一般认为读作“昭武”。

研究认为：周秦至汉初，临泽境内先后有西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建立过政权。其中势力强大的月氏曾经在今临泽县境内筑建都城，都城因为首领称谓而得名“昭武”。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今临泽地始置县，名昭武，寓彰显和昭示汉武帝武功武德之意，隶属于张掖郡。昭武城为昭武县治邑。

二、昭武城

昭武城是甘肃省河西走廊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在地。许多资料认为昭武城（遗址）位于今天的鸭暖镇昭武村，其实并非如此。

清宣统年间编印的《甘肃新通志》卷四《建置志·沿革表》说，汉昭武“在黑水之阳”，即黑河北岸。同属卷 13《古迹》记载：“抚彝厅昭武古城，在厅东北[①]四十里，汉置，属张掖郡……遗址尚存，在今板桥东南。”

《甘州府志校注》记载，“昭武古城：（抚彝厅）城东北四十里，土人云遗址尚存，在今板桥东南，古月氏城，而汉县因之”。“昭武流霞：地当山麓，前临水湄，材埠（音 bù）林椒，天然幽胜。其夕日返照，明霞片片落黑水中，而板屋烟树，掩映斜阳，寻常巷陌（音 mò），不啻（音 chì）仙源也。”说的也是黑河北岸。

《临泽县志》记载，“板桥古城：古城遗址有二，皆位于板桥堡东南之今古城村。“一于村西，曰西古城”。古长城自村北横穿（遗址尚可见），古城址于长城东南千余米。民国间尚有城垣残迹，并有砖、瓦、陶器残片散在。由于黑河河床北倾，在河水动力作用下，北岸屡遭冲刷，崩塌北移，古城遗址渐次濒河。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古城遗址已悬于河岸，且一部分遗址已被河跌吞没，幸存部分也已辟为农田。今所见史料多以其为月氏昭武城遗址”。“一于村东，谓东古城，东汉昭武属国城。地址无遗存。”

由此可见，昭武古城不在鸭暖镇昭武村一带，而在今板

桥镇古城村。因为昭武村位于黑河南岸，板桥西南，抚彝厅东南约三十五里。而板桥镇古城村则符合“抚彝厅昭武古城，在厅东北四十里”、“在黑水之阳”的描述。也与谭其骧《中国地图集（II）》（西汉至唐代）标注地点相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物调查时，据板桥镇古城村

① 此处方位有误，应该是厅东南四十里。因为厅东北四十里自古为戈壁。

年长者说，听长辈讲，当地曾经有一个古城，他们孩童时看到的就只有城垣痕迹和一些庙宇，后来政府将庙宇改为学校。那个古城可能就是月氏人的昭武城。

在古城村与合黎山之间有一片漫滩，现在人们称其为银坡滩。笔者推断，既然古城村的遗址就是月氏人的昭武城遗址，那么今天的银坡滩很可能就是月氏人安营驻扎兵马的地方，因此，准确的地名应该是“营坡滩”而非“银坡滩”。

据方步和考证，在月氏人驻牧的众多草场中，昭武古城一带的草场最为丰美。这里弱水（山丹河）与羌谷水（今黑河）合流，地处中游，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牧草优良，也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一个游牧民族能够选择在此建造都城，足以说明其优越性。《括地志》云：“凉、甘、肃、延（应为瓜）、沙等州地，本月氏国”，昭武处于河西走廊中间，东西几乎相等，在以驼、马代步的时代，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另据资料记载，从公元 1930 年到 1962 年的 32 年间，黑河北岸仅土桥村至板桥村的 15 公里之间，就因河水冲刷，河岸平均北移 160 多米，减少耕地 3700 余亩（约 2.5 平方千米），若上溯 2000 年，古城村一带的概貌可想而知。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民族从游牧到定居易，从定居到游牧难。月氏人能够选择古城村一带作为都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昭武村

研究证明，昭武村与昭武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昭武村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据《临泽文史》第五集记载，将“昭武”作为县以下地名，始于民国十五年（1926 年）。是年，黑河北岸自今天的平川镇黄家堡村至板桥镇土桥村、黑河南岸自今天的鸭暖镇华强村至小鸭村均隶属于抚彝（临泽）县昭武区，区公所设在鸭翅渠堡（今鸭暖镇昭武村九社境内）。民国二十三年易区为乡，名永安，翌年以永安等黑河南岸 6 个村为第五区，名昭武，设区署于鸭翅渠堡。民国二十四年自大鸭翅析出置昭武村，1956 年当地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又以昭武为社名，1958 年设昭武大队，1983 年更名为昭武村。

四、月氏（昭武）人

昭武城是月氏（昭武）人的都城已经没有异议。那么月氏（昭武）人又是从哪儿来的？

月氏是古代生活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月氏之名，始于先秦至秦汉之际。据史家考证，月氏即《逸周书》与《管子》之“禺民”、“禺氏”、“禺氏”，《左转》中的“虞氏”，《穆天子传》之“禺知”，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月氏”等。其由来，赞同孙智辉的观点，即来自于新疆帕米尔一带，他认为帕米尔（葱岭）一带是我国古民族的发源地，强盛后东迁，逐渐进入中原。月氏人就是东迁时留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从这个角度看，月氏人长期从事长安与西域的和田玉以及丝绸、茶叶贸易，乃至后来拓展丝绸之路、小麦[②]东进、砷铜[③]西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资料记载，昭武九姓“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李白曾描述他们“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碧玉灵灵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谲（音 jué）诡貌，岂知造化神。”准确地刻画出了昭武九姓（粟特人）绿瞳、卷发、高鼻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五、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

② 研究证明，人类 9000 年前第一次种植小麦的确切地点是土耳其东（南）部。民乐县六坝乡的东灰山人种植小麦是在近 5000 年前。

③ 研究证明，民乐县东灰山的砷铜制品出现在公元前近 5000 年前后，伊朗泰佩叶海亚的砷铜制品出现在公元前 3800 年～公元前 3500 年，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希腊及东南欧部分地区的砷铜制品出现在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3000 年，意大利、利比里亚、高加索地区的砷铜制品出现在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印度的砷铜制品出现在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

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的泛称。

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省临泽县），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最后进入中亚粟特地域（今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及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一带），支庶各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毕等九姓，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故称昭武九姓，唐代又称“九姓胡”、“胡人”或单称“胡”，西文则称之为“粟特人”。《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音hé）、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

据方步和等学者研究，公元前206年，月氏受匈奴冒顿单于打击而举族向西迁徙。其中，老弱病残等不宜长途跋涉者进入祁连山，投靠了羌族，史称小月氏。其余人随月氏王向西迁徙，进入楼兰一带。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派右贤王再次打击月氏，月氏大败，退入伊犁河流域。月氏所灭乌孙国国王的小儿子昆莫，被匈奴收养成人后，寻月氏报父仇的要求获准，第三次攻打月氏，月氏人被迫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公元前125年征服巴克特利亚（由古希腊人在中亚建立的国家），统治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月氏部族一分为五，进入东部山区，设五部翕（音xī）侯统治，贵霜是其中一部。公元一世纪中叶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帝国，遂成为中亚霸主，除占有中亚两河流域（包括昭武九姓集聚的粟特地区）、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之外，还包括印度北部，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及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

贵霜帝国在公元四世纪逐渐衰落，适值被西方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入侵。在嚈哒入侵期间，诸王不得不暂时屈服，连姓氏也改易为“温”；当嚈哒人的统治被推翻后，诸王又恢复其姓为“昭武”。

研究表明：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闻名于欧亚大陆。

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公元545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胡商安诺盘为特使出使突厥，这是中原王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与突厥的交往。次年，突厥派使团来到长安，向当时的西魏王朝朝贡。公元551年，西魏王朝将长乐公主下嫁给突厥可汗阿史那上门。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称兴胡。唐代在中国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公元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

六世纪中期昭武诸国相继臣属西突厥。七世纪中期归附唐朝，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同时开始遭受阿拉伯帝国侵袭，多次向唐朝求援，接受唐朝赐封的王号，反抗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下半叶诸国逐步消亡。

张掖作为扼守丝绸之路的重镇，自然也就成了昭武九姓（粟特人）经商的聚集地之一。据隋《康敬本墓志》记载，汉武帝元封时，康敬本（系昭武九姓之康国人）的祖先为粟特人的酋帅，率部族迁居张掖，延至北周，其曾祖康默任甘州大中正（此官吏由地方豪族担任）。另据《安怀及夫人墓志》记载，安怀之曾祖安朝前，系昭武九姓之安国人，北周时任甘州司马。可见粟特人在张掖的势力之强盛。

昭武九姓的商贸活动，在活跃经济的同时，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传到西方，昭武九姓无疑是重要的媒介。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音huí hú）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参考文献

① 陈海涛《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27期)。

② 郭方忠 张克复 吕靖华主编《甘肃大辞典》,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③ 方步和主编《张掖史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④〔清〕钟赓起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⑤ 张志纯、何成才主编《金张掖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临泽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⑦ 程耀禄主编《临泽文史》第五集,2005年出版。

⑧ 吴瑛《昭武县的县名由来》,《临泽文史资料》第一集,1991年出版。

⑨ 吴瑛《历史上临泽县名与治名的差异》,《临泽文史资料》第二集,1993年出版。

⑩ 刘炘《临泽县大沙河文化产业区昭武文化展示规划》,2013年8月。

(作者:甘肃省临泽县政协干部)

《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省志·卫生志》《兰州市志》通过复审

2016年8月22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召开《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兰州市志》复审会议,经过评审,会议认为,《甘肃省志·军事志(1991—2010)》、《甘肃省志·卫生志(1986—2010)》、《兰州市志》编纂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部志稿资料丰富,取舍得当,语言流畅,图文并茂,篇目设置合理,归属得当,体例完备,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标准,一致同意通过复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 孔令奇供稿)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召开《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编纂工作暨培训会

7月29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编纂工作暨培训会。会议传达了省政府对《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1991-2010)》编纂工作的要求,安排部署了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第二轮修志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赵彦龙出席会议并作题为《传承交通文明,弘扬交通精神,促进我省交通运输工作全面健康发展》的讲话,同时代表省交通运输厅与相关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委)、省公航旅集团、厅属各单位分管领导和编纂人员、厅机关有关处室负责人,共47个单位、9个处室近100人参加会议。

赵彦龙副厅长要求,各编纂单位和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修志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到领导认识到位、组织机构到位、人员安排到位、经费保障到位,确保按照与厅里签订的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编纂任务。

会上,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巡视员兼省志编纂处处长李拾良为编纂人员作了《省志编纂的规则和方法》专题讲座。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 司德芳供稿)

回首西望“左公柳”

朱克雄

“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西进收复新疆时带领湘军一路所植之柳，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代著名儒将。左宗棠从小生活在湘江之滨，对绿树有着特殊偏爱。据传，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为收复新疆而率领湘兵来到西北大漠，深感气候干燥，寥无生气，而又水土不服，遂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柳树、杨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其用意在于，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防风固沙，三是限戎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凉。凡他所到之处，都要动员军民植树造林。后来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植之柳树，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但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举办洋务事业、推行社会改革、一举收复新疆，功勋卓著；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民运动，功过说法不一。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是，自己死后人们对他最没有争议的纪念竟是祖国大西北的一种柳树，而且人们不约而同地呼之为“左公柳”。可见在老百姓的心中，从古到今，生态高于政治，和平重于战争。环境第一，生存至上。

回首遥望当年大西北特别是千里陇原，土地贫瘠，荒漠遍地。1869年，左宗棠率湘湖子弟进入西北后，看到那里干旱少雨，树木稀少，便命兵士在行军途中沿路种树。《西笑日报》描述为“自泾川以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78年，左宗棠的同乡好友杨昌浚，在浙江巡抚任内因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去职，应邀协助左公督办新疆军务，见三千里驿道上，车辚辚，马萧萧，军威雄壮，夕日荒凉的戈壁，杨柳成行，浓荫遮地，便写了《恭颂左公西行甘棠》名诗“大将（一说为“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脍炙人口，迄今不衰。上世纪50年代初王震将军在新疆接见左宗棠曾孙左景伊时，即席吟诵这首诗，并赞颂左宗棠的功绩。1931年，首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嘉伦和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二人合作的《玉门出塞歌》中有：“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鹏雕。”1942年，蒋介石派蒋经国考察西北后发表的《伟大的西北》一文中，颇有感慨地写到：“左宗棠从西安到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3000多里的大道，两旁遍植柳树，人行其间，只有感觉到伟大、伟大、伟大”。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先辈们“经营趁早”的呼号已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逐步实现。况且左宗棠植树纵然有其军事目的，但大量植树荫蔽后人、造福桑梓

乡里却不能不说是左宗棠的一大政绩。直到全国解放初期，沿西兰、兰新公路两旁一些成行的大树还在，一些老树至今也不难找到，甘肃平凉柳湖公园就有40多株，给予了特别保护。像左公这样大规模地、卓有成效地植树活动是前无古人的。左宗棠为了进军新疆开辟陕甘、甘新大道，百年巨变而今已成为铁路、公路横贯中国大陆和连接欧亚两洲的“欧亚大陆桥”，通向世界。

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第二条是唐代的丝绸之路；这第三条就是左宗棠开辟的“左公绿柳之路”。“左公大道三千里，百万绿柳护两旁。”真可谓景色壮观，它无疑是西北开发史上的不朽丰碑。1869年他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1880年当他奉诏从关外进京时，在中国西北这片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一路“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城，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那么，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呢？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甘肃省政府调查，甘肃境内平凉至酒泉有“左公柳”24.6万株，皆合抱之木。左公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自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公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

回首西望“左公柳”，一种肃穆庄重便会涌入人们眼帘。大西北无垠戈壁拥着荒原漠野、长城残垣伴着大漠孤烟、驼铃响彻丝绸古道的苍凉，你就会不由地击掌，深为这些郁郁葱葱的“左公柳”扎根漠野、滋养家园的顽强而叫好，更为花甲之年的左宗棠在大西北抬棺西进砥砺出一串火花，绽放出一片春意的左公精神所折服。对绿树有着特殊偏爱的左公在胜利收复新疆的同时，倾注大量心血在大西北不毛荒山、无垠黄沙、裸露戈壁、荒野沟壑种植柳树的善举不仅形成了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也得到了世人的无限敬仰。晚清官府曾在古驿道旁贴了这样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此告谕的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保护树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传承。民国时期的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1935年的《保护左公柳办法》规定更为详细，如在全省普查编号，分段保护落实到人，树如枯死亦不许代，已砍伐者按原位补齐，树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保护不力唯县长是问等等。

历经沧桑，左公栽植柳树已成为历史。但左公率领湖湘子弟戍边栽树的故事，将千古传颂。“一扫狼烟大漠熙，担当使命顶天颐。霜摧沙掩全不怕，长送春魂绿满陲。”提到左宗棠在西北的功业，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遍布西北各地的“左公柳”。这首诗既是对左宗棠率军西征沿途种树历史的真实记载，也是对左宗棠种树功业的热情赞颂。如今，从千里陇原到天山南北，公路两边大部分生长着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公柳”，它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枝叶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护送着大路中间行走的车辆、行人以及周边祖祖辈辈耐以生活的城郭。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宗棠）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清史稿》也有：“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林则徐赞曰：“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给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

无左宗棠。”清代诗人刘体仁言曰：“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曾国藩也有：“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伦理学家、教育家杨昌济曰：“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光绪帝赞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终始如一。”清代左公的湘阴同乡左钦敏赞曰：“综古今论之，邓、马、李、郭中兴帝室，无此战绩；卫、霍、韩、范功高边塞，无此雄威。班定远生入玉门，尚须陈乞；岳忠武痛饮黄龙，徒成虚名。勋名之盛，秦汉以后，谁与比伦？”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裴景福在著作中评价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近代文学家、书法家、学者朱孔彰言：“论者谓粤寇未平，无以制捻；捻寇未殄，无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尽瘁驰驱，白首临边，不易初志，功成名立，与日月争光矣。当其排众议，揣夷情，决胜算，我战则克，何其智且勇也！语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伟矣哉！”美国新闻记者、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独立作家徐志频说：“左宗棠做人真实，做事实在，以凡人标准追求‘一艺一伎之名’，着眼做好分内事，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以至事功盖世。”钱学森的岳父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方震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至此，我们不能不由衷地喊出：伟大的湘军，不朽的传奇！

“左公柳”已不单是一种自然景物，已经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和人们审美的象征。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杨昌浚这首吟颂左宗棠的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昌浚并不是诗人，也未见再有其他的诗作行世，但只这一首便足以让他跻身诗坛，流芳百世，自左宗棠之后，在文学作品中，春风终于度过了玉门关。清代诗人肖雄所著的《西疆杂述诗》四卷中，有一首诗吟到

“左公柳”时云：“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对新疆天山地区种植“左公柳”的情景，诗在自注中有这样的记载：“左文襄公檄饬湘楚诸军，各于驻处择低洼闲地，搜折树枝，排插为林。方及数年，已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皆榆柳也”。当代诗人吟颂“左公柳”的诗词更是不少，著名词人张伯驹在其《杨柳枝》中这样写到：“征西大将凯歌还，种树秦川连陇川。绿荫多于冢上草，春风一路到天山”。著名诗人袁第锐在其《边塞新咏》组诗中称颂到：“众口谁言可铄金，左公杨柳尚成阴。一从弭却硝烟后，坦荡通途直到今”。并加自注说：“‘左公柳’，清左宗棠入新时沿途所植，今尚有存者，为国家保护文物。”小说家张恨水《竹枝词》有：“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写到：“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著名散文作家梁衡在他的散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中赞美左公：“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就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读着左公柳这本岁月的天书，端详着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来，于战火中不忘栽树且卓有建树的将军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这些诗章，或借史抒感，评论人物；或托物寄兴，关注生态，各具风格，从不同侧面展示出一幅幅“左公柳”的生动画卷，正如陈乐道七律《春柳》所云：“左公遗爱问谁怜？望里春云罩碧烟。千种离思萦别渚，万条吟绪托吹棉。浓遮关塞停征马，翠拂楼台忆锦年。看取神州新画幅，河山染绿浩无边。”缘缘堂主人曾绘制过一幅画，名为《翠拂行人首》，依依垂柳之下，并坐姊妹俩，正静静凝望远方，柳丝轻拂着云鬓，委实好看！由此联想到《点石斋画报》中题为《甘棠遗泽》的“左公柳”画，驿道两旁，绿荫葱笼，那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经典话语，即刻闪进人们的脑海。“左公柳”已从一种自然景物，上升为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精神食粮。正因如此，作为诗人吟咏的对象，它也成为审美的象征。

是的，面对如今愈来愈少的“左公柳”，我们只有鞠一把感动的热泪仰望它。因为，当年新疆、甘肃地区“赤地如剥，秃山千里，黄沙飞扬”的自然景象十分严重，左公在忙于军务之际，亲自携镐与军士一道植柳。在他倡导督促下，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多少年来，这些柳树生长在戈壁前沿，面对狂风的肆虐，沙尘暴的咆哮，骄阳的照射而始终面不改色，身不倾斜巍然屹立，并以它巨大的躯体，茂密的枝叶为大地染绿，让戈壁生辉。“左公柳”，它所绽放着的不就是值得大赞特赞的左公精神吗？左公植树，我们乘凉。所以，面对这些古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为它脱帽致敬呢？

如今，在祖国大西北，那些英勇无畏、坚韧顽强的“左公柳”仍旧巍然屹立着。这种柳树高大茁壮，身姿挺拔。那粗壮的树干上，长密的枝条和嫩绿的叶片，年年都在传递着左宗棠“绿满天山”的期待，诉说着左宗棠与柳树的缘分和情感。只要这“左公柳”不倒，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永远不会倒！还是让我们以西汉循吏文翁的诗“十万大军赴新疆，金戈铁马射天狼。百战鲜血染铠甲，一缕忠魂固金汤。天山播绿绿如荫，戈壁插柳柳成行。血凝翰海发春华，至今犹忆左宗棠。”来结尾吧！

（作者：甘肃省平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江瑞芝解读

李世恩

江瑞芝是200多年前静宁州城里一位说着当地方言、过着寻常日子的女子，她历经雍乾嘉三朝，用79年走完了从大家闺秀到家庭主妇再到儿孙满堂的老太太的人生。这些，仅仅是她生命的长度，而她生命的高度在于，身处闺中却别具慧心诗才，给后世留下了一册吟唱山川、感念亲情的《蝉鸣小草》，也正因了这册诗集，使她成为明清两际关陇地区惟一有诗作传世的女诗人。

在清代两次刊行的《蝉鸣小草》，曾经一纸风行，入选多种选本，不仅为作者赢得了莫大的荣光，也让地处西北一隅的关陇女儿顿生颜色。无奈一炬秦火，蝉鸣齐喑，待春风吹度，枯了的小草已不复再荣。这种名犹在而实无存的憾恨，例证多多，的确是乡邦文化乃至整个文化界普遍的悲哀和无奈。

江瑞芝出生于时代书香门第，其祖上自明成化朝就开始读书入仕，代不乏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父兄的教育，诗书的熏染，世家之间的往来，无一不对子女的成长形成良好的引导。特别是她的父亲有难能可贵的“矫女子不读书之俗情”的家族教育理念，教其自幼读书习礼、继承家学。历览古今，有多少高官巨富，“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只有文化和精神如一脉潜流，看似柔弱，实则坚韧，即使沧海桑田，也能抗拒强力，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不绝如缕。而江瑞芝的脱颖而出，正是书香育人的范例。

江瑞芝生活在典型的封建男权社会和偏鄙小邑，想必也自幼缠脚，但一双小脚却不能阻挡她徜徉诗的田园，于是在女红之余，“潜心探索，日事吟咏，匪伊朝夕”，为自己拓展了一方闺中女儿难以企及的诗意空间。这一双小脚，甚至也不能阻挡她挈儿将女赴津省赴的旅行，秦陇山水，燕赵风物，让这位足不出户的女诗人视野为之开阔，心胸为之一舒，诗情得江山之助。也正因为有如此的诗书修养，才留下了她助父慎断狱的佳话，提出了“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这样既合乎法律也顺乎人情的谏言。所以说，江瑞芝这个女性成才的标帜，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女性而言仍然是一面良好的镜鉴。

（作者：甘肃省平凉市文联主席）

书画上落款盖印36忌

汪 斋

1. 书画上落款盖印，印比字大不可以。大幅盖大印，小幅盖小印，理所当然。

2. 国画直幅落款字下盖印，直下底角，不可再盖压角闲章。如右上落款，左下角可盖闲章，左上落款，右下角可盖闲章。如上款字印接近下角，闲章就不须盖了。

3. 国画横幅落款，左右两头角边不可盖闲章。右上落款，左下角可盖方形闲章，左上落款，右下角可盖方形闲章。此处如不需要盖闲章，而勉强盖上，反而弄巧成拙。

4. 长方形、圆形、长圆形闲章，不可盖在下角方形压角闲章处。

5. 方形闲章不可盖在书画上端空白处，以免喧宾夺主。

6. 国画直幅落款，字行末行末字，与他行末字长短，不可整齐，盖印亦如此。

7. 盖二印，一方形、一圆形，不可匹配。同形印可匹配。

8. 盖二印，一大一小，不可匹配。同样大小可匹配。

9. 盖二印，一长方形、一椭圆形，不可匹配。同形印可匹配。

10. 盖二印，上阳文，下阴文，不可匹配。而上阴下阳可匹配。

11. 盖二印，上阳文，下阳文，不可匹配。而上阴下阳可匹配。

12. 盖二印，上阴文，下阴文，不可匹配。而上阴下阳可匹配。

13. 落款盖印之下，不可再题字。印章上下有字制肘，就失去自然现象。

14. 已经落款盖印字画，款后不可再落上款赠人，就失敬了。

15. 花头、鸟尾、树枝、山顶上，不可落款盖印。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不可不懂。

16. 匠刻印章，不可用于书画上，须用艺术篆刻家所刻石章最佳。

17. 普通印泥不适用于书画上，要用八宝印泥。

18. 盖二印，距离不可太远太近，相隔一个印距离正好。

19. 盖二印，印文、章法、刀法各异，不可匹配。要用相同刀法所刻印章。

20. 画上不可题打油诗，一来识者奚落，二来作品就贬为低俗。

21. 上款上端不可盖闲章，压在人名头上。一来失礼，二来破坏画面。

22. 盖压角闲章，不可太小，宣纸四开，用方形石印，大约 3 公分比较适中。

23. 盖压角闲章，不可盖二方以上，一方正好。印与边距离约 1 公分则适中。

24. 落款字下不盖印，而偏要盖在款字左右，脱离字行，而成画外物，特殊情形例外。

25. 书画上，不可盖上劈头大印，即成巨印炸弹，毁灭了美丽的画面。

26. 小画不可题大字，大画不可题小字。小空不可题字多，大空不可题字少。

27. 书画上姓名印，不可连盖三印以上，应盖二印，或一印妥当。

28. 书画上下左右，不可任意盖印。盖多不当，不如少盖，印章印泥不佳，倒不如不盖好。

29. 盖二印，不可东倒西歪，如何盖法，用力轻重，印章印泥保养，一切要潜心研究。

30. 画上不可题上粗俗字体，致影响画面美感，就未能免俗了。

31. 书法四联首幅，右上可盖小印章。其余不可盖，如统统盖上，行气就破坏了。

32. 贮藏印泥宜用瓷缸，晶玉亦可，最忌紫砂煨瓷，因其能吸取油分，易使印泥干燥。又铜锡银漆器、犀象及石制者，皆不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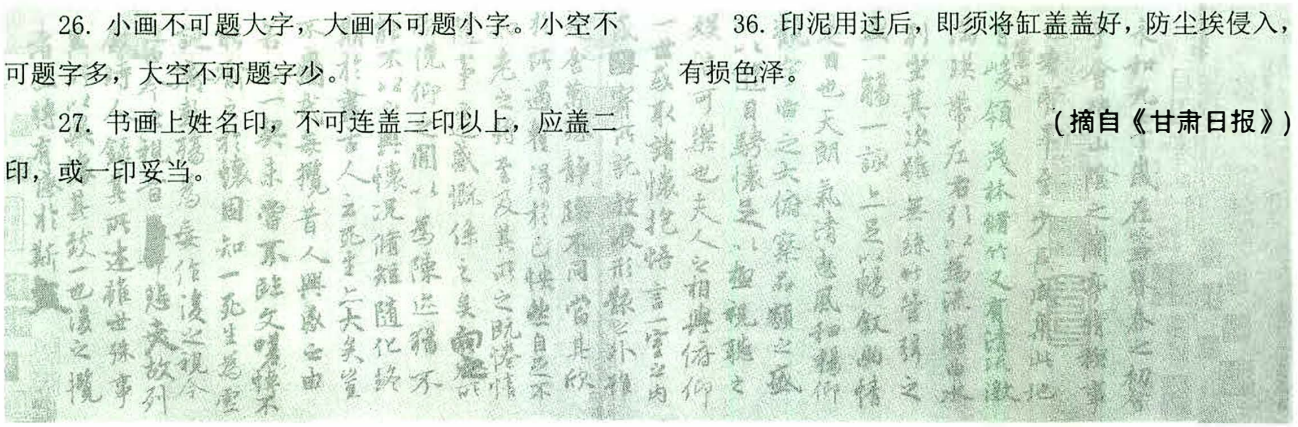
33. 每隔十日或半月，以骨签翻调一次，因砂体下沉，油性浮上，故须常调使之匀和也。

34. 图章盖印泥时，手势宜轻，轻拍印面所黏之朱已逾而匀，乃盖于纸上，须将印持正按下，切勿动摇，纸下宜垫以薄书一本。

35. 图章宜随用随揩，以免积垢而影响色泽。

36. 印泥用过后，即须将缸盖盖好，防尘埃侵入，有损色泽。

（摘自《甘肃日报》）



甘肃省五市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

随着“十三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甘肃省政府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精神，制定印发了《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是指导我省今后五年地方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地方史志部门在抓好《规划》贯彻落实的同时，截至九月，先后有酒泉、武威、天水、庆阳、金昌五市分别制定出台了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对落实地方史志“一纳入、八到位”工作机制，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拓宽发展思路、强化工作措施、深化依法治志，统筹推进全省地方史志事业科学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 汪举红供稿）

朱熹：落落三百余文 千古“治家之经”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后长期生活在福建省崇安县五夫村（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五夫村），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理学集大成者，被尊称为朱子，因谥文，又世称朱文公。

朱熹自小聪颖，善学好问，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中进士，曾任秘书阁修撰，漳州、潭州知州，焕章阁待制、侍讲等职，做官清正有为、廉洁奉公。

朱熹从事教育五十多年，振举书院建设，广注典籍，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后人编纂的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修身

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

齐家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

守正

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崇文

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尚德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择友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从善，则益者不期疏而日远，损者不期近而日亲。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

GANSUSHIZHI
甘肃史志
2016年第3期（季刊）（总第27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电子邮箱：34987631@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